

# 目 录

- “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的由来……………杨友全 (1)
- 库伦旗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和参议会的产生……………杨友全 (6)
- 我参加倒那运动的经过……………  
……………陶克坦巴雅尔口述 齐克奇整理 (10)
- 锡勒图库伦旗的政教合一制……………齐克奇 (15)
- 小库伦马市……………齐克奇 (27)
- 沙俄军入侵库伦旗始末……………齐克奇 (30)
- 外八营在库伦旗的叛乱……………  
……………玛克斯尔扎布口述 齐克奇整理 (34)
- 养正学校……………则英尔布 (37)
- 对喇嘛学校的回忆……………道尔吉 (47)
- 库伦蒙医沿革概述……………博和太 (51)
- 锡勒图库伦三大寺……………齐克奇 (61)
- 附：兴源寺和象教寺平面图
- 库伦帝庙……………程玉富 (83)
- 库伦回民与清真寺……………  
……………刘瑞卿等口述 刘哲整理 (96)
- 我所知道的迁民德都……………刘振国 (101)

- 伪警备军士兵大闹养正学校的始末…………… 王家驥 (105)  
 伪治安队在库伦……………  
     桑布、其木德斯冷提供资料 齐克奇整理 (107)  
 回忆日本投降前后库伦旗发生的一些事情……………  
     …………… 朋斯格 (110)
- 国民党中央军盘踞在库伦镇的日子里…………… 包文涛 (113)  
 杨俊拼凑所谓绥东县政府的经过……………  
     …………… 王家驥口述 齐克奇整理 (116)
- 我是怎样当“三爷”的……………  
     …………… 白云龙口述 齐克奇整理 (118)
- 多尔博札萨克…………… 齐克奇 (124)  
 仁钦好日老…………… 齐克奇 (128)  
 罗布桑林沁小传…………… 齐克奇 (130)  
 我所了解的罗布桑林沁……………  
     …………… 巴图敖斯尔口述 齐克奇整理 (134)
- 那达木德事略…………… 齐克奇 (138)  
 保音初古拉的发迹与下场…………… 齐克奇 (142)  
 乌力吉巴图的一生…………… 扎木拉 (146)  
 徐绍儒其人其事…………… 齐克奇 (151)
- 官兵与胡匪……………  
     …………… 玛克斯尔扎布口述 齐克奇整理 (155)
- “吉古日台”马招来的一场匪祸……………  
     杜古尔、林沁扎木苏提供资料 齐克奇整理 (157)

## “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的由来

杨友全

老同志还能记得吧，1946年元月，在库伦城关中街西头路北一个大门口旁（伪满税捐局旧址），挂有一块长方形木牌，上书“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九个醒目的大字。这里驻有中国共产党的一批军政干部。这“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是怎么来的，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就这个问题，据我记忆所及，谈一谈当时的一些情况。

毫无疑问，从“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这一称谓来看，就是部队驻库伦旗的一个办事机构。但是实际上不完全如此。这一点由它所担负的使命和工作任务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

这“办事处”是随新四军独立旅进驻库伦而设置的。原是独立旅的民运机关。当时，我军凡是旅以上的主力部队都设有民运机关。这是由红军时代沿袭下来的传统作法。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既是新四军独立旅设置的办事机构，为何又命名为“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而不提新四军呢？

原来新四军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华中地区部队，其全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受八路军总部指挥。日本投降后，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离开华中地区转战到东北地区，此后统称为八路军。独立旅原是隶属于

新四军军部的主力，进军东北地区后归第三师指挥，师长为黄克诚。1945年冬师部设于阜新市。

独立旅进驻库伦是1945年12月下旬的事情。事先派人与当时的库伦旗地方自治政府首脑罗布桑林沁联络。初，他以“蒙古自治”为由拒绝，后经再次派人交涉，他才以“借地暂时驻扎”为条件勉强答应。

独立旅在库伦的驻扎时间不足三个月，其整训任务完成后即离开了库伦。

话归正题，还得从八路军为什么在库伦设办事处谈起。

奉命从关内抗日根据地转战到东北地区来的八路军，其本来任务是每到一地即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但是为什么进入库伦旗却不这样做而仅设一“办事处”？毋庸置疑，这是由于当时当地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所谓当时当地的政治形势，就是：（一）库伦旗为蒙古族居多的少数民族地区；（二）在库伦旗已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和活动；（三）在日本投降后不久，以罗布桑林沁为首的上层统治者从伪旗长手中接管政权，成立了地方自治政府。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八路军不能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使用对待日伪政权的手段强行加以接管。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一贯奉行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独立旅进驻库伦后，时隔不久，在库伦旗所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出自同一个道理的。在当时的形势下，独立旅这样做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使得为数众多的蒙古族青

年干部站到中国共产党一边来，同时争取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使他们赞同我党的一般纲领，并能与我们合作共事。

这“办事处”初建时，是为部队服务的。它同地方政府打交道，目的是搞好军政关系；同群众打交道，目的是搞好军民关系；同各界人士打交道，目的是为取得各界人士广泛同情和支持。“办事处”的干部原来都是新四军的。他们是陈角榆、葛占魁、胡雅贤、余明……等。陈角榆为“办事处”主任。到1946年1月中旬，又一批地方干部在阜新地委秘书长于洪深率领下来到库伦旗。在这一批地方干部中有开辟库伦旗工作，历任旗政府秘书长、副旗长和旗委书记的孙馨远。我就是随着这一批干部队伍进入库伦旗的。这一批干部共约30人，留在库伦旗工作的约有十人，其余调转到开鲁或别的地方工作。

迨至1946年2月末，军事整训已告结束的独立旅准备拔营东征，部队陆续迁防，开赴前线。此时，经阜新地委秘书长于洪深同独立旅领导人磋商，将“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这一机构留下，把我们这一批地方干部全部并入“办事处”内，交阜新地委领导。从此，“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同独立旅脱离了隶属关系。它虽然沿用“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这一名称，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共阜新地委设在库伦旗的一个办事机构。由为部队服务的机构变成了从事地方工作的机构。

由于隶属关系已经改变，由阜新地委秘书长于洪深负责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行政上任命孙馨远为主任，陈角榆为副主任。我被任命为秘书。下设四个组，葛占魁、康志远、

毛文友、马汝耕分别担任组长。马汝耕负责的组为总务组，其余三个组统称工作组。又成立了党组，任命赵任远为书记，孙馨远、陈角榆为委员。值得指出的是“办事处”党组为中国共产党在库伦旗设立的第一个党组。也即是中共库伦旗委员会的前身。工作组的任务是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其范围是（一）一般民情；（二）蒙汉回等各民族的关系；（三）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四）地方的名流人物；（五）阶级关系；（六）宗教信仰、宗教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情况等。工作组经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编写《库伦旗概况考察报告》一文报送阜新地委。除工作组搞社会调查之外，赵任远、孙馨远和陈角榆等领导干部直接负责同库伦旗地方政府首脑和政府要员的联系。其中陈角榆侧重于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接触。我曾经有幸随同孙馨远先后拜会过旗长罗布桑林沁和保安科长胡力雅其，同他们试谈有关中共派干部参加政府工作的问题。这种试谈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对方怀有疑虑，托词甚多。例如在参加人数，都参加到哪些部门去；向各区（努图克）派多少人等诸方面，一再讨价还价，几经周折，才达成了协议。由于对方始终不同意往行政、保安两科派中共干部参加，结果中共方面只派三名干部参加政府工作。即：孙馨远为政府秘书长，康志远任财政科副科长职务，我被任命为司法科科长。“办事处”的其他人员除留几名做为中共库伦旗委员会干部而外，均派往各区（努图克）分别担任正副区长（努图克达）、书记或助理员。这项协议的最终成立，虽然颇费气力，但是值得的，其意义是深远的。因为这项协议的成立，为稍后召开库伦旗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改造旧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是个过渡性的组织机构，到1946年3月中共库伦旗委员会正式成立时，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便宣布撤销。

# 库伦旗首届人民代表会议的 召开和参议会的产生

杨友全

1946年3月，中共库伦旗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为了改造库伦旗的旧有政权，使旧政权转化为服务于人民的民主政权，提出了召开库伦旗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议。为此同库伦旗的各个团体，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同政府首脑罗布桑林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负责人广泛接触和反复磋商。经过一段短时间的酝酿，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即作出决定，召开了库伦旗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召开的时间是，1946年4月下旬。

我原来是被派到旗政府做司法工作的。在筹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时，被抽调到大会秘书处工作。大会秘书处的主要工作由旗政府秘书长孙馨远负责。

这次会议的代表名额分配原则是，根据各区（努图克）区划的大小，人口多少，蒙汉民族的分布情况，确定其代表人数和民族代表的比例。并确定各区（努图克）区长、区委书记均为各区（努图克）代表团的带队人。

在中共库伦旗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后，库伦旗农（牧）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工商联合会等人民团体都相继成立。因



此，这些团体及驻军部队、学校也选派代表参加。

会前的准备工作主要的一项是，由大会秘书处本着还政于民的精神，草拟了准备提交大会审议的几项议案。这几项议案，我还能记忆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议案；

二、试行“二五减租”、“牧业减税”的议案；

三、关于政府财政预算的议案；

四、关于没收蒙奸、汉奸的非法所得财产，充实政府财政收入的议案；

五、发扬民主权利，选举参议员，组成参议会的议案；

六、选举正副旗长的议案。

中共库伦旗委员会的几位领导干部都分别参加了这些议案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当时我正忙于会议议程安排及代表资格审查，加上其他行政事务的拖累，只参加了关于试行“二五减租”、“牧业减税”这一议案的起草工作。试行“二五减租”，主要是在土地制度实行改革之前，解决地主和贫苦农民在租佃关系上存在的地租过重的一种政策措施。

“牧业减税”是为调动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而采取的措施。

代表会议按时召开，全旗各区（努图克）选出的各族各界代表，还有来自各人民团体、驻军部队和学校的代表共约200人参加。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库伦旗委员会方面的代表有刘化东（书记）、陈角榆（组织部长），还有毛文有、楚冰等。

提交大会审议的几项议案，经代表大会发言，小组讨论，除有小部分内容略作修改外，其余基本上一致同意，顺利通过。议案报告人为大会秘书长孙馨远，还有财政科长××××（蒙古族）。当会议正式开始时，由我致开幕词。中共代表刘化东、原政府首脑罗布桑林沁也先后发表了讲话。

大会最后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参议员，按票数多少，截取前七名为正式参议员。参议员的人选条件是：（1）必须是本届会议的代表；（2）不分民族、党派、团体或个人，不分信仰，不论家庭财产，能代表民众意见监督政府工作的人均可当选。当选参议员的七人中，计有罗布桑林沁、孙馨远、布和朝禄、刘化东、德勒黑、乌恩奇、陈角榆。

这次大会的选举程序为两轮选举，先选参议员，后选正副旗长。均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被选出的正副旗长如果是新当选的参议员，应退出参议员的席位，其缺员由前选参议员七名以下得票最多者递补。这就是说，正副旗长不能兼任参议员职务。

参议会，即由代表会议选出的七名参议员组成。这是库伦旗各族各界人民行使民主权力的机关。首届一次参议会，是在首届代表会议临时休会期间举行的。在首届一次会议上，布和朝禄、刘化东被推举为正副参议长。在代表会议的闭幕式上向全体代表宣读了布和朝禄当选参议长，刘化东当选副参议长的公告。

首届参议会的组成人员及其界别是：

参议长布和朝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副参议长刘化东（中国共产党）；

参议员乌恩奇（农〈牧〉民协会）；

参议员德勒黑（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  
参议员陈角榆（中国共产党）。

另外两名参议员的姓名和界别记不清了。

大会选举正副旗长的结果是：原库伦旗政府首脑罗布桑林沁仍当选为旗长；中共干部、原政府秘书长孙馨远当选为副旗长。

由大会选举的旗长，征得参议会的同意，正式任命了旗政府各科室及各区（努图克）的行政干部。

参议会同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关系是，在代表会议闭幕期间，由参议会代表全体会议行使民主权力。主要是（1）对政府工作予以监督；（2）代表群众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3）建议任免正副旗长以下的旗和区（努图克）两级行政干部。

库伦旗参议会的产生，一是参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国民参政会”的做法；二是遵循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所阐述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权建设应是“民主的联合政府”，即容许有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参政，共商国家的大政方针的精神，也即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理论为依据的。

库伦旗参议会产生之后，库伦旗政府就意味着它已为“民主的联合政府”，而不再是属于某一个阶级，某一个党派独裁专制的政府。这是当时的库伦旗在政权建设中，必须经过的一个里程。也就是说，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库伦旗各族各界人民，同他们一道在改造旧政权，使其转化为人民政权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

## 我参加倒那运动的经过

陶克坦巴雅尔 口述  
齐 克 奇 整理

按：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伪旗长那达木德收罗一批敌伪残余，勾结恶霸地主兼胡匪窝主保音初古拉，以维持地方治安做为幌子，继续干着残害人民的罪恶勾当。他们的行径，激起了备受日本侵略者压迫和蹂躏的全旗各族人民的公愤。10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把那达木德赶下了台。这是库伦旗民主革命的序曲。

1945年10月，苏联红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对日作战行动已告束结。库伦旗的社会治安秩序随之趋于安定，镇内各商家陆续恢复营业。此时，我和哈旦艾里屯的保音合什格两人合股，开设一家饭店，地址在南街，称“青年饭店”。有一天，乌恩奇（丹巴扎木苏）上饭店来找我。我们两人是同乡同宗同辈，他比我大几岁，彼此很合得来。这次他来，向我讲述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形势。又谈到在这一新形势下，做为一个蒙古族青年，如何努力为蒙古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最后他提起，虽然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但敌伪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伪旗长，现任治安维持会会长那达木德就是敌伪残

余势力的代表，自由与解放的阻力。因此，当前最紧迫的斗争任务是联合罗布桑林沁的势力，把蒙汉各界群众发动起来，发起一个迫那下台的运动。他动员我参加这一运动，并约我同他一起到原瑞尔吉努图克(区)范围内的几个嘎查进行活动。我终于被他说服了，便离开饭店，跟着他先到通什屯，见了仁沁道尔吉。再到玛拉沁屯见了关其格尼玛。又往西转了半个圆圈，见了乌兰岗屯巴彦巴图、喇嘛稿屯拉布丹、苏斯屯陶克特仓、阿力玛图屯则丹业喜等人。向他们宣传了把维持会会长那达木德赶下台去，扶持罗布桑林沁重新当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向他们数说了那达木德的主要罪状：一是，在龙蛇年（1928——1929），全旗遭受历史所罕见的严重灾害，农业歉收，粮价飞涨，旗民濒临饿死的危急关头，囤积粮食的地主，奸商乘机大发横财。罗布桑林沁做为—旗之长，曾经明令限制粮价飞涨。并停办他所经营的公玉源烧锅，给全旗每户发放粗粮二斗，以此救济。可是那达木德却贪得无厌，趁机把公玉源烧锅接过去经营；二是，前不久，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那达木德属下的保安大队，以收缴苏军遗留的财物，及惩办所谓“二俄国”为口实，到处搜刮钱财，残害百姓；三是，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和倒卖义仓粮等等。我们这次去瑞尔吉努图克(区)活动，往返只用了两天时间，步行赶路将近200华里。在这同一时间内，布和特木尔(哈尔稿屯人)，偕同×××(名字记不清了)到北部活动，见了呼和其乌乃屯巴图、下养畜牧屯达布萨、哈尔稿屯哈尔敖海等人。在库伦镇和镇左近的皂户沁屯、西沟两地有广升合的李景云、皂户沁屯的哈尔其盖少布、罗布桑林沁的总管家满都拉等人进行活动。我们这次的串连活动进行得

很顺利。因为我们所联系的全都是拥戴罗布桑林沁而对那达木德深感不满的人，所以一拍即合，没有任何不同意见。这些人在当地都具有一定威望和号召力。当时唯有取得他们的赞同和支持，并通过他们去活动，才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动起来。

我们从揣尔吉努图克(区)回来后，第二天到拉喜德力格处汇报了情况。拉喜德力格为倒那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当时他家又是青年们经常聚会的场所。

之后不过两天，给上述所联系的人发出了通知。即通知他们按指定时间带领群众代表前来库伦镇集中。正在这时候，有个名叫孟和吉雅的人来到旗里。这人在日伪时期当过东科前旗（科尔沁左翼前旗）旗长。这次他是以宣传队名义从王爷庙（即今乌兰浩特）赶来的。他一来首先接触的不是当时活动十分活跃的以布和朝禄为首的一批进步青年，而是他的老搭档李春蔚。这李春蔚在东科前旗当过伪科长，后到库伦来当了伪总务科长。如今做那达木德的副手，当维持会副会长，是属于那达木德一伙的人。因此，孟和吉雅初来乍到，即给青年们以很坏的印象。过了两天，在拉喜德力格处召集青年们开会，孟和吉雅到会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提到倒那运动的问题，说我们眼下发起这样的运动，未免过激过早云云。他的讲话引不起青年们的兴趣，更没有人为他捧场，有的还中途溜走了。这样，孟和吉雅自讨无趣，不便耽留，第二天即离开了库伦。

在孟和吉雅离开库伦的第二天，我们都到后府沟聚齐，在罗布桑林沁的府邸就倒那运动作进一步的具体部署。这次罗布桑林沁设宴，请大家吃了一顿饭。

按约定时间有400米人赶到库伦镇，早晨大家都来七间房（今邮电楼）前面集合，排列成长长的队伍，向维持会驻在地上仓进发。当队伍进行到南大门近前时。把守南大门的保安大队士兵蠢蠢欲动，想阻止队伍前进。只是由于担任大队长职务的胡力雅其不动声色，无任何表示，他们才未敢轻举妄动。几百人的队伍顺利地通过南大门，走进上仓门口时，宝先（伪满警察，保安大队中队长）皮带上别着匣子枪，迎头拦住了去路。罗布桑林沁向前一步伸手抓住他的肩膀，厉声说：“宝先，你想动武吗？你要动武，首先向我开枪！”宝先未敢吭一声，悄悄地溜走了。队伍涌进院内，口号声在寺庙上空回荡。那达木德不曾逆料事态发展竟如此迅猛，他只得硬着头皮，从办公室内走出来，想当着众人讲几句话；但乌恩奇带头，挥动手臂，高呼口号：“我们不要贪图钱财的那达木德！”那达木德看了一眼乌恩奇，显出不服气的样子。以嘲讽的口吻说：“你可不能忘记，当年你父亲曾经在这里的值班房供职，吃过这家的饭……”。未等他说完话，乌恩奇连声高呼：“那达木德滚出去，快快滚蛋！”众人也跟着高喊“滚蛋！”这时胡力雅其带着两名扛着轻机枪的士兵，从外边走了进来。那达木德以为得了救，然而他见胡力雅其不声不响地走到众人一侧，拉着脸站在那里。那达木德这才意识到自己众叛亲离，完全陷于孤立，便哭丧着脸向胡力雅其说：“有一快饽饽，你与我应当掰两瓣分着吃才是，可……”此时此刻，谁还听他的鬼话。口号声此落彼起，那达木德把半截话咽了回去，耷拉下头离开了上仓。之后罗布桑林沁高兴地从人群中走出来讲了一席话。最后由他出面组建了库伦旗地方自治政府，他自任旗长，将通什屯仁沁道尔吉

留下来，在政府任职。保留了胡力雅其的保安大队长职务，并任命其总管家满都拉当了副大队长。

这一天的深夜，那达木德的帮凶，皂户沁屯的保音初古拉在南梁上放了几枪，以示威胁。然而他们一伙很不得人心，失败是注定了的。摸黑儿出去鸣枪威胁，只能表示其垂死的挣扎而已。



# 锡勒图库伦旗的政教合一制

齐克奇

## 一、实行政教合一的缘起

锡勒图库伦旗最初是怎样形成的，它又为什么实行政教合一制？要想说明这一问题，必须从阿升喇嘛说起。因为锡勒图库伦旗的形成及其实行政教合一制，是与这位藏族喇嘛的活动紧密相关，即有其渊源关系的。

阿升喇嘛名希日巴，于16世纪50年代出生于青海阿木多地方。他修学于拉萨哲蚌寺。因为是三世达赖喇嘛母亲的同族近支，所以尊称阿升（意为舅父）喇嘛。70年代初，他离开西藏中部来到西部蒙古，在呼和浩特北察罕哈达地方修行。在此期间，受到了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召见。他奉劝阿拉坦汗念诵六字真言，皈依黄教。又建议阿拉坦汗延请三世达赖喇嘛来蒙古讲法。从而为黄教在蒙古广泛传播起过积极的、开拓性的作用。阿拉坦汗夸赞他的功绩，称为额其格喇嘛（意为父亲喇嘛）。17世纪初，他转入东部蒙古，先后在巴林、喀喇沁一带从事宗教活动。约于17世纪20年代末，新兴的满洲族首领皇太极为了与蒙古各部联络感情，将这位在蒙古活动多年，为黄教传入蒙古出力效劳的阿升希日巴喇嘛迎至盛京，给予很高的礼遇。此后，他在法库山住一段时间，号称法库山曼殊习礼喇嘛。大约于1632年

移居锡勒图库伦。从此这原来鲜为人知的地方，开始有了曼殊习礼库伦的称谓。1635年，皇太极命漠南蒙古诸部各遣若干喇嘛来曼殊习礼库伦，并从国库每年拨给俸银1000两。1636年秋，八十几岁高龄的阿升希日巴喇嘛圆寂。皇太极给阿升希日巴喇嘛的弟弟囊素喇嘛赐锡勒图达尔罕绰尔济封号，继承阿升希日巴喇嘛的法席，锡勒图库伦由是得名。在囊素喇嘛属下又设札萨克、德木齐各四员，辅佐管理锡勒图库伦日益繁盛的宗教事务。皇太极又命漠南蒙古诸部自1636至1638年各遣若干户来做哈力亚图（属民）。规定喀喇沁四个札萨克旗（含土默特左翼旗）每年送米千斛，以为供养。从而为锡勒图库伦实行政教合一制奠定了基础。1646年，囊素喇嘛去世后，清廷敕封盛京实胜寺喇嘛西布扎为锡勒图库伦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并赐印玺。西布扎喇嘛在世时，先后建造了做为锡勒图库伦旗主庙的兴源寺和供奉被锡勒图库伦旗奉为主神的吉祥天女庙。清廷再次调拨一批喇嘛来住锡勒图库伦寺庙。至此，锡勒图库伦旗做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与漠南四十九旗平列的地方行政单位出现于内蒙古。西布扎喇嘛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喇嘛，曾经被召到京师，为顺治皇帝和顺治皇帝的母亲讲经论法。在京师建造佛塔，塑铸佛像等，分别受到顺治皇帝和皇太后的赏赐。并受班第达诺门汗封号。又直接参与了迎送五世达赖喇嘛的礼仪活动。在京师活动期间，曾经和一世乃济陀音呼图克图发生冲突。就此清廷责罚乃济陀音呼图克图，从其徒众内择选60人归于西布扎喇嘛，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政教合一的锡勒图库伦地位。至1931年3月，锡勒图库伦旗实现政教分治为止，一直实行政教合一制，历时300年之

久。统领政教的札萨克达喇嘛，自阿升希日巴喇嘛算起，至最末一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为止，相传二十三任。

## 二、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及其职官和职掌

锡勒图库伦旗统治机构的设置及其职官和职掌，自与它的政教合一制相适应，而与其他由世俗王公统治的旗有所不同。

锡勒图库伦旗的统治机构设于象教寺，办事机构称办公处（即喇嘛印务处，俗称喇嘛王府）。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的寓所也设于象教寺。故象教寺通称上仓，是决定和办理重要政务和教务，及对全旗僧俗发号施令的地方。办公处即为达笔帖式、笔帖式和副笔帖式等官吏轮班办事的机关。其主要职掌是办理来往文书档案和其他杂务。这里除办公处以外再没有分掌旗务的各机关。政教事务均以主管官员为主体分掌。换言之，主管官员即代表机关本身。

锡勒图库伦旗的职官，除设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一员之外，还没有札萨克、德木齐和格斯贵等三种，定额各四员。下面将其职掌，办事制度和待遇等作一简要叙述。

（一）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俗称喇嘛王）。由清廷任免。札萨克达喇嘛为一旗之长，总理全旗政教事务，既为行政长官，又为宗教首领。

（二）札萨克（汉称一等堂官）。其任免应上报理藩院备案，并由理藩院颁发给札符。札萨克为辅佐札萨克达喇嘛管理政教事务的官员。札萨克共四员，内有旗务札萨克三员，仓务札萨克一员。仓务札萨克应由札萨克达喇嘛驻在的庙仓派充。在三员旗务札萨克中有一员印务札萨克，即领办

札萨克。札萨克权势很大，平时独立行使权力，可以在其寓所设公堂审理案件。在札萨克达喇嘛接班进京或因其他公私事情外出期间，代行札萨克达喇嘛的职权。

(三) 德木齐 (汉称二等堂官)。掌管全旗团练兵。全旗团练兵分 16 个舍，四员德木齐各掌管四个舍 (舍设有舍长一人，每个舍辖七个屯落，兵勇 20 人左右)，维持境内社会治安。此外，还兼管税务。

(四) 格斯贵 (汉称三等堂官)。主要掌管寺庙和喇嘛事务。必要时协助德木齐办理旗务。

凡是关系全旗的重要政教事务及对重大案件的处理，札萨克达喇嘛有权决定之外，还须通过札萨克、德木齐和格斯贵参加的例会审议。每逢初一、十五两日，在札萨克达喇嘛主持下召开这样的例会。这一例会称“则”会。故札萨克、德木齐和格斯贵通称“则”的十二个诺颜 (官员)。“则”会为旗的最高决策机关。在“则”会闭会期间，由札萨克一员，德木齐一员和格斯贵一员在办公处值班，每班为 15 天，负责处理日常的政教事务。这三员值班的札萨克，德木齐和格斯贵通称为值班诺颜。

札萨克、德木齐和格斯贵又分左右两翼，如左翼札萨克、右翼德木齐等。这只是按着在兴源寺举行法会时座次排列分的。

札萨克、德木齐和格斯贵的空缺，均由具有名望和办事能力的喇嘛派充。有时候，对旗的政教事务做出特殊贡献的俗人也可以充任。例如：道光初年的吉木彦札萨克，他本是俗人，为位于锡勒图库伦与土默特左翼两相交界处的仁麻子、卜都喇嘛等几个屯落划归锡勒图库伦一事。挺身而出与

土默特左翼旗打了几年官司。最后打赢了这场官司，从而平步青云，当上了札萨克。到了光绪年间，在第二十一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拉喜任职期间，清王朝内外交困，国势每况愈下，随之黄教日趋衰微。特别是清王朝对内蒙古采取的所谓“新政”，对内蒙古各旗造成了极大威胁。政教合一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不仅不能幸免，反而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一度归设治在鄂尔土板的阜新县管辖。之后“劝导”出荒，始设县治等事情接踵而至。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罗布桑拉喜喇嘛和他的前任不同，他很少参加诵经礼佛活动，将大部分精力花费在强化地方行政上。他大胆破除政教合一的喇嘛旗沿袭已久的传统作法，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如组建常备的旗卫队，修筑城墙，设立牢房，开办学堂等。其时，那些喇嘛官员往往不能胜任新的、日渐繁杂的旗务，暴露出其固有的弱点。于是罗布桑拉喜喇嘛亲自总揽大权，又从那些知书识礼的俗人中选拔官员，取代了一部分喇嘛官员。而这新的世俗官员在实际中所发挥的效用，远远胜过那些唯知墨守成规的喇嘛官员。

另有一种情况是，通过捐助银两取得札萨克、德木齐和格斯贵等职衔的。

札萨克、德木齐和格斯贵及其他公务人员的待遇：

札萨克，享受10户达尔罕。即每一达尔罕户每年按既定数额向札萨克纳贡。其中包括实物和金钱。即：干草1000斤，马料500斤，小米300斤，烧柴400捆，银洋60至80元。此外，札萨克公出时乘坐二骡轿车，带前后“顶马”（即随从）。在其寓所门两旁悬挂黑色皮鞭（把长一尺，鞭长四尺）和掌嘴皮（形状如鞋底的皮制刑具）。

以显示其权力和威严。

德木齐，享受6户达尔罕。每一达尔罕户每年向他缴纳干草800斤，马料400斤，小米200斤，烧柴300捆，银洋40至60元。

格斯贵、达笔帖式享受4户达尔罕。每一达尔罕户每年缴纳干草600斤，马料300斤，小米150斤，烧柴200捆，银洋20至40元。

笔帖式、尼日巴享受2户达尔罕。

副笔帖式、格伊格享受1户达尔罕。他们向达尔罕户的征收额层层递减。

### 三、寺庙、喇嘛和俗人

锡勒图库伦旗做为政教合一的喇嘛旗，在旗的主庙——兴源寺周围集中地建造了大小十五座喇嘛庙。其中较大的寺庙有象教寺、福缘寺和吉祥天女庙。这三座庙分别建于顺治、康熙和乾隆年间。在这十余座寺庙中兴源寺、象教寺和福缘寺拥有大量的土地、草场、林地以及街基地和房屋等财产。兴源寺的财产专由管理喇嘛庶务的机关——吉斯管理。

兴源寺为旗的主庙，建于顺治六——七年间（1649——1650年）。是札萨克达喇嘛率领喇嘛徒众举办盛大法会的场所。札萨克达喇嘛即为兴源寺锡勒图喇嘛（意为首席喇嘛），故兴源寺不另设大喇嘛。象教寺为札萨克达喇嘛的驻在地，也不另设大喇嘛，只设一常斯得喇嘛管理寺院内的事务和札萨克达喇嘛的日常生活。除此二寺之外，其余各大小寺庙均设大喇嘛为其住持喇嘛。

锡勒图库伦旗的旗民包括喇嘛和俗人两部分。喇嘛从事

诵经礼佛活动，可以充任旗的官员，参与管理政教事务。喇嘛还可以学医，边念经边行医。俗人生三个儿子，必须让一个儿子出家当喇嘛。每逢牛、蛇、鸡年普遍进行一次登记。凡是出家当喇嘛的不仅其生活有一定保障，而且还得到不负任何贡赋和差役的优待。清廷规定锡勒图库伦喇嘛限额为 1000 人。所以锡勒图库伦喇嘛在历史上从未超出过这一限定的数额。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喇嘛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即使照例登记，但不可能按登记的数全都出家当喇嘛。锡勒图库伦的一千个喇嘛全都是兴源寺锡勒图喇嘛的徒众，即为兴源寺喇嘛，同时其中的一部分分散在各大小寺庙，为各寺庙的喇嘛。

锡勒图库伦喇嘛，受大戒后可以回娘家居住，继承家业，讨上老婆，生儿养女。对此，过去喇嘛本身的说法是，锡勒图库伦旗的主神和山水神均为女性，故锡勒图库伦喇嘛可以与女性接触，可以讨老婆，云云。然而这一说法，恰恰避开了问题的实质。要回答这一问题，应当从政教合一制本身寻找原因，方能找到正确的答案。锡勒图库伦旗由于实行政教合一制，使喇嘛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其他旗的喇嘛所不可能取得的社会地位。在锡勒图库伦，喇嘛可以担任官职，直接参与行政管理，可以行使世俗官员所能行使的一切权力。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促使一些手握权柄的喇嘛官员随心所欲，把宗教戒律置之不顾，讨上老婆，过起世俗官员那样的生活来。一有此先例，不乏有其效法者，后来便形成了一种不足为鲜的普遍现象。

俗人。他们占全旗总人口的绝对多数。这部分占人口多数的俗人，常年从事牧业和农业生产，创造物质财富。并通

过纳贡服役的形式供养喇嘛，负担众寺庙从事佛事活动的费用。他们分做三种哈力亚图（属民），即旗的哈力亚图、仓的哈力亚图和庙的哈力亚图。其中旗的哈力亚图约占80%，仓的哈力亚图和庙的哈力亚图约占20%。平时他们即按这种隶属关系纳贡服役。

#### 四、贡赋与差役

锡勒图库伦做为政教合一的喇嘛旗，其旗民不服兵役，以致不向旗民摊派与登记“披甲”，征调师旅有关的费用。

锡勒图库伦旗平时向旗民（即俗人）征收的阿勒巴（贡赋）有以下几种：

（一）达尔罕阿勒巴。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定期向札萨克以下公务人员纳贡，即通称为达尔罕阿勒巴。纳达尔罕阿勒巴者必须是旗民中的富裕户。而纳达尔罕阿勒巴的富裕户为数不多，在全旗不超过百十来户。在确定达尔罕户时，首先按其富有的程度分出等次，而后按等次予以分配。如：属于上等的向札萨克纳贡，属于上中等的向德木齐纳贡，属于中等的向格斯贵和达笔帖式纳贡等。

（二）安吉存阿勒巴（犁杖捐）。即为凡种地的农户按犁杖数（亦即耕种亩数）所承担的纳贡义务。一般是每一付犁杖缴纳银洋8至10元，干草500斤，马料200斤，小米100斤，烧柴200捆。这些一般用于旗务及卫队的经费开支。

（三）孟根阿勒巴（银两捐）。即为旗民中不纳安吉存阿勒巴者，也即非农业户所承担的纳贡义务。以银两为标准



征收。每户承担 1 至 3 两不等。

(四) 沙布达干阿勒巴 (户籍捐)。即为旗民中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贫苦户所承担的纳贡义务。以制钱 (即铜钱) 为标准征收。一般每户为 500 钱至 3 吊不等。

以上为定期贡赋。此外,还有按旗务的需要向旗民临时摊派的贡赋。如:旗的官员下去进行喇嘛登记、贡赋登记、团练登记等等,其费用均向旗民摊派。

差役。主要为团练兵勇和乌拉。旗民中的比较富有者出人,出枪马参加团练,负责维持境内治安。团练兵勇平时不集中,遇有情况时,部分集中或全体集中。乌拉是札萨克、德木齐等旗的官员巡视时临时派的驿马和跟差等。

为审议确定旗民的定期贡赋,每年旧历十月用三五天时间举行“则”会,研究、确定和分配达尔罕户及其他各项阿勒巴的征收标准。如有全旗性的临时贡赋,也在“则”会上审议通过。

在旗民中除出家当喇嘛者而外,还有免除任何贡赋和差役的人。这部分人即为对于旗务有特殊建树而取得达尔罕证书者,世代享受这种待遇。

## 五、词 讼

锡勒图库伦旗做为政教合一的喇嘛旗,无独立的司法机构。对词讼案件的处理上,只限于一般民事纠纷和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至于较重大的刑事案件,必须移交给三座塔厅审理。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小库伦设县治之后,刑事案件一律归县署审理。

## 六、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喇嘛内部的斗争

锡勒图库伦政教二者的首领都是一个人。锡勒图库伦的喇嘛所信奉的都是宗喀巴所创立的黄教。管理政教事务的官员都是由喇嘛来充任。如此看来，锡勒图库伦的喇嘛信仰一致，利害一致，该不存在什么矛盾和斗争了吧？其实不然，在他们内部并不风平浪静，还时常发生些矛盾和斗争。有时候表现得还很激烈。在锡勒图库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任札萨克达喇嘛因为与他的辅佐者们相处不睦，或由于遭到徒众和施主的反对和排挤，而被迫离任转往他处的事情。道光年间，以印务札萨克博模为首的一部分喇嘛，激烈反对札萨克达喇嘛办事不公允，偏袒其心腹亲信。博模为此遭到贬斥，被流放到乌里雅苏台地方。同治年间，森扎木苏喇嘛为民请命，要求减免旗民的赋税，竟被送往三座塔厅监禁，屈死在监狱。1911年，阿利雅喇嘛跟札萨克达喇嘛发生冲突，最后反叛出走。所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锡勒图库伦喇嘛内部是存在矛盾和斗争的。而发生在喇嘛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喇嘛内部存在着权力之争这一事实，反映了清王朝规定札萨克达喇嘛一缺，必须由青海藏族喇嘛补放这一不合理现象，必然遭到锡勒图库伦僧俗抵制的事实。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旗民，与封建宗教势力相对立，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事实。博模、森扎木苏对暴虐的札萨克达喇嘛进行的斗争，做为佳话，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例如：暴虐的札萨克达喇嘛主持召开“则”会，就如何巧立名目，向旗民多征收赋税一事制定措施的时候，森扎木苏喇嘛来到札萨克达喇嘛面前跪下，并奏称：

“近来名目繁多的阿勒巴无端增加，为此旗民怨声载道。我做为您虔诚信徒，特地前来禀报，并请求您多多体察民情，减免赋税……”不待他把话说完，暴虐的札萨克达喇嘛勃然大怒：“既是旗民的事，与你出家人有何相干！”这样，把森扎木苏赶出了屋。于是森扎木苏走进膳房，拿把剃刀和一个饭碗，把碗倒扣在头顶上，请厨师给他剃头。待厨师把露在碗外边的头发剃去，他把碗一拿下，头顶上碗口大地方的头发全留下来了。他把黄色的喇嘛袍翻过来穿上，再次来到札萨克达喇嘛面前跪下，磕了一个响头，口称：“旗民森扎木苏拜见札萨克达喇嘛”，接着把上面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气得暴虐的札萨克达喇嘛竟说不出话来。事后以犯上作乱为罪名，把森扎木苏解送到三座塔厅监押，使森扎木苏惨遭酷刑，死在狱中。后暴虐的札萨克达喇嘛祭翁根山，在返回的路上，正蹲在路旁解手时，陡地一股旋风拔地而起，遮天蔽日，森扎木苏的冤魂显现在其眼前怒目而视。他吓得急忙提起裤子转身就跑，只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巴掌在他的腰背上拍打了一下，使他险些栽了跟头。他好不容易爬上车，还未回到住处，即一命呜呼。这一传说虽带有迷信色彩，但对两者的褒与贬，赞颂与鞭挞，其界线是最清楚不过了。

## 七、政教合一制的衰落及最后走上分离

17世纪30—60年代，在蒙古各部还没有完全被清王朝“征抚”的时候，第一个建立政教合一制的锡勒图库伦地位是很高的。这一点，从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西布扎在京师的一系列活动中，可以看得出来。后来，在清王朝把蒙古各部基本“征抚”时，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图克图等发挥

特殊作用而受到清王朝的青睐。从此时起，偏于一隅的锡勒图库伦退居次要地位。到清代中期，对清王朝而言，喇嘛教的作用已经变得不十分重要。特别是到后期，清王朝为国内外形势所迫，采取的“新政”，对喇嘛教愈益不利了。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小库伦设县治，就是对政教合一的一种直接威胁。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被推翻，对整个喇嘛教及政教合一制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时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拉喜，面对这种情势，采取了政教合一的锡勒图库伦以往所没有的一系列新的措施，以维系其统治地位。这在客观上为后来的政教分治铺平了道路，做好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1928年北伐战争后，东北的张学良易帜，国民党南京政府改热河特别区为省。在这一新的形势下，锡勒图库伦第二十三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决意实现政教分治，派专人赴南京活动，终于取得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同意。于1931年3月19日，由南京政府颁布了《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分治办法》。至此，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合一制即宣告结束。

# 小库伦马市

齐克奇

历史上，小库伦以马市闻名，曾有“日进斗金”之说。马市春秋两季都有，秋季为最盛。每年开春后，各大店铺开始向北部牧区出生意。据说各大店铺出生意是同一天时间。这一天凌晨，随着一挂挂鞭炮的爆响，载满烟、酒、茶、糖、棉布绸缎等货物的生意车一辆接一辆地走出各大店铺，穿过街道，向北鱼贯而行。挨到落日时分，最末一辆还未走出店铺大院。这数以千计的车辆带着帐篷和炊具等生活用品，边走边做生意。用所载货物换取马、牛、羊等大小牲畜和皮、毛等畜副产品，入秋时分陆续返回小库伦来。于是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小库伦便热闹起来。南山北梁遍布马群、牛群和羊群，在各大店铺院内皮、毛等畜副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堆积如山。届时，奉天、新民、营口、锦州和义州等地的商人纷纷赶来，争相购买。除商人外，还有奉天驻军购买军马。这时候，二顷地范围内的小库伦，人头拥挤，摩肩接踵，变成川流不息的人的海洋。据传，每逢秋季马市，各大小牛马店均拿出库伦特有的荞面合络招待客商。吃合络用芹菜做卤子，拿菜刀切，简直切不过来，干脆改用铡刀铡个痛快。可见其盛况何等红火热闹。

清代初、中叶，清廷对蒙古严加封闭，整个东部蒙古唯有

小库伦得天独厚，是个开放城镇。据记载，小库伦关帝庙，建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汉庙（毁于1960年）。这座庙的出现，乃说明早在康熙年间已有汉族商人移居这里做生意。大约于同一时期，这里的马市已经开始了。清代后期，由于北满开发，在蒙古内地郑家屯、洮南等市场的相继出现，小库伦的马市逐渐趋于衰落。虽然这样，每年出生意不下200组。他们面向呼伦贝尔、东西乌珠穆沁、东西扎鲁特、札萨克图、扎赉特、图什业图、达尔罕、博王、宾图、奈曼、翁牛特、巴林、阿鲁科尔沁等广大牧区做生意。当时出生意的主要店铺就有义恒隆、德源泰、益源泰、谦恒益、谦恒泰、宝增和、宝增长、公玉成、公玉兴、公玉隆等。

那时候，在小库伦马市集散的牲畜大致有：马15000匹，牛25000头，羊20000只，猪2000口。畜副产品有牛皮10000张，毛15000斤。此外，销售的农产品有瓜子3000石，麻子500—600石。各种豆类1000多石，库伦的土产品有土碱约450000块，面碱2000盒，甜草500000斤。

据记载，在马市上从事袖管里捏指头，撮合买卖的经纪人就有八九十个。看来，当时的小库伦马市还是相当可观的。

那时候，小库伦居民约有15000人，大小店铺（含手工业作坊）约200多家。在这些店铺中开货店占第一位，牛马店及皮行次之，再次为杂货铺。主要店铺有同合栈（烧锅铺）、全盛店、广合店、裕升店、吉顺店、德成店、复兴栈、义恒隆、三义成、东增成、宝增和、德源泰、公玉成、

正合和、公玉隆、德成号、广玉兴、谦恒益、公玉顺等。

小库伦的马市，从开始中经全盛时期到最末衰落，大约经历了 250 年。后来由于清廷取消对蒙古的禁令，向卓索图、哲里木和昭乌达盟的各旗大量移民，开荒种地，农业人口急剧增加。商业、手工业随之而发展，以致郑家屯、洮南、开鲁、通辽、彰武、阜新等城镇相继出现。特别是大郑铁路的出现，使小库伦商业逐渐萧条，人口锐减，成为交通闭塞的偏僻小镇。然而，小库伦的马市，在历史上曾经担负东部蒙古与辽东、辽西地区交换的任务，时间长达 200 多年。这不仅为北部牧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同时为辽东、辽西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这是值得一书的历史事实。

（原载《哲里木盟史志通讯》1984年第二期，这次转载略作补充）

## 沙俄军人侵库伦旗始末

齐 克 奇

19世纪末，义和团反帝运动迅猛扩大到东北地区。1900年初，沈阳义和团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火烧洋教堂，折毁俄国铁路，给外国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是年7月，沙皇俄国动员了十多万军队，借“护路”为由，悍然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正当义和团英勇阻击侵略军，与之展开激战的时候，盛京将军增祺接受清政府的密令，暗中策划借洋人的屠刀消灭义和团，拒不执行副都统晋昌出兵助战的命令。晋昌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率兵助战。9月末沈阳陷落。10月初增祺携带家眷逃至新民厅（即新民县）被沙俄侵略军截获，解回沈阳，官复原职，仍被任命为盛京将军，实为沙俄侵略军的阶下囚。副都统晋昌因为协助义和团，坚持抗战，被清政府明令革职。晋昌带着供奉于故都盛京的“圣容御宝”和用一千两黄金铸成的吗哈噶喇佛像，率领奉天省育字军马步队一、二千人行抵库伦，将“圣容、御宝、御刀，交罗卜藏拉西敬谨供奉，金条一并点交”。（罗卜藏拉西，锡勒图库伦第二十一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同时，将育字军“各营交罗卜藏拉西暂行接管”。晋昌虽为革员，仍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怀有一线希望，上奏清政府“会同联合各蒙旗，徐图恢复。”清政府的回答是“东三省俄人已许交还。”



已谕令奕劻、李鸿章妥为办理接受”。与此同时，清政府“通飭各蒙古勿为晋昌所煽惑，致滋事端。”因而晋昌闲居库伦无事可为，只等候清政府“委派妥员”前来“查办”。但清政府委派的官员迟迟不到。第二年正月，正当兴源寺举行例行法会之际，从库伦街商旅口中传出盘踞沈阳的沙俄侵略军正准备出兵袭击库伦，意欲消灭晋昌残部的消息。罗卜藏拉西喇嘛闻讯后，急忙调集旗卫队，并从兴源寺喇嘛中挑选出一批年轻力壮的，分发给枪支弹药，在兴源寺以东的几条大沟内布防。

3月6日（旧历正月十六日），即兴源寺法会结束的第二天清晨，陡然，轰地一声响，一连三发炮弹落在库伦中街尽东头一家姓程的果鲜铺门前的沟坡下，深深地钻到尚未解冻的泥土层中没有爆炸。随之一队骑兵冲进皂户沁村里。罗卜藏拉西喇嘛的弟弟新太爷（从青海来库伦不久，故有此称）迎面撞见，当即被劈死。兴源寺所属吉斯（专管喇嘛庶务的机构）是集中大量钱粮的处所，在距皂户沁西不到一箭之地，独门大院，非常醒目。两天来，管事喇嘛忙乱了一气，好不容易才把大批银子包裹好，装到马车上，以备随时转移。此刻，形势急转，来不及转移。他们急中生计，把银子从车上卸下来藏到盛满白酒的几个大柜里，然后越墙逃走。缺乏作战经验，士兵人数不过一百的旗卫队和初次摸到火枪的喇嘛，面对数量、兵器兼优的敌人，死伤多人，很快被击垮。晋昌和罗卜藏拉西喇嘛全力关照那“圣容御宝”和金条等贵重物品，带着育字军人马匆忙北撤，经塔敏查干（蒙语，意为地狱的沙漠）转往热河。沙俄侵略军追击到养畜牧河畔，向塔敏查干开炮轰击，却未敢深入追击，当日即折回

库伦寺庙驻营。

此后，四五天时间，以马市闻名遐迩的小库伦，处于沙俄侵略军的铁蹄之下，蒙汉僧俗多人横遭惨杀。据传，在兴源寺东西两侧的大沟里尸横遍地，附近居民所养的猪啃食死尸，竟不愿吃糠了。

是时，吉斯掌柜的吉格吉尔，兼任札萨克喇嘛，当沙俄侵略军来犯时，逃到下希泊屯避难。过了两三天后，得知恐怖气氛已有缓和，他才悄悄地回到吉斯，头戴红顶帽，颈挂朝珠，脚蹬厚底靴，修饰一新，以地方官员的身分，偕初伊宁布、好尔老二人，赶着为用于庙会经膳而喂肥的四条大牛做为赠礼，谒见侵略军头目采尔皮茨基将军，受到其款待，并得到十多枚金币的赏赐。在沙俄侵略军撤离库伦时他派初伊宁布、好尔老二人替侵略军带路，送到东荒八棵树一带（康平县境内）。

这次沙俄军的入侵，给库伦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据记载：“采尔皮茨基深夜带兵闯入小库伦城，强占了寺院，屠杀了僧侣和民众，并且劫掠了神殿。这位勇敢的将军所分得的战利品有将近二百尊镀金的青铜神像。”

这里，顺便提及的一个问题是，以往的有些史料，如《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日本人柏原、滨田所著《蒙古地志》，均有小库伦兴源寺和喇嘛王府在“北清事变”（指沙俄侵略军攻占沈阳的事件）中惨遭兵燹后重建的记载。在库伦旗民间还流传着沙俄侵略军侵入库伦后烧毁了查玛舞（喇嘛跳神）服装的说法。其实均属讹传。

注：本文中的引文分别见邢亦尘编《清季蒙古实录》下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出版）和《沙俄侵略我

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本文原载《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一辑，这次转载由作者稍作补充）

## 外八营在库伦旗的叛乱

玛克斯尔扎布 口述

齐 克 奇 整理

距今70年前的一个春天，驻防库伦街的外八营发动了兵变。

所谓外八营，原系慈禧太后所建的八个营军队。因这八个营不受兵部节制，由是得名外八营。变民国以后，其薪饷拖欠不发，引起了部分官兵的极大不满。其驻福兴地（属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部与驻库伦街的一部（共约四五十人，其营房在库伦街关帝庙西侧）互相取得联系，在串通一气之后，驻福兴地的那一部即开进库伦街来，两相合到一起，发动了兵变。那时我十多岁，正在兴源寺西侧的一所蒙文学堂读书。我从家里返回学堂来，一走进街里，即发现各店铺和居民住宅全都门关闭，显得异常寂静。正感纳闷，只见商务会的两个人抬着箩筐迎面走来。一问才得知，原来是外八营哗变，勒令商务会送银两。他们拿箩筐抬的正是从各大小店铺敛起来的银子，要送往变兵驻地。

在发生兵变后，设于库伦街的绥东县署所有人员仓皇逃避。外八营发动兵变后，一边大肆抢劫库伦街商户民宅，一边又扬言要到庙仓抢劫。在旗的办公处（即喇嘛王府）方面，阿克旺巴勒丹虽为札萨克达喇嘛，但实权仍操在已经退休养生的前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拉喜手中。罗布桑拉喜喇

嘛闻讯后，立即调集卫队和团练兵严加防备。后在兵变的第三天晚上，即先发制人对变兵发动了攻击。他命令一部分士兵登上南梁，居高临下，对变兵营房进行射击。同时又命令一部分士兵攻占位于南街尽东头的广合店大院（是时为绥东县署驻地）。这样，两相交火到深夜时分。突然中街西头窜起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这时变兵的射击时断时续，最后完全停止。原来，有利地形已被旗卫队和团练兵占领，又有新苏鲁克苏木吐屯的那木斯来带领一批人马赶来增援，火力进一步加强，变兵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拂晓前不得不赶紧撤离库伦街。他们临向西沟方向退却时，对广升永、万宝合等吉斯（管理喇嘛庙庶务的机构）所经营的大小店铺的板门上浇上煤油，纵火焚烧。之后经西沟菜园地向西南方向退却。凌晨，变兵行至距库伦街40华里远的则日布屯，见一座筑有高大围墙，四角立有炮台的大院，便从四面包围起来，发动了进攻。这座大院的主人塔木扎布为屯里的大户，手下有两名护院的炮手，凭借坚固的围墙和炮台给变兵以回击。塔木扎布善使双枪，从这个炮台奔向那个炮台，边指挥边向外射击，不料在院心小腿胫骨被击中。他在妻子的挽扶下躲进牛棚里，拿给牛拌料的木棍把腿捆扎好，重新登上炮台，对变兵进行射击。变兵未攻下大院，却抛下几具尸首匆忙退却，继续向南逃窜。

变兵连夜逃离库伦街之后，罗布桑拉喜喇嘛命令旗卫队和团练兵协同居民扑灭了大火。之后，札萨克吴元保奉命率领旗卫队和团练兵追击变兵。直追击到库伦与土默特左翼旗交界的地方，捕获几名俘虏，解回库伦街南梁斩首示众。

笔者为核实这一历史事件，参阅了一些有关的文献资

料。如《蒙藏事務局文》民國元年《卓索圖蒙旗慰問使陸鍾岱呈文稿》。茲補記如下：

外八營，清代稱直隸練軍，民國時改稱熱河練軍。發動兵變的時間是1912年5月1日（夏曆三月十五日）。其為首者綽號叫做周胡塗。變兵在庫倫街“燒搶商民各戶四十餘家”。

# 养正学校

则英尔布

## 一

养正学校创办于1919年，迄今已有68年的历史，是库伦旗创办最早的一所公立蒙古族小学校。养正学校创办当时，库伦旗称锡勒图库伦，还是一个实行政教合一制的喇嘛旗。锡勒图库伦既然是个政教合一的喇嘛旗，为何又会比较早地兴办一所公立小学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与当时的历史情况联系起来看，方能找出较为正确的答案。

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兴办学校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1901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强迫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曾经残酷镇压过“维新派”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为了讨好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了应付国内危机，不得不打起“维新”的旗号，装模做样地实行起“新政”来了。从而开工厂、办新学倒成了时髦事物。它的影响，即使是极其缓慢也好，不能不波及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因为在同样的影响下，喀喇沁右旗于1902年夏创办了崇正学堂。仅隔二年时间，又先后创办了毓正女学堂和守正武学堂。1910年，沈阳成立了蒙文学堂。同一年，

在錫勒图库伦旗的眼皮底下，即在库伦街上，由绥东县署准许创办了一所两级小学校。1915年秋，毗邻的科尔沁左翼前旗在克兴额先生的倡导下，在西扎哈齐创办了蒙汉两等小学校。周围这些学校的相继出现，必然会引起当时的錫勒图库伦喇嘛旗当政者的关注和效仿。这是一方面。其二，也即更为直接的一方面，由于清王朝覆亡，民国创立，而做为一个行政区域的錫勒图库伦旗却实行政教合一制，显得与时代潮流甚不合拍，这势必影响其统治地位的继续巩固。对这一点，当时的统治者不能不觉察到。在光绪年间，清王朝对内蒙古采取所谓“新政”，1902年热河都统署升朝阳为府，并增设阜新县，管辖土默特左翼、奈曼和錫勒图库伦。而錫勒图库伦喇嘛旗应酬府县两级官员，办理来往公文等方面均碰到了一定的困难。原来那些唯知诵经礼佛的札萨克、德木齐等喇嘛官员，只懂蒙文和满文的笔帖式们远不能胜任这种新的差使了。为此，錫勒图库伦的统治者们不得不采取些必要的措施，改变其所处的被动局面，以利继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这些措施之一，便是兴办学校，培养人材，这乃是养正学校所以成立的主要原由。

## 二

于1908年在库伦街设县治的前后，新苏鲁克敖特尔（马仗房屯）巴拉根扎布在旗办公处（即喇嘛印务处）驻在地土城内开办一所蒙文学堂。学堂先是暂借阿力玛图屯乌尔根塔拉（曾经当过印务札萨克）的寓所，后来才在兴源寺西跨院门外盖了一栋房。

巴拉根扎布兼通蒙满两种文字。在这所学堂就读的有额



木格图、才那木尔、玛克斯尔扎布、舍布格扎布等人。后由于发生一起重大抢劫案，一个名叫拉拉哈扎布的学生跟一位名叫塔成阿的老人一起被惨杀。事件发生后，学生们害怕都跑回家去再不敢来了。这所开办三四年的学堂就因此而停办了。和这所蒙文学堂差不多同一时期办起来的还有蒙汉学堂。因为学生兼学蒙文与汉文，所以取名蒙汉学堂。初在蒙汉学堂任教的有从喀喇沁旗聘用的佟先生（名字不清，在绥东县署蒙古房供职）。校址在旗办公处院内，即象教寺东厢房。就读的学生有却吉扎拉森、玛尼、莫都格（苏鲁克旗人）、仁沁好日老、拉喜德力格、拉喜曾格、薛青阿、那顺乌尔图、布和毕力格、扎拉增、丹巴拉布结、胡力雅其、玛哈巴尔迪、玛哈喜瑞（汉名赵文儒，苏鲁克旗人）等十多人。但这所蒙汉学堂所招收的是少数上层和富家子弟。其宗旨不外乎是培养一批直接服务于当权者的人材。蒙汉学堂所设课程有蒙文、汉文和珠算三门，选用教材诸如《百家姓》、《三字经》、《名贤集》及《大学》、《中庸》之类。教学方法仍为单个面授，与私塾无甚差别。约于1916年，巴拉根扎布再次借房，恢复了蒙文学堂。校址在三世佛庙东侧。到1919年8月，蒙汉学堂加以扩大，效法喀喇沁右旗命名为养正学校。这一校名一直沿用到1937年。学堂易名后，因学生逐渐增加，由东厢房搬到办公处客厅东侧，占用七间正房为教室和办公室。由拉喜尔力布（汉名赵兰亭，苏鲁克旗黑叶板屯人，通晓蒙、汉、满三种文字）、王如栋（汉族、辽宁凌源人，先是在库伦街两级小学校任教）二人任教。1921年由于巴拉根扎布的学生大都转入养正学校，学生又有增加，不便在办公处院内活

动，便把学校迁到下仓丹珠尔（时称三太爷）寓所。这里单门独户，有五间正房，另有厢房。不久，拉喜尔力布、王如栋二位教师因病因故相继离开了学校。学校因师资奇缺而聘用本校第一期毕业生玛哈巴尔迪一人任教，并兼管校务。由于有办学经验的二位教师离开了学校，在一段时间内，学校不甚景气，就读的学生有所减少。约于1923年，学校又由下仓迁至皂户沁屯西头。聘用阿其拉图（汉名赵凤鸣，苏鲁克人）为第二任校长。之后教材选用《三民主义》等新式课本，教学开始走向正规。随之就读学生又增加到五六十人。校长阿其拉图曾经创作一首校歌，歌词的开头两句云：“养正兮小学校悠忽三级矣，开课目众心急若早望云霓”。学校创办初期，经费由上仓开支。后来用校田（当时农村各屯落左近都有一片所有权不归私人的荒地，专供放牧牛犊用，从这里抽出一定亩数的土地做了校田）收入解决。阿其拉图任职不过三四年，第三期学生尚未毕业，他即辞职离开了学校。1927年，第一期毕业生仁沁好日老（汉名赵连科）读完北京蒙藏学校回到了家乡。第二年3月被聘到母校任教，并被任命为第三任校长。同时聘用的有与仁沁好日老同期毕业于蒙藏学校的拉喜曾格（汉名王世济）。加上原有的玛哈巴尔迪，有了三位教师。仁沁好日老、拉喜曾格二人在北京蒙藏学校受过正规教育，特别是仁沁好日老接受“五四”运动过后的新文化思想影响尤甚。他们一进入学校便对学制、课程和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把原来只分两个班改为初、高两级，实施六年学制。课程初小有国文、蒙文、算术、手工、图画、音乐、体育。高小除设有国文、蒙文、算术、音乐、体育外，又加历史、地理、自然

等。此时，学生增加到近80人，原来的四间教室、二间办公室兼宿舍、二间厨房已不够用。为此又增建了五间新房做教室和办公室。并修建一座校门，门楣上用砖刻了“养正小学校”五个大红字。不久设在库伦街的绥东县署迁往奈曼旗八仙筒，库伦街两级小学校随之解散。曾经在该校任教，毕业于北京民国大学的王家禄（奈曼旗人）应仁沁好日老之请转到养正学校任教。由于此时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声誉日渐提高，就读学生不断增加。来自苏鲁克、土默特左翼和奈曼旗的插班生就有哈登旺布、王宝山、王宝江、王宝海、李良臣、龚振浩、龚振亚、龚振声、宝永全、宝鸿仁、宝德汇等。来自库伦街的汉族插班生有杨俊。

### 三

1932年初，日本侵略军西攻热河，库伦旗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联系已经中断。1933年春，日本人在奈曼旗成立伪绥东县公署，使之仍旧管辖库伦旗。这时，日本人尚未进占库伦旗。在此形势下，养正学校的一切照旧不变。1935年3月24日，伪绥东县被撤销，4月日本侵略者进占库伦旗并凑伪旗公署，养正学校校长仁沁好日老、教师拉喜曾格同时被调往伪旗公署任职。另派拉喜德力格（汉名王世杰）来任校长。拉喜德力格为养正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后赴北京求学，考入蒙藏学校读书，因父亲病逝而中途辍学。日本人侵占库伦旗以后，时局剧变，为形势所迫，教学内容不得不变。但由于日本侵略者初进库伦旗，穷于应付地方行政和所谓“治安肃整”而无暇顾及学校教育，所以此时教学内容变化不大。在此期间，即1936年冬，发生了驻

防库伦街的伪警备军五团一连连的士兵闯进教室调戏女学生及辱骂师生的事件。被激怒了的学生把这个伪军士兵痛打了一顿。为此伪警备军士兵围攻学校，无理逮捕与殴打校长拉喜德力格、教师王家驖和玛哈巴尔迪等人，致使学校停课半个月。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进一步确立奴化中国人民的殖民教育制度，从这一年起开始实行“新学制”。所谓“新学制”是对小学仍采用四二制，头四年称“国民学校”，后二年称“国民优级学校”。这样把养正学校改名为皂户沁国民优级学校，派一名日本人寺崎为学校主席，掌握和操纵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学校原设的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及原来使用的教材全部被废除。开设了一门日语课，而且被列为主课，自小学一年级即开始学起，其比重逐年增加。相形之下所谓“满语”（实为汉语）却不抵其一半。另外又加一门所谓“建国常识”课，用以进行殖民主义政治与思想教育。讲述什么“建国精神”、“日满亲善”和“忠君爱国”之类。学校每天举行“早礼”，升日本国旗和伪满洲国国旗，唱日本国歌和伪满洲国国歌，向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皇帝遥拜。用日语集体背诵所谓《国民训》。每逢“节日”，还毕恭毕敬地念诵伪皇帝的“诏书”。

于1940年到1941年间，因原有教室已经破旧不堪，又在原来的操场和园田里新建教室和办公室，变原有教室和办公室为宿舍。这时，寺崎调离了学校，新来一个日本人叫永井。这人十分骄横凶恶，他公开提倡教师打学生，上级生打下级生。他本人也动辄打学生。因而为学生们所痛恨。后来在一次植树活动中，他又动手打学生，结果反被即

将毕业的学生痛打了一顿。他虽告到其上司那里，但由于广大学生一致揭露其法西斯式的野蛮行径，反使他无法在学校留任，不得不离开学校。

1942年8月，校长拉喜德力格调往伪旗公署文教股任视学。由本校第四期毕业生，毕业于扎兰屯师范学校的乌力吉图接任校长职务，即为第五任校长。日本人河合忠夫取代永井。此时，学校增加了一班汉族学生。学生总数增到400余人。教师达到10余名。

自1937年日伪开始实行“新学制”起至1945年8月日本最后投降为止，随着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变本加厉，对学校师生的控制也越来越严了。但是校长拉喜德力格及稍后任教的丹巴扎木苏（乌恩奇）、德勒黑、巴图、善纪米图等人，利用课内外的一切机会向学生讲述蒙古族历史。揭露清王朝利用喇嘛教毒害蒙古族人民，减少蒙古族人口，隔绝蒙古各部的联系，阻止蒙古文化和生产的发展，使蒙古社会停滞不前，以致本来英勇强悍的蒙古民族变成了极端落后而弱小的民族的事实。进而提出如何摆脱宗教桎梏，破除封建迷信，增强民族自尊心，为振兴民族而努力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勉励学生奋发学习。1943年起，经德勒黑、巴图等人积极倡导，学校选用了额尔敦陶克套的《蒙古字新鉴》（1942年初版）为教材，从而使蒙语文的教授方法改进了一大步。德勒黑、巴图等人为了让更多的人摆脱宗教迷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利用一切合理合法的形式，到校外去开展活动。他们利用暑假跑到乡下去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动员群众积极把子弟送入学校读书。他们取得乌力吉图、河合忠夫的同意，把旗内有名的几家富户，

如：奈林塔拉的德博力合、阿力玛图的则丹业喜、皂户沁的博和朝鲁、保音初古拉等人请到学校来，同时又邀请了在家赋闲的罗布桑林沁、伪旗长那达木德、伪行政科长赵宝善等人参加，取得他们的赞助，成立了助学委员会，推举罗布桑林沁为会长。经过这次募集，学校拥有了一笔扶助贫苦学生的资金。德勒黑、巴图二位教师又取得乌力吉图、河合忠夫及伪文教股日本人柴田的准许，召集一批青年喇嘛和皂户沁屯一部分因家境贫寒而不能上学读书的青少年开会，向他们讲解读书识字的重要性，办起了一所夜校。夜校每周上三次课，一部分青年喇嘛和皂户沁屯一部分青少年参加了学习，总共20多人。这所夜校开办还不到两个月，因德勒黑、巴图二位教师被征调去当伪国兵而停办。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的持久和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日益吃紧。为了支撑这场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其经济掠夺，实行所谓“出荷”、“配给”等掠夺政策。使劳动人民的生活越发贫困化。在这种情况下，中途辍学的学生多了起来，新上学的尤见稀少了。但是由于德勒黑、巴图二位教师的积极活动及助学委员会的扶助，1944年虽然汉班归并到库伦街国民优级学校，但养正学校的学生总数仍然有所增加。1945年初，由彰武县新苏鲁克奈林稿国民学校转来十多名学生。因为他们不懂蒙文，由善纪米图出面开办一期补习班，专为他们教授蒙文。此时，欧洲战场上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美军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作垂死挣扎，强迫学生整天修防空壕，开办不久的蒙文补习班为此不得不停办了。河合忠夫脸上总是挂着惊恐不安的神

色，他时常不来学校上班。伪旗公署、伪协和会和伪兴农合作社的日系官吏陆续外调，人数不断减少。河合忠夫即在此时悄悄地离开了库伦。有一天，学校向学生宣布库伦街各铁匠炉正昼夜赶制长矛，将居民和学生组织起来，成立自卫武装，以抵抗苏联红军。然而翌日到学校来的学生不足百人。

## 四

养正学校自创办以来，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尽管如此，由于师生的一致努力，在旗内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茁壮地成长起来，为改变我旗90%以上的蒙古族人民不能受教育的愚昧落后状况作出了积极贡献。养正学校不但培养出了象拉喜德力格、仁沁好日老这样赴京求学，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进步思想，回到母校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民主革命斗争做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同时还出现了象却吉扎拉森、玛尼、布和那样蔑视传统，公开援引“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进步思想，抵制当时旗县（绥东县）当权者的旧封建统治，以及愤然放弃官职出走或退隐乡下不仕的民主志士。他们虽然都已作古，但迄今为止人们每当提起养正学校的时候就自然想到他们的名字。现在养正学校所培育的学生遍于旗内外各地，有的还在海外。他们当中有教授、学者、专家，有的还担任着党政军领导部门的高中级领导职务。还有更多的是在教育战线，或在别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从事实际工作，正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这篇文章主要是靠部分老同志所提供的回忆资料写成的。由于年代久远，做为当事者的前几任校长和第一、二期学生都已离世，许多第一手资料无从取得，故遗漏和不够正确的地方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尤其是养正学校的老同学们予以指正和补充。



## 对喇嘛学校的回忆

道 尔 吉

喇嘛学校成立于1940年夏历三月初。校址在兴源寺属下的吉斯（管理喇嘛庶务的机关）院内。占用四间砖房，一头的一间为教员办公室，另三间为教室。学生的桌椅全是新的。一开课共招收六七十名小喇嘛，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18岁。当时我16岁。学制规定三年，是全日制。课程设三门，即：蒙语文、算术和珠算。课本用当时的普通初级学校课本。但珠算没有课本。教师两名，一是皂户沁屯的吉令阿，他教授蒙语文和珠算两门课。另一位是查干朝老台屯的则勒和扎布，他教算术。开学时举行了典礼。每年期中、期末都有考试。这所喇嘛学校仅招一期学生，这一期学生毕业后没有再办，实际上想办也办不起来了，因为那时当喇嘛的人已经不多了，无法再招生了。这一期刚开始时六七十人，一直坚持到毕业的只有一半。为什么竟有半数的人中途辍学呢？原因是喇嘛上学读书不同于俗人，所承受的压力很大。这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老喇嘛们不愿小喇嘛上学念书，特别是给小喇嘛任教的老喇嘛持反对态度，认为小喇嘛上学念书是有损于喇嘛的清规戒律，是走了歧路。二是家长持反对态度，认为他们的子弟一上学念书，不仅没有了念佛经的收入，反而给家庭增加了经济负担。为数一半的小喇

嘛就是由于抗不住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而中途辍学的。喇嘛学校开办初期，兴源寺的锡勒图喇嘛是乌云吉如和，后接替他的是却扎木苏。这二位职位和学位最高的老喇嘛，对办这所学校倒不反对。他们的住处就在喇嘛学校的一侧，相距不远。记得有一次，乌云吉如和让我拿纸笔替他给一位施主写了字条，还称赞我学习有成绩。有时候，却扎木苏走进我们的教室来看我们练习作业，便鼓励我们说：“不错，不错，要好好用功！”他的侄儿通拉嘎就在他手下当小喇嘛，后到喇嘛学校念书，他没有阻拦，并让通拉嘎一直坚持到毕业。

这所喇嘛学校到底由誰倡导和发起的？我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官方是正式认可的。记得于1942年喇嘛学校以正式学校名义，同皂户沁、厚很、敖彦好若等几所学校一起参加过旗里举行的体育运动会。学校的教学设备，学生的课本，教师的薪金等全部是由吉斯出钱解决的。到了1943年，三年的学期结束，我们又各自回去当喇嘛念经。隔了一年的时间，皂户沁学校的教员巴图、德勒黑二人把我们召集到皂户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开会。他们向我们说要开办一所夜校，动员我们踊跃报名参加学习。他们说，黄教已经走向衰败，你们都是青年人，应当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为社会和蒙古民族的复兴多做些有益的事情，等等。这样，我又报名参加这所夜校继续学习。同我一起报名参加学习的小喇嘛有十来名，另外还有皂户沁屯上不起学的贫苦农民家庭的子弟十来名，总共20来人。夜校主要由巴图任教。但这所夜校仅仅办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停办了。原因是发起和任教的巴图、德勒黑二人都被征调去当国兵，即将离

开学校。巴图老师临离开学校之前，一再劝我正式上皂户沁学校继续念书。但当时我的顾虑是自己年龄大了，同低年级十来岁的小学生在一起念书不好看，如果上高年级，可我只念过三年书，算术和日语两门课程怕跟不上去。巴图老师了解到我的这些顾虑，便鼓励我说：“你平时在学习上肯用功，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上到高年级即使短时间内跟不上，但过一阶段就会好起来的。”这样，1944年2月，我鼓起勇气到优级一年（即五年级）报名，级任老师是散丹宁布，原来巴图老师已经给他留话，所以我一报名，散丹宁布老师没有说什么，就把我留在他的班级里。念到年末，散丹宁布老师看我年龄大，特意照顾我，鼓励我去参加升学考试。我到彰武参加考试的结果，被王爷庙（现在的乌兰浩特）师道学校录取。1945年初赴王爷庙只念了半年，伪满洲国倒台，日本投降了。这样，我从王爷庙返回家来，1947年参加了教育工作。此后，一直没有离开教育工作，干了33年，1986年离职退休。

如今我回忆起来，这所仅仅历时三年的喇嘛学校，对一部分青年喇嘛后来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凡在喇嘛学校就读过的青年喇嘛，在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并不感到十分突然。他们大都顺应历史潮流，找到了各自所适合的工作。如：有的直接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当了基层干部；有的在企业单位当了工人，等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喇嘛学校对于咱库伦旗蒙医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即：有一部分毕业于喇嘛学校的青年喇嘛，便凭着他们既懂蒙文又识藏文的有利条件，立即改学蒙医，一批年轻的蒙医很快

地成长起来了。从而改变了咱们库伦蒙医不多而后继之人的状况。就这一批年轻的蒙医，我记得的就有：道敖尔布、旺古尔、朋斯格、希力布、阿日古勒柴、宝音乌力吉、通拉嘎、塔尔巴、达尔结等人。他们继承了蒙医事业，自50年代起开始行医，都成了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骨干力量，为咱们库伦旗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 库伦旗蒙医沿革概述

博 和 太

“医学起源于生产实践”，“有了人类就有医事活动”。蒙古族传统的正骨术和五疗法，正是在蒙古族从事游牧生活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安代也是人们的一种医事活动。它以其特有的欢快而诙谐的载歌载舞形式，做为对某些精神病的特殊疗法，在库伦旗沿用多年。这些医事活动，尽管是比较原始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人们解除疾病的痛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应当记上一笔的。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随着喇嘛教在蒙古的广泛传播，藏医学被介绍到蒙古，同蒙古原有的传统医事活动相结合，形成了蒙医学。它做为医学，比传统的正骨术和五疗法，复杂得多了，精细得多了。远远不是那些博（萨满）和亦都罕（女巫）所能驾驭的了。那时候，在从事游牧活动的蒙古族人里面，唯有集中于寺庙讽诵佛经的喇嘛才是知书识字者。毫无疑问，医学只能被他们掌握和利用。在蒙医学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但大都不是用蒙文写成，而是用藏文写成的。医学竟成了喇嘛的专利。凡是有条件的各大寺庙都利用这一优势，开办曼巴扎仓（医学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蒙医人材。使蒙医学赖以存在并继续发展了。这也是应当记上一笔的。

库伦做为一个喇嘛旗，又有著名的寺庙，在这方面却落后了一大截。直到本世纪20年代初，在实现政教分治的前几年，才创办一所规模很小的蒙医学校，培养了一代蒙医，总算向前迈出了一步。

为便于叙述，笔者把蒙医在我旗的发展进程分做了两个阶段。即以本世纪20年代初创办蒙医学校为分界线，之前为蒙医的自然发展阶段，之后为蒙医的自觉发展阶段。

## 创办蒙医学校，医疗事业 进入自觉发展阶段

20年代初，库伦旗的政教统治者，根据社会的需求和旗民的普遍愿望，对蒙医事业开始有所重视，把它纳入其议事日程，创办蒙医学校，培养和造就一代蒙医，终于使库伦旗的蒙医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这里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这并非由于库伦旗的政教统治者突发善心而偶然采取的一项措施。而是由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等诸种因素所促成。例如：土默特左翼旗瑞应寺曼巴扎仓。它是在东部蒙古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医学塾，对周围各旗蒙医事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很大。尤其原唐古特喀尔喀旗（1935年并入库伦旗）寿因寺曼巴扎仓，对我旗蒙医事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更直接。

本世纪初，有位土尔扈特喇嘛（名字不详）来我旗行医，并且曾经招收一批徒弟学医。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初招收徒弟的蒙医。但这位不记名字的蒙医，于20年代初，其徒弟们尚未出师之前不幸辞世。差不多与此同

时，约于1920—1923年间，锡勒图库伦第二十三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在下仓（福缘寺）开办了一所蒙医学校。从科左中旗莫林庙曼巴扎仓聘用一位名叫博彦特古斯的蒙医来任教。从年轻的喇嘛徒众中挑选聪慧好学者十人做学徒。这十人是嘎尔迪、德木林、塔青阿、拉喜尼玛、吉令阿、额尔敦毕力格、阿尔斯兰、满喜、伊如勒图、扎木斯冷等。他们都是年过二十，受过格斯勒戒，甚至是受了大戒的喇嘛。另有曾经在土尔扈特喇嘛门下学医的也自愿转入这所蒙医学校来学习。蒙医学校的主要教材是《四部医典》。教学上采取教师授课，学徒背诵课文和集体讨论的方式。在教授基础理论课的任务已告完成之后，博彦特古斯即辞教返回莫林庙。继之又从土默特左翼旗平安地聘用蒙医毕力格图来任教。这位名医就学于瑞应寺曼巴扎仓。他除了讲解《四部医典》之外，又教授方剂学、诊断学及放血、针灸、电疗等五疗医术。可惜，蒙医毕力格图任教时间并不太长，因故辞去教职返回平安地。

在这所蒙医学校学医的年轻喇嘛，本是由札萨克达喇嘛所指定，并非自愿。因此有的在学业上不十分热心，离校后即重操旧业，专事诵经念佛了。有的成了半医半喇嘛。约于1925年，罗布桑林沁挑选出嘎尔迪、德木林、伊如勒图等三位热心于医疗事业而学习成绩优秀者，为“仓”属额木其（医生）。他们给上下仓的公务人员免费提供医疗。他们所用的成药，每年春秋分两次由罗布桑林沁出资配制。行医收入（除上下仓公职人员免费而外）归他们个人所有。

这里应当提及的是名医那钦。他小时从师于苏鲁克下厚很的老蒙医敖尔布林沁，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学习及随师临

症，终于成了我旗颇著声望的名医。他不仅精通蒙医理论，而且对药学、方剂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善施蒙医各科技艺，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阿木古郎、巴雅尔、青少布和田令阿等蒙医均出自其门下。由于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罗布桑林沁聘他为医师。请他对嘎尔迪、德木林、伊如勒图等“仓”属额木其进行临床指导，还为他们配制成药。使他们在学业上不断得到提高，以致形成了自成一家 的 库伦派蒙医。

## 各有千秋的一代蒙医

在20年代初创办蒙医学校，造就一批蒙医的时候，已有一批自行从师学医者，分布在全旗各地行医。他们是：

敖门巴日格其。哈尔稿苏木道老都屯人，大约生活于1860—1930年前后。在我旗北部享有医名。他善于治温病和妇科病，能施“瑟布素”疗法（把羊宰杀后取胃中反刍物进行热敷的一种疗法）。他带出了两名徒弟。

巴拉增。白音花苏木保力巴逊嘎查巴图查干屯人。大约生活于1865—1935年间。他医术精深，善于治疗内外科杂病。他的两个儿子继承其医术，长子满喜尤为著名。

却尔贝。库伦镇皂户沁屯人。精于蒙医理论。其孙子德吉都为我旗著名的蒙医。

敖门达来。额勒顺镇仁门屯人。他是一位获得绰尔济学位的喇嘛，边行医，边念经，并带出了徒弟。

拉斯克。茫汉苏木长哈屯人。他治疗某些疾病有其独特的方法，人们曾经以为他有法术。



巴图。原唐古特喀尔喀人，修学于寿因寺曼巴扎仓，获曼兰巴学位，为迈达里呼图克图的私人保健医。他跟他父亲乌利吉时常在土默特左翼北部和我旗南部行医，善于治外科疾病和伤寒病。

除此，还有色音毕力格、玛尼、德得博、罗布桑扎布、乌力吉敖斯尔、刚烈、乌尔根塔拉、沙格德尔等人。他们散居在我旗各地，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以各自的专长，为群众解除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同时，他们大都以带徒弟的方法，把各自的医术传授给其后代，为我旗蒙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 解放前的一代蒙医

于1935年日本人侵占库伦旗以后，“仓”属额木其不复存在了。日本人认为蒙医“土”，不科学而加以排斥，甚至准备取缔。1940年前后，日本人先后两次集中全旗的蒙医进行考试。其所出的题目为传染病的发生与防治问题。那钦等几名老蒙医，当即援引《增补医疗》所列18种传染病，说明由一种叫做“年”的微生物，通过空气传染的道理。他们的回答与西医的说法相似，无可挑剔，这才免于被取缔。但那达、舍英尔力布等七八名蒙医，理论基础差，不能答其所问。结果他们的药搭当场被贴上封条，宣布不准行医。

我旗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掠夺，生活极端贫困，经常吃糠咽菜，普遍营养不良，卫生条件恶化，以致疾病丛生。特别是回归热、伤寒病、麻疹和天花等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和健康的疾病经常流行。在此情况下，蒙医的作

用充分显示了出来，并得到了全面的发挥。在那段瘟神肆虐的年代，他们积极地为群众防病治病，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通过防病治病的实践，他们的医术普遍得到提高，临床经验更加丰富了。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比较有名气的蒙医有满喜、伊如勒图、嘎尔迪、德吉都、德木林、扎拉森、拉喜德博、棍钱扎布、达木林宁布、尼玛林沁、哈斯宝力德、桑义陶克套、波力杰、那顺敖斯尔、扎木斯冷、图门巴雅尔、曾敦、其木德舍仍、巴雅尔、扎拉增等。他们各有专长，大多数都善于治疗温病和麻疹等。其中巴雅尔善于治疗儿科疾病。他还掌握了种痘技术。其方法是，物色一名身体好，无传染病和皮肤病的天花病患者，将其身上痘浆结的痂取下，用清水研好，给被接种的小孩点上，叫做种花。这在当时我旗尚未开始采用牛痘苗之前，为预防天花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梅毒是由旧社会遗传下来的一种地方病，对蒙古族的健康和繁衍有着严重的影响。蒙医嘎尔迪长于治疗梅毒，特别是治三期梅毒，可以说药到病除。患者只服用一粒药丸即可痊愈。他用的一种经过提炼的药丸，因为效果非常灵验，而取名“艾的斯乌日勒”，意为灵丹。这药丸是用水银、火硝和白矾，加以特殊方法提炼而成。一次只炼一丸，炼法近似中药红升丹的炼法。由此可以推测，他在这方面与中医有师承关系，并且有所发展。嘎尔迪还善于治疗肺炎。那时由于麻疹特别盛行，而肺炎经常发生，即使不患麻疹的儿童由感冒转为肺炎的也常见。嘎尔迪用蒙药老沙都昆斯勒，加大蒜的炭，牛黄少许，再加蒙药冲如克几粒，一次服用，其功效十分显著。当时抗生素尚未问世，用蒙药治愈梅毒和肺炎，实在是可贵的。约于1936年，伪治安队一名兵士患类似

胃炎的急性病，一位姓宋的西医诊治未能治愈，却吩咐伪治安队赶紧准备后事。正在这时，蒙医德吉都从伪治安队驻地门前路过，被熟人撞见请到院里，给那兵士看病。德吉都看了后立即让他们搬来一口大缸，倒入温开水，让病人进缸里泡一会，之后在病人肘关节内侧放了血。结果那个兵士的病情立时见轻，过不久即痊愈。在场的日本军官见了非常钦佩，要德吉都任伪军军医，按排长职衔发饷。德吉都不愿任伪职，加以拒绝。

在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殖民统治时期，蒙医虽遭排斥和冷落，但她植根于广大群众之中，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显示了她顽强的生命力。

## 解放初期的蒙医事业

1947年3月1日，我旗宣告解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留给我们的，疮痍满目的一个旧库伦。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百端待举的局面。然而当时我们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尽快恢复农牧业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争取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在这样情况下，到1947年秋，旗里才作出决定，把全旗蒙医组织起来成立了蒙民医学会。有蒙医五六十人参加。德木林、德吉都分别任主任、副主任。蒙民医学会的宗旨有四点：一是改造思想，树立为人民救死扶伤的思想观点；二是分区划片开展医疗预防工作；三是招收徒弟，培养蒙医力量；四是统一制药，提高蒙药质量。许多老蒙医对于学会的成立十分热心。他们为统一制药，主动出资捐助。我记得老蒙医满喜当场捐献两块银元宝，并把他的房产也献给了学会。蒙民医学会成

立后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开办蒙医学校，校址在吉祥天女庙院内。推选满喜、伊如勒图、吉令阿三位任教。就读的学生有道敖日布、阿日古拉、通拉嘎、丹斯仍、旺古尔扎布、希日巴、朋斯格、少布等。他们都喇嘛出身，40年代初毕业于喇嘛学校，因此既懂藏文，又懂蒙文。非喇嘛出身的有其格其和笔者。还有老蒙医满喜的两位徒弟全喜和塔尔巴。在就读的学生中还有从寿因寺来的玛尼扎布、德勒格尔扎布、塔义那木吉勒、德吉德少布等人。学校分两个班，即蒙文班和藏文班。蒙文班由吉令阿授课，采取课堂讲课方式。藏文班由满喜、伊如勒图二位轮流讲授《四部医典》。采取先读原文，后用蒙语讲解的方式。这所学校学制二年，就读的学生有三名离校后改行，其余的结业后都开始行医，成了我旗蒙医界的骨干。在蒙民医学会成立初期，蒙医学校开学的同时，又举办了一期进修班，指定原来理论基础差的十多名蒙医参加进修，时间约一个月。

蒙民医学会成立后抓的第二件事是统一配药。按每个医生的用药习惯供应其所需药品。使蒙药的配制走上规范化，符合质量要求，从而提高了医疗效果。当时加工炮制蒙药的设备极其简陋，全靠手工操作。由学员轮流加工操作。药品虽然统一配制，但没有定价，医生不开处方。仍如从前那样，听凭病人根据自己的病情和财力施舍，或多或少不予计较。

蒙民医学会成立后抓的第三件事是，邀请党政领导干部给会员作形势报告，使蒙医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初步有所认识。

1948年末，蒙民医学会宣布解散，把学会所有的财

产和药品都分给了会员个人。让他们回到家乡后，以努图克（区）为单位建立医学联合会，开展医事活动。

蒙民医学会成立后，在一年稍多点的时间里，适应当时的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开展民主革命斗争等形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办医校，培养一批新的蒙医力量，初步解决了蒙医后继乏人的问题，以及为蒙医事业的继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 建国后各努图克（区）建立的医学联合会

各努图克（区）建立医学联合会是1949年夏至1952年间的事情。当时我旗划分九个努图克（区），先后都建立了医学联合会。蒙医都分别加入其所在努图克（区）医学联合会为会员。各医学联合会都选出了主任、副主任。一努图克（区）是德木林、德吉都；二努图克（区）是那顺敖斯尔、布和；四努图克（区）是达木林宁布、棍钱扎布、阿木古郎；七努图克（区）是甘珠尔、充来扎布；八努图克（区）是沙尔、波力杰。汉族聚居的各努图克（区）也都建立了医学会，因本文只讲蒙医沿革，故中医部分从略。医学联合会是一个学术性的群众组织。其宗旨是让散居于全旗各地中蒙医人员，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遵守和执行政府有关医疗卫生工作的政策法令，努力完成当地政府交办的医疗卫生工作任务。当时各努图克（区）都设有卫生助理，专管医疗卫生工作。会员每逢初一、十五集中到一起学习政治和业务，并向努图克（区）汇报疫情。

医学联合会在建国初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后来各努图克（区）联合诊所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 努图克（区）联合诊所及公社卫生院

1952年，各努图克（区）相继建立起联合诊所，由参加联合诊所的中蒙医入股集资办医。联合诊所设主任、副主任，下设会计、出纳、调剂和医生等。入股的形式是，把药品作价归诊所做资本，医生个人不得留药品。此外也有拿钱拿物投资的。为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绝大多数医生都是三个月，半年甚至整年不领取工资。医生的报酬起初实行分数制，即死分活评，每月评分发工资。股金不分红，逐步予以偿还。

联合诊所的建立，使多少年来一直个体行医的蒙医组织起来，开设门诊，实行门诊，又设药房和药库。这对蒙医是个从未有过的大变革。联合诊所不仅为群众治病防病，而且又肩负培养徒弟，解决后继乏人的重要任务。有的带出三五名，有的带出的徒弟多达十几名。

1958年实行公社化时期，联合诊所全部转为公社卫生院。其中有的已经转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公社化初期，旗医院设了蒙医门诊。办了两期蒙医专科学校，由老蒙医甘珠尔任教，先后有45人毕业于这所学校，并走上了工作岗位。在这期间老蒙医德木林、棍钱扎布参与自治区组织的《四部医典》的编译工作。棍钱扎布在哲里木盟医学界学术交流会上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主治医师甘珠尔参与了《医药月帝》的翻译工作。

现在全旗蒙医人员有80余人（不含乡村医生），有蒙医院和蒙药厂各一家，阵容可观，是我旗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支重要技术力量。

# 锡勒图库伦三大寺

齐克奇

昔日的锡勒图库伦，曾经是一个实行政教合一制的喇嘛旗。大大小小的十余座喇嘛庙全集中在库伦镇。其中兴源寺、象教寺和福缘寺素有锡勒图库伦三大寺之称。在这三大寺中，兴源寺以其创建年代之早，建筑规模之大，居于三大寺之首，为锡勒图库伦主庙。解放后，这三座庙均变成了旗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办公的地方。寺院内的佛像、经籍等均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毁掉。不过主要建筑大体上还保持原貌，使人见景生情，追想到昔日政教合一的锡勒图库伦模样。但是，十年内乱一开始，所有寺庙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大批判”的靶子和“大破”的对象。兴源寺做为锡勒图库伦的主庙，更是首当其冲，第一个遭到破坏。门前的旗杆被拔掉了，石狮子、石雕佛像被推倒了，院内的石碑被砸碎了，连庙顶正脊上的鸱吻，斜脊上的餮兽、走兽，翼角上的风铃等装饰物全被当做“四旧”而被除掉了。进而左右两座配殿、天王殿、钟鼓二楼、山门殿一一被拆毁了。象教寺、福缘寺也自然不能幸免，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而今外地人来库伦旗做客，都乐于到这三大寺转一转，之后不无惋惜地说：“寺庙若不遭到破坏，这里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点。一路先看一看大青沟阔叶林自然保护

区，再到这里转一转，然后再去游览奈曼王府……”。

现在，笔者根据手头的一些资料和部分老年喇嘛的回忆，加上自己少年时期的记忆，撰写这篇文章，希图对三大寺的原貌作点介绍，以飨读者。遗憾的是，三大寺各殿内数以百计的铜像、塑像无一幸存。就是那些佛像，各具何形态，多大多高，计多少尊等等，也无从查考，只好记述其大概而已。

## 兴 源 寺

### 一、缘起与沿革

早在17世纪30代，清王朝在开始联络蒙古各部之际，即在锡勒图库伦设一直隶于盛京的、政教合一的喇嘛旗。其用意是为进一步联络蒙古，作出兴黄教的姿态，最终达到完全“征抚”蒙古的目的。因此，清王朝自顺治年间到乾隆年间的近百年，在幅员狭小的锡勒图库伦的山沟里，大兴土木，竟修建了多座喇嘛寺庙。而兴源寺做为主庙修得最早，其规模也最大。它始建于1649年（顺治六年），竣工于1650年（顺治七年）底。顺治皇帝赐额“兴源寺”。后于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在其左右增建厢殿各一座。于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扩建。在原正殿的前面，沿着中轴线，修建了面阔九间，进深九间的，通称“九九八十一间”的正殿、天王殿和山门殿。两侧又对称地修建了配殿和钟鼓楼等。这次扩建和增建，用六年时间才告竣工。其后历任札萨克达喇嘛屡有修葺，但只是局部的，小规模。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又一次进行较大规模的改建和增建。这一次主要是重



建正殿。在建筑结构上采取汉藏结合式，改建为二层建筑。並在兴源寺和象教寺的四周筑起高大的围墙，使兴源寺和象教寺连成一片，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变成了一座规模恢宏的建筑群。这次工程历时三年，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告竣。

## 二、 兴源寺的建筑

兴源寺依北高南低的斜坡就势而建，主要建筑均在一条中轴线上，一连四进院落，层层递进，层层升高。中轴线两侧，辅以配殿、钟鼓二楼。布局上显得均衡、对称。在高大围墙之内兴源寺和象教寺左右相邻，有一堵墙相隔，並设旁门相通。西院为兴源寺，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山门前有旗杆、石狮子、石雕佛像一字排列。旗杆为三节五寸无缝钢管，斗大的镀金宝顶（长约五尺）闪烁有光，耀人眼目。据说日本侵略者进占库伦的那年，原来的松木旗杆被大风刮折。日本侵略者为了收买人心，给换成了金属旗杆。山门为单檐歇山顶，面宽三间，中间辟洞。左右两间各置一个木制法轮，高约八尺，直径约四尺，四面有铁环。每当举行法会时，虔诚信佛的人把着铁环，自左向右转动。法轮为空心，内装满了印有六字真言的经卷。据说把法轮转动一圈，即等于念诵六字真言千遍万遍，修福不浅了。山门殿两侧各有一座旁门，平时山门不开，只开旁门供人出入。走出山门殿，便进入第一层院落，迎面为天王殿，结构同山门殿，为两进三间四面带廊的殿堂。殿内东西山墙前塑有四尊法身雄伟的金盔戎装神像。东侧为持琵琶的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执宝剑的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西侧为手缠龙蛇的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执宝幢巨伞的北方多闻天王，身黄色。这四

尊神像均高一丈有余，身子坐在高台上，腿向前伸出，趴在其脚下相貌奇丑的妖怪都有十来岁儿童一般大小。天王殿院内东西两侧为钟鼓二楼，重檐歇山顶，一层屋架为砖砌，二层为木结构。东侧为钟楼，悬吊一口大铁钟，钟身约高七尺，最大外径约五尺，外皮刻有蒙、汉、藏三种文字。西侧为鼓楼，悬吊一面大法鼓。钟鼓二楼雄伟挺拔，与南北两面的山门殿和天王殿的歇山建筑浑然一体，相映生辉。天王殿平时不开，两侧砌墙，开两个旁门通后院。在第二层院落内青砖铺地，左右两侧各有三间硬山式配殿，左为十八罗汉殿，罗汉均为一般人大小的铜像。在十八罗汉殿台基的西南角距五六米处，也即天王殿背后靠东面，立有一块龟趺石碑，约两米多高。上端为盘龙，碑身两面刻有碑文，阳面为蒙文，阴面为汉文。可惜无人拓印下来保存，在“文革”中被毁，人们拾其碎块做了磨石，如今已无从查考，大概是记述兴源寺缘起的。右为护法神殿，所谓护法神者，均为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内有欢喜佛，用黄色绸缎做帘遮掩，只露其头部。在护法神殿石阶下不远处，有一块直径约一米，形状象锅盖的生铁嵌在地面上。据传在300多年前，在锡勒图库伦这块地方有妖魔“莽古思”作怪。为此曼殊习礼喇嘛奉达赖喇嘛之命，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用佛法将“莽古思”镇压，将它赶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里。洞口注入了铁水，使“莽古思”永世不能钻出洞外兴妖作怪。这本是神话传说，但是笃信佛教的人都信以为真，竟无人怀疑，更无人敢触动了。在“文革”中人们用铁钎把它撬开一看，原来只不过是约十厘米厚的一块大铁饼罢了。这大概是在铸造寺内大钟或大锅时，用所剩的铁水铸成。不成想却被后人附会成如上所

述之神话。第二层院落的北端为进入正殿的石阶，共13级。石阶两侧对称地竖立着两块石碑，高有一丈，碑座、碑边和碑端的花纹、盘龙造工十分精细。碑文为重建兴源寺时的募化名单。均在“文革”中被砸碎。拾级而上，进入第三层院落，台阶上端两侧有四尺高的女儿墙，连着女儿墙有亭两座，东西各一，东为鼓，西为钟。这口钟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九月铸造，是在“文革”中唯一幸存的一口钟。昔日举行每天一度的例会时敲这口钟。正殿占地面积为879平方米，屹立在全寺中心的一个宽大的台基上，居高临下，富有气派，给人以庄重威严之感。正殿面阔九间，深进九间，前出抱厦五间，平面呈丁字形。墙壁全上红涂刷。五间抱厦六根方形石柱支撑，柱内三间开门，二间开窗，两侧尽间各开一座随墙门。殿内为六十四根朱漆盘龙明柱，位于中央的四根为方柱，直通二层的顶盖，通称擎天柱，中间无楼板相隔，仰首上望，可见到高悬二楼藻井的蓝地金字，上书“兴源寺”蒙、汉、藏三种文体的匾额。纵横连着六十四根明柱的梁枋均绘有彩画。靠入口处的横梁上锦帘垂挂，靠西侧还挂有一排青铜铃，有一根皮绳垂地，用以摇铃。靠北檐墙为炕式高台，上面为一排佛像。中间供释迦牟尼，左右两侧各有几尊铜像或泥塑像。在释迦牟尼像前面置一盏紫铜大佛灯，高约五尺，口宽约二尺，盛油120市斤，称长明灯。其所耗用的油全来自施主的布施。在长明灯前面安放着一札萨克达喇嘛的宝座，高五尺、宽六尺。传说是清太祖皇太极把自己用过的宝座赏给了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于1931年3月政教分治之后，札萨克达喇嘛一缺分做二缺，原来的札萨克达喇嘛还俗改任旗札萨克，另任命一员锡勒图

喇嘛掌理宗教事务。但他不能享用札萨克达喇嘛的宝座，所以把这一宝座用黄缎蒙上，其前面另置一座位供锡勒图喇嘛用。在锡勒图喇嘛座位前面分左右两翼排列着一千个喇嘛的座位，上面铺有地毯。殿内东北和西北角，沿着后檐墙立有木制经架，上置《甘珠尔经》120卷，《丹珠尔经》200卷。兴源寺收藏《甘珠尔经》两部，其一部为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由兴源寺众喇嘛集体书写成的手抄本。东西山墙均挂有佛像，西山墙靠南挂有《六道轮回图》。在东西两座随墙门后置有木制楼梯，供人上下楼用。二层的结构很特别，外面回廊四合，当心是三间歇山顶四面出廊的殿堂。整个二层建筑就是一座四合院。回廊除前出抱厦部分外，东、西、北三面的外檐为砖檐，各开四个窗口。从外表看酷似西藏拉萨市布达拉宫的窗口。回廊的抱厦装直棱窗。回廊向里的一面檐柱与檐柱之间，用槛墙和隔扇连着。在回廊的东西两面靠北处，平时分别存放寺内用的各种铜器和跳布扎时用的衣装服饰。走出回廊便是天井，脚下是白灰砂浆地板。走过天井，即为三间殿堂，木结构屋架，屋檐下的花板均绘有彩画，画的全是佛像。这三间殿堂是全寺的最高点。屋顶的正脊上立有五尺多高的鎏金宝顶，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殿内东、西、北三面墙壁上悬挂着二十一度母的画像。与一层相通的四根擎天柱中间围有半人高的木栅栏，倚栏俯视可以见到一层的众喇嘛讽诵佛经的情景。自二层下来，步出正殿，沿着两侧的夹道转入正殿背后，拾级而上进入第四层院落。正面为吗呢庙，三间歇山顶四面出廊的建筑。廊柱为花岗石。在台基上庙门两侧各置四个带翅的法轮，高三尺，只要推一下，即转动好一阵工夫才慢慢停下来。庙内供着观音菩萨。据称吗呢庙为

哈尔稿苏木淖尔艾里屯施主出资修建。吗呢庙又称“莫呼尔苏莫”。笔者认为建造此庙的淖尔艾里屯施主来自阿鲁科尔沁旗莫呼尔地方，故有此称谓。吗呢庙后面为“额克苏莫”，意为母寺，为清初顺治年间所建兴源寺正殿。五间硬山式建筑，东西各有三间配殿。正殿内主供三世佛。即：过去世燃灯佛，现在世释迦牟尼佛，未来世弥勒佛。并存放着跳布扎用的各种脸谱面具。在兴源寺正殿西侧有七间圆山顶厢房，内有三间膳房，四间住房。膳房为小型法会办经膳，住房为供果尼尔喇嘛（即常住寺院内负责看守和打扫寺院的喇嘛）居住。吗呢庙西侧有两间厢房，形同火柴盒，通称“吐伯特格日”，意为藏式房屋，供吗呢喇嘛居住。兴源寺还有一座跨院，在西侧，有两座小门相通。跨院的西墙靠南有一座门楼，可供车马通行。因无其他任何建筑，这座跨院变成了举行法会时供喇嘛们解手的场所。

### 三、 兴源寺喇嘛及其待遇

兴源寺没有转世的呼图克图或呼毕勒罕。为首的喇嘛称锡勒图喇嘛，即为锡勒图库伦旗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缺出一向由清廷理藩院补放。1931年3月19日，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分治办法》之后，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一缺分为二缺，即行政一缺和宗教一缺。前者称旗札萨克，后者称兴源寺锡勒图喇嘛。原来札萨克达喇嘛大都来自青海省乐都县碾伯地方的萨木鲁家族，为藏族。至1931年3月为止相传23任。其中唯有第三任喇嘛西布扎诺门汗、第二十二任喇嘛阿克旺巴勒丹、第二十三任喇嘛罗布桑林沁等三人不属于萨木鲁家族。第二十三任喇嘛罗布桑林沁，在实现政教分治之后还俗而改任旗札萨克。这样，锡

勒图喇嘛一缺第一次由库伦旗蒙古族喇嘛充任。至1947年冬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为止，只相传三任。在政教分治之前，在札萨克达喇嘛之下设札萨克、德木齐、格斯贵各四缺，辅佐管理全旗政教事务。在政教分治之后，喇嘛因为不再参与行政管理，而其职务和名额都有了相应的变更。在锡勒图喇嘛之下只设德木齐、格斯贵各二缺，协助锡勒图喇嘛管理宗教事务。

锡勒图库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千个喇嘛之库伦”的称谓。这里的一千，是个概数。据《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记载，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为700人。民国初年所编《中华民国省区全志》记载为“约八百余”。由于锡勒图库伦为政教合一的喇嘛旗，而有人认为这里的喇嘛定会很多。甚至说：“锡勒图库伦三人同行，其中必有一个喇嘛。”实际上，这是一种附会。据一些老年喇嘛回忆和我们的调查，即使在清代喇嘛教全盛时期，这里的喇嘛未曾超过一千。因为清廷给锡勒图库伦喇嘛的度牒与钱粮，是按一千人的固定数额发放的。清末民初喇嘛教日趋衰微，至解放前喇嘛人数已经减少到四五百人。其中大都散居农村牧区，名为出家，其实不离家。他们都有妻室，有的还用一定时间参加农牧业劳动。笔者对解放前寺院周围的喇嘛住房作了粗略的统计，其数目不超过一百。按一百计算，常住寺院的喇嘛至多不会超过一百三五十人。

关于喇嘛的待遇，清初规定给锡勒图库伦喇嘛按一千人的名额发放俸银和口粮。即：银1000两，米1000斛，羊1000只等。此外，札萨克达喇嘛另有俸银。至于札萨克、德木齐、格斯贵等喇嘛官员乃至格伊格（低级公务人员）均

拥有指定的达尔罕户，按规定数额为其缴纳银两和粮草。在此不作赘述。

于1911年清王朝覆亡后，喇嘛的待遇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库不再发放俸银和口粮，改由寺庙发放。起初，每人每年2000个制钱，后减到1000个制钱，再后来没有财力可发放，喇嘛生活不得不全靠施主的布施来维持。

清时规定旗民凡有三个儿子者，必须送其一个儿子到庙上当喇嘛。每逢举办玛呢法会时，即对适合当喇嘛者普遍进行一次登记。但是由于喇嘛有其限额，被登记者不一定全都去当喇嘛。另外一种情况是，未经登记者自愿当喇嘛，也不受限制。

#### 四、兴源寺的例行法会

兴源寺规模盛大的法会每年举行四次。即：正月初五至十五日；四月初十至十五日；六月初六至十五日；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举行这四次法会时，全旗大小喇嘛全部参加。其膳食由寺院供应。正月和六月的十四、十五两天为跳布扎。据记载，于1673年（康熙十二年）第八任札萨克达喇嘛额尔德尼绰尔济曾经奉命持诏赴藏，于第二年返回。随之布扎舞由西藏传入锡勒图库伦，并成为盛大法会的一项内容。为此科尔沁施主丹毕却荣诺颜捐助布扎舞服装。布扎舞，又称查玛舞，俗称跳鬼。布扎舞按其规模大小，区分为完全的与不完全的。兴源寺布扎舞为完全的，须有120名青壮年喇嘛参加。除格斯贵和乐班喇嘛外，均戴各式各样的脸谱面具。其衣装服饰有两套，一套是完全用缎为料做成的。另一套是用普通棉布做成的，一般用于雨雪天穿着。每当跳布扎时赶来围观的男女老幼很多。进入场地后男女必须

分开，男的在右侧，女的在左侧。通常由寺内的格伊格喇嘛协同旗卫队士兵或警察维持场内秩序。四月和九月的法会，因为没有跳布扎这一内容，所以赶庙会的人比较少。四月的法会自初十开始至十五日以熏坛结束。九月的法会自二十一日以熏坛开始至二十五日结束。所谓熏坛，即修一正方形土坛，高约一尺，宽约五尺，其正中点燃一堆火，用特制的长柄勺往火堆上添加五谷的种子和油等。除上述规模盛大的法会之外，八月十五日，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除夕通宵，都有小型法会。另外，每隔三年，即逢牛、蛇、鸡年举办一次吗呢法会。这是一次规模尤为盛大的法会。法会的筹备工作提前两个月即开始，主要是制成吗呢丸，然后专程到阿鲁科尔沁旗把装吗呢丸的奔巴瓶取来。吗呢法会从七月初五至初七，用三天时间整修座位，从初八正式开始至十四日，举行七昼夜。在这期间，凡参加诵经的喇嘛必须持斋，不得走出寺院外围石子摆成的界线。每逢吗呢法会，不仅本旗的善男信女前来朝拜，邻近各旗的也纷纷赶来进香。届时，在兴源寺院内院外香客云集，当街货摊摆得琳琅满目，热闹异常。

这里须作补述的是，阿鲁科尔沁旗协理台吉日格吉卜（年代无考）是一位笃信佛教而乐善好施的人。他特意制作一个奔巴瓶，并一次即献出2000头牛，分别送给包括锡勒图库伦兴源寺在内的四大寺庙，做为经费来源，轮流举办吗呢法会。即四大寺庙轮流值年，使用同一个奔巴瓶。由是日格吉卜得名奔巴图萨拉嘎其（图萨拉嘎其即协理），久而久之，人们倒把他真实名字忘记了。1937年为牛年，轮到兴源寺举办吗呢法会。为此兴源寺照例派人到阿鲁科尔沁去



请奔巴瓶。竟被施主日格吉卜的后代子孙所拒绝。理由是兴源寺把原来做为经费来源的500头牛，早已挥霍净尽，如今举办吗呢法会却向旗民募化，有违于施主的本意。故这一年的吗呢法会和其后蛇年（1941）的嗎呢法会，不得不另找奔巴瓶取代。鸡年（1945年）的嗎呢法会正进行筹备，后因时势所迫而中止。

### 五、兴源寺喇嘛的戒律、学位与封号的授受

喇嘛的戒律通常分三种。即：班弟戒、格斯勒戒和格隆戒三种。这三种戒得分三次授受。班弟戒为出家当喇嘛第一步所受的小戒，一般由教师喇嘛授予。格斯勒戒，为第二次所受的戒，受格斯勒戒的喇嘛必须参加东西雅尔乃庙法会，而后才能受此戒。格隆戒，为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受戒，又称大戒。受格隆戒者才算为一个正式的喇嘛，可以独立地进行诵经礼佛的活动，才有资格接受学位和称号以及担任职务。兴源寺喇嘛的格隆戒，通常由寿因寺迈达里呼图克图授予。

兴源寺给喇嘛授予的学位有两种，即：固什、绰尔济两种。一般是根据喇嘛的学识与资历，由锡勒图喇嘛授予。除此，还有授予黄色袈裟的，这是一种荣誉待遇。一般是取得绰尔济以上学位的，年事较高的喇嘛才能享受这一荣誉待遇。享受这一待遇的喇嘛，参加或不参加例行法会，听其随便，不受约束。对享受这一荣誉待遇的喇嘛，其他学位高的喇嘛都得表示尊敬。如：在座次排列上，让享受荣誉待遇的喇嘛座其右首。授予学位和荣誉待遇的仪式，通常在吗呢法会结束的喜庆时刻举行。也可以在正月初一众喇嘛聚会向锡勒图喇嘛拜年时举行。取得学位的喇嘛除了向锡勒图喇嘛献

哈达，馈赠礼物，表示谢意之外，还根据自己的经济力量，为参加法会的全体喇嘛备办膳食，以示庆贺。

兴源寺对违犯戒律的喇嘛，视其情节轻重，执行惩罚。其惩罚有以下六种：

- (1) 罚站；
- (2) 罚叩拜；
- (3) 罚跪；
- (4) 鞭笞；
- (5) 罚其出资备办经膳；
- (6) 逐出法会（即令其还俗）。

以上六种惩罚，通常由格斯贵喇嘛监督执行。

#### 六、 兴源寺喇嘛的衣食住行

锡勒图库伦的喇嘛，即兴源寺喇嘛，受班第戒之后便可以肩披称做“苏门奥尔黑木扎”的轻便袈裟，身穿黄色衣服。这是锡勒图库伦喇嘛特有的一种待遇。在其他地方，只有大喇嘛或担任德木齐以上教职的喇嘛，方可肩披“苏门奥尔黑木扎”，身穿黄色衣服。喇嘛平时的穿戴与俗人只有颜色的不同，式样无甚差别。但夏季服装和俗人大不一样，即上身穿一种称做“额仍”的坎肩，下身围双层裙，里面一层称“班扎拉”，为白色衬裙。外面一层称“善塔巴”，为紫色的罩裙。头戴一种用薄纱缝制的形状如钹的大檐凉帽。不过这只是参加法会时穿着，平时很少用。取得固什以上学位的喇嘛春秋两季戴桃形帽。

喇嘛人不得吸烟和饮酒。但吸鼻烟（又称闻烟）则不受限制，并且多数喇嘛吸鼻烟。有的还自己动手配制鼻烟。其所用的鼻烟壶，一般都是玛瑙、琥珀或细瓷的。他们十分讲

究鼻烟壶的质地，见到质地色泽兼优，制作精美的鼻烟壶，把玩欣赏，爱不释手。喇嘛人在彼此见面时，互相递换鼻烟壶。这自然成了一种礼节。

兴源寺和印务处驻在的土城东西两侧，分别称做东库伦、西库伦。喇嘛住宅都集中在这两处。一个人出家当喇嘛以后，由其家族在喇嘛住宅区内为他修建一套住宅。其所有权归这一家族，凡出自这一家族的喇嘛均有权居住。喇嘛住宅都是单门独户、小院落。因孑身独处，其庭院和室内都十分洁净，所有什物的放置都井井有条。

有较高学位的喇嘛手下都有小班弟供使唤，有三二人不等。小班弟边学习经文，边侍奉做经师的老喇嘛。他们早起晚睡，打扫庭院和室内，担水劈柴，烧水煮饭，还要背诵经文，稍有差错便挨打受罚。

喇嘛人的性格气质与普通人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宗教戒律的约束，受其生活环境的影响所至。喇嘛人的个性特征主要是：喜欢离群索居，要求清静、净洁。起居有规律，手脚利索。做活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们大都手巧，尤其擅长擦拭、洗涤和烹饪及裱糊；不善于或不喜欢交际，遇事拘谨、胆怯，待人唯唯诺诺，说话藏头露尾；十分爱惜财物，花钱讲究节省，斤斤计较，特别讨厌借钱借物。

### 七、 兴源寺的财产及其收支情况

兴源寺的经济来源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喇嘛的募化，施主的布施和奉献等。这方面的收入，一般用于修缮寺庙和举办法会等方面。二是直接进行封建剥削取得的收入。这部分在兴源寺的经济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兴源寺在库伦镇占有街基地和房屋，按年度收取租金。还有两处柳条禁地，取

得大量烧柴。另外还经营商业，进行投机买卖，放高利贷等，其收入是很可观的。这部分收入用于给喇嘛发放钱粮，一小部分用于办法会期间的膳食。而相当一部分则为管理财务的人员所任意挥霍浪费和中饱私囊。据记载，清雍正年间，第十一任札萨克达喇嘛登森托年迈体衰请求退职，其时因无适当人选替补而清廷未准，特遣毕勒格图诺门汗前来辅助。在他辅助管理期间，兴源寺始设专管喇嘛庶务的机构，称为吉斯。曾设有东西两处吉斯。吉斯通常由一员德木齐负责管理。后来由于吉斯专事经营买卖，把负责管理的德木齐改称掌柜的。民国年间，西吉斯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在直奉战争期间，东北军阀某旅向山海关进发，取道库伦时劫掠设在库伦镇的一家银行，致使该银行倒闭。其所发行并在库伦镇流通的一种钞票竟变成了废纸。当时东吉斯存有这种钞票多达五麻袋（也有七麻袋之说），因全部报废而蒙受重大损失。加上管理人员从中作弊，也濒于破产倒闭，除勉强为例行法会提供膳食之外，再无力经商和从事其他活动了。

## 象 教 寺

### 一、 象教寺的建筑与布局

象教寺位于源兴寺东侧，始建于1670年（康熙九年）。其建筑布局与兴源寺不同。山门在围墙内，山门前为一进院落，即喇嘛跳布扎的场所。兴源寺每年正月和六月举行法会均在此跳布扎。观看跳布扎的群众经兴源寺院内出入，也可以从广场东侧的大门出入。象教寺山门为三间歇山顶建筑，辟三个门，中间为大，平时板门紧闭，两侧为小，供人

出入。跳布扎的喇嘛从这两侧的小门拾级而下，进入场内。山门两侧各有两间正面敞开的圆山顶小屋，做扇面状建在约五尺高的台基上。在跳布扎时，有札萨克、德木齐等职衔的喇嘛坐在这里观看。广场前靠近围墙处有一堵硬山式八字影壁，高一丈余，东西长十丈余。影壁前为炕式高台，跳布扎时翁斯德（领诵喇嘛）、哈木扎和乐班喇嘛共30余人坐其上面。在广场东侧，即东大门内靠南有一眼井，在井的西侧有五间膳房，内置一口一次下二石米的特大号锅，还有二口大号锅。每次举行盛大法会，即用这几口大锅煮饭。入山门，为第二进院落，迎面的是象教寺正殿，三间单檐歇山顶建筑，山门至正殿石阶下为铺青石的甬道。在甬道两侧立一对石雕旗杆。正殿门额悬挂上书蒙、汉、藏三种文体的匾额。跳布扎时，喇嘛们即在正殿前的月台上换装和卸装。殿内主供弥勒佛铜像。铜像有一人高。每年正月和六月，兴源寺法会结束的一天，即正月和六月的十五这一天，将这尊铜像请到广场，由喇嘛二人从两旁搀扶而立，法会结束时请回殿内。正殿两侧为通檐连脊的圆山顶厢房，计20余间，内有喇嘛住房和膳房。正殿后面为一堵花墙，正中为一座垂花门，两旁各有一座圆门。步入垂花门为第三进院落，迎面为五间硬山式殿堂，称无量寿佛庙，是札萨克达喇嘛供佛的场所。院内有两株柏树和一株文冠果树。两侧各有六间圆山顶厢房，与第二进院落内的厢房相连。是喇嘛印务处（也称办公处）的办公地方。

象教寺通称上仓。过去把呼图克图、活佛的住宅称为“佛爷仓”。这“仓”就含有公寓、寓所之意。象教寺所以称仓，因为即是札萨克达喇嘛的住处，又是其办公的地方。

之所以称上仓,是为了与福缘寺相区别。锡勒图库伦三大寺之一的福缘寺通称下仓。之所以称仓,是因为副札萨克达喇嘛,即札萨克达喇嘛的法定继承人,和札萨克达喇嘛退职以后的住宅,均设在福缘寺的缘故。象教、福缘二寺所以分别称上下,是因为象教寺位于福缘寺北面偏西的斜坡上,而福缘寺却位于其坡下偏东的地方。

象教寺为行使政教权力的中心所在,其建筑规模虽远不及兴源寺,但在各寺庙内它却占居特殊地位。在象教寺听人使唤的格伊格喇嘛走到外面来,自以为高人一等,总是昂首挺胸,不把其他寺庙的喇嘛放在眼里。其他寺庙的喇嘛除非公事,不然平时不敢进入象教寺院内。因此,昔日广泛流传一句俗语,说“庙里的燕隼怕仓里的麻雀。”由于适应札萨克达喇嘛居住和印务处办公的需要,象教寺在建筑格调、布局上与其他寺庙迥然不同。在整座院内佛殿只占 $1/4$ 的面积,其余 $3/4$ 的面积均为札萨克达喇嘛和印务处占据。在象教寺院内有正、厢房近100间,东面和北面有三座大门楼供车马通行。无量寿佛庙的东侧,有一座独立的,封闭式的院落。其围墙与外面的围墙一般坚固,一般高大。南面靠西有一座门,拾级而上进门迎面是磨砖对缝砌成的小型影壁。转过影壁步入院内,脚下是方砖埭地,有几株翠柏间杂梨树和紫丁香。若于旧历四月,丁香花盛开,满院飘香。正面为堂屋五间四柱,方形石柱刻有蒙文对联。这五间堂屋称玉柱堂。每年正月元旦,札萨克达喇嘛在此接受印务处官员前来拜年献哈达。紧贴玉柱堂东侧有三间楼阁,是札萨克达喇嘛办公的地方。又其东侧有三间翼房,是札萨克达喇嘛之寝室和进膳的地方。院的西面有一座随墙门,平时南门紧闭,只开

西门供人出入。此门北侧，即玉柱堂西侧，利用围墙和堂屋的夹缝修一间小平房，向西开一窗口，为值班房。如有人因事求见札萨克达喇嘛，即到此窗口前，向值班喇嘛说明来意，等候传达。这整座院落显得幽雅古朴，十分宁静。在这独立的院落前后又各有一座院落。除在后院内有一座五间硬山式救度佛母庙而外，均为喇嘛印务处所用的公房。其中有一座客厅，三间硬山式建筑，单独座落在无量寿佛庙的西北隅。这是札萨克达喇嘛宴请客人的地方，前面为夹道直通山门前的广场。其余一般公房不作细述。

## 二、 象教寺喇嘛

由于札萨克达喇嘛的住宅和印务处都设在这里，而寺内不设大喇嘛，只设一常斯德喇嘛掌管寺庙事务。由于常斯德喇嘛直接管理札萨克达喇嘛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而往往成为札萨克达喇嘛的贴身心腹，以致能够左右札萨克达喇嘛的行动。平时札萨克、德木齐等官员都畏惧他几分，还得想法多方巴结他。

清末民初，象教寺喇嘛达到100余人。与其他寺庙不同的是，在这些喇嘛中不谙佛经者不在少数。因为在这些喇嘛中除一部分喇嘛从事诵经礼佛之外，其余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常斯德喇嘛管理诸项事务，服侍札萨克达喇嘛和札萨克、德木齐和格斯贵等喇嘛官员，或办理印务处的公务等。1931年3月政教分治之后，札萨克达喇嘛还俗并改任旗札萨克。从此以后象教寺开始设一大喇嘛，掌管寺庙和喇嘛事务，但其管辖范围同以前的常斯德相比较已经大大缩小。在伪满洲国时期，由于其所拥有的大量土地全都被施主抽回，以致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而寺内喇嘛日益减少。至40

年代初，已减少到不足40人。

### 三、 象教寺的财产

象教寺拥有的财产，土地集中在哈尔稿苏木胡吉仁高勒和沙巴尔台以北至宰曾图屯。南北宽约十华里，东西长十五华里。为此昔日曾经流传一句话，说“宰曾图、胡吉仁高勒和三个沙巴尔台居民家的灶台都是上仓的地。”这里的大片土地都租给上述几个屯农户耕种，每年收租达200石谷物。此外，还有几处林地、柳条禁地和草场。在库伦镇上又有房屋出租。象教寺所以拥有如此大量的土地和林地及柴草场，据说其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多年来虔诚信佛，乐善好施者的施舍。二是，在两个人或两个屯落之间，就一块土地或柴草场发生了争议，长期得不到解决时，可由其一方提议将这块土地或柴草场奉献给寺庙。象教寺拥有的相当一部分土地就是这样取得的。1931年实行政教分治以后，昔日人们当做文殊师礼菩萨的化身，顶礼膜拜的札萨克达喇嘛还俗，娶了妻子，变成了世俗官员。从这时候起，喇嘛教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尤其是象教寺所占居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了。人们不仅不再奉献，反而将已奉献的土地和柴草场一一抽回。因此，象教寺除了出租房屋的一小部分收入之外，再无其他收入了。

### 四、 象教寺的哈力亚图（属民）

白音花苏木查干朝老台屯，哈尔稿苏木新秋屯和库伦镇皂户沁嘎查的一部分居民均为象教寺的哈力亚图。

## 福 缘 寺

### 一、 福缘寺的来历及其建筑布局



福缘寺始建于1742年（乾隆七年）。据记载，乾隆初年在喇嘛内部曾经发生纷争。为此时任札萨克达喇嘛阿旺扎木扬呼图克图建造佛塔一座和寺庙一座。意思是用以镇服暗中作祟，危害黄教的邪魔。寺庙建成后，乾隆皇帝赐名“福缘寺”，塔立在寺院背后的高崖子上，为白色舍利塔，高三丈有余。塔在“文革”中被毁。寺庙建于塔前，在中轴线上由南而北，一连四重殿宇。即山门、诵经殿、佛殿和老爷庙等。在东西廊房的南端为偏殿，各三间，偏殿和山门之间为钟鼓二楼，左为钟楼，右为鼓楼。东西侧廊房、偏殿对称配合，围成了一座三合院。占地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山门殿为三间歇山顶建筑，中间辟门，两侧为四大天王塑像，其前面，即沿着门洞两侧立有两排木制栏杆，上置伞、扇、旗、牌、钺、仗等用于仪仗的器具。门洞正中间悬挂用蒙汉、满三种文体刻制的蓝地金字匾额。山门殿两侧均有一座旁门，平时供人出入。诵经殿为藏式二层建筑，面宽五间，深进五间，故称二十五间。这是寺内举办佛事活动的场所，殿内主供宗喀巴和白、绿度母塑像。宗喀巴塑像前置一呼图克图喇嘛宝座。之前为众喇嘛座位，计150个座位，上铺一层羊毛毡，再铺一层栽绒毡。二层上藏有北京朱版120部《甘珠尔经》，每部的夹板都贴黄色锦缎，装帧颇为精致。诵经殿后为佛殿，是福缘寺主庙，五间重檐庑顶建筑，重檐下三层斗拱，层层伸出，花板彩绘。前檐出廊，内外檐的梁、柱都有旋子，以及方格天花板和多边形藻井均为彩绘雕刻，装饰精细。明间并开三门，尽间装直棂窗，门前有月台。其建筑在锡勒图库伦所有寺庙中独具一格。殿内主供三世佛。佛殿的背后有两株高大的树，左为松，右为柏，树的

顶端与佛殿宝顶一般齐。这一松一柏为如今库伦旗唯有的古树，大约是在建庙的同一时期栽植的。在这两株古树后面为老爷庙，为硬山顶两层建筑，面宽五间，正中的三间向上突出一尺五寸。这里主供关羽。其东面的一间为寿因寺迈达里呼图克图来库伦讲经时下榻的地方，故称葛根斡尔多。其西面的一间存放刀、鞍、辇之类。二层上有一座鎏金的铜制舍利塔，高三尺有余，塔内置放呼图克图喇嘛的舍利（遗骨）。笔者认为这当是锡勒图库伦第十二任札萨克达喇嘛阿旺扎木扬呼图克图的舍利。理由是福缘寺为阿旺扎木扬呼图克图所建造。他在任时间长达32年，在阐述教义，整饬教规，弘扬佛法等方面有所建树，深受喇嘛徒众的敬仰。再说在锡勒图库伦历任札萨克达喇嘛中被清廷封为呼图克图者唯有他一人。福缘寺的东西偏殿为各三间硬山式建筑。东偏殿供龙王、西偏殿供护法神。于1926年（民国15年）设却伊喇扎仓（即哲学学塾）之后，在山门殿前的影壁前面，整修了一处进行出题辩论的场地。

福缘寺在其东侧带一座跨院，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正厢房共有50余间。这里为札萨克达喇嘛退休养生的地方，故称下仓。在下仓除设有退休札萨克达喇嘛的寓所之外，还有执事喇嘛的执事房，以及膳房、仓房和磨房等等。

## 二、福缘寺却伊喇扎仓的设立

锡勒图库伦虽然以喇嘛旗著称，但是原来没有喇嘛教的学塾。于本世纪20年代初，才准备设却伊喇扎仓。为此每年抽出20名喇嘛派往寿因寺迈达里呼图克图处学习，持续四五年，至1926年夏历六月初，将历年派往寿因寺学习

的百十来名喇嘛接到下仓来，并聘请迈达里呼图克图来库伦，做却伊喇扎仓住持大喇嘛。此后，迈达里呼图克图在库伦住了三年之久，直到1929年才离开库伦返回寿因寺。之后从土默特聘请一位喇嘛来做住持大喇嘛。后由修学于西藏哲蚌寺的毕力棍继任住持大喇嘛职务。在却伊喇扎仓设立初期，福缘寺与却伊喇扎仓互相没有隶属关系。过了二年后两者才归并到一起。共有喇嘛110人。福缘寺在住持大喇嘛之下设德木齐喇嘛一人辅佐管理寺庙事务。此外还设有尼日巴和包伊达等执事喇嘛。

福缘寺与却伊喇扎仓归并一起之后，除举办四月十一至十五日和十二月二十七至翌年元旦的例行法会之外，花费更多更长的时间举办却伊喇扎仓的例行法会。却伊喇扎仓的法会一年四季都举行，而且每一季度分三次举行，第一次历时一个月，第二次历时20天，第三次历时15天，当中只间隔几天时间。因此，却伊喇扎仓的法会是紧凑而又繁忙的。

却伊喇扎仓给修学于扎仓的喇嘛可以授予兰占巴、道兰巴等学位。1926年设却伊喇扎仓之后，先后曾有六位喇嘛分别取得上述两种学位。

### 三、福缘寺的财产和喇嘛的生活待遇

福缘寺设却伊喇扎仓之后，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及其手下执事的赵宝善、博和朝鲁等人捐助了大笔金钱。却伊喇扎仓用以置买大量土地，很快变成了在锡勒图库伦各大寺庙中最富有的寺庙。据说仅土地一项就有70000多亩，存粮多达1200石。因而喇嘛的生活待遇很高，每月每人小米一斗，炒米一斗，又有现金。过年时另外还发放面、肉和

蔬菜等。后来由于历任执事喇嘛营私舞弊，富有程度有所下降。但其拥有的财产还是比较可观的。据1947年7月间的一次财产登记：却伊喇扎仓拥有的财产主要有土地51265亩，林地120亩，菜地70亩，房基地30亩，出租房屋161间。当时在西喇嘛苏鲁克和新秋两处出地窝铺，雇用十多人种地，每年打粮200石到300石，另外出租土地约800亩，所收租粮可达160石。却伊喇扎仓的喇嘛由于生活来源有保障，并由于法会频繁，而不外出念经。40年代初，喇嘛减少到70人，每人每月所得粮食也减半。后来把土地分给喇嘛去耕作，不再按月发放粮食。

#### 四、 福缘寺的哈力亚图

西喇嘛苏鲁克、西牌楼和塔班拜生等三个屯的居民为福缘寺的哈力亚图。

# 库伦关帝庙

程玉富

根据史料记载，库伦关帝庙（俗称老爷庙）始建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是由库伦、土默特、宾图、敖汉的蒙汉人联合建成。在前清“蒙疆封禁”的时代，政教合一的库伦旗由于其特殊地位，成了一处开放的商旅聚散地。南通奉天、锦州、义州、营口、大连等处，北达呼伦贝尔、东西乌珠穆沁、巴林、扎鲁特、宾图等地，曾是繁华一时的牛马交易市场。这一特殊地位刺激了库伦经济、文化的发展。库伦关帝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修建的。关帝庙从一开始就由库伦街商会筹建，由库伦街商会管理，并且是商会的聚会场所。庙上虽有住持和尚，但是完全听命于商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绥东县在库伦设治后，曾在关帝庙建起“库伦街两级小学校”。库伦关帝庙的宏伟建筑和围绕关帝庙举办的各种庙会活动，反映了那一时期小库伦的经济文化概貌。

土地改革后，翻身觉悟了的库伦人民再也不乞怜于关帝这一偶像。关帝庙随渐次遭到破坏，到1960年因修水坝，完全毁掉。现在唯一可以凭吊的是埋在库伦镇西头水库里的半截石头旗杆。本文是笔者采访了多位库伦老人和查阅资料后整理而成。意在显昭库伦历史文明，以励后人。因年

代久远，众口不一，内容难保确凿，甚至以讹传讹，也未可知。还望知情者，不吝赐教。

—

库伦关帝庙座落在库伦镇中街西端。占地约6000平方米。

关帝庙分东西两个建筑群。中间有角门相通。四围是高大的青砖围墙。

东面的建筑，中轴线上一连二进院落，左右建筑对称配合。最前面的山门是三间起脊硬山式瓦房。中间是门洞。两扇朱漆大门，尺许高的门坎。大门上金钉排列，一面一个兽头门环。门上高悬“关帝庙”巨匾。门洞两边各一间马殿。屋内各有全鞍泥塑马一匹，马童一个。马左红，右黄，有五彩鞍饰，普通人扬手可够马背。马童手执辔缰，神态安详。整个山门座在十三级石阶之上。在山门两侧还各有一道旁门，供平日出入。山门前石阶上有石狮子一对，石质旗杆两根。旗杆高三丈六尺，各三节，用铁箍套接，上雕祥云和盘龙。据传当时对接旗杆很费周折，众匠人百思无计。后来领工匠人夜得一梦，关帝责其无能欲用土将其活埋。惊醒后顿悟，决定用堆土法。一筐一篓，硬是垒起二丈四尺多高的土堆，接好旗杆。

进得山门，沿中轴线，穿过二门，直至关帝庙正殿是方石铺成的甬道，两侧均为青砖铺垫。一进院内两厢各有五间青砖筒瓦房。东厢房曾是两级小学校舍。厢房南端东面是钟楼，西面是鼓楼。都是二层的重檐建筑，雄踞挺拔。

在二道门前两侧各有一座石碑矗立。碑上一面刻有建庙

施舍资财的人名，一面是刻有“敕建”字样的建庙铭文（可惜石碑已失，铭文不得其详）。碑下夔夔踞伏，驮着石碑。

二门是一间门楼建筑，两扇朱漆大门。门首悬挂“万古英风”巨匾。二进院内正面是关帝庙正殿。三间正殿座落在四尺多高的台基之上，气势雄伟，富丽堂皇。东西有配殿各三间，一色青砖筒瓦，起脊的硬山式建筑。正殿左右各有两间耳房，耳房与配殿之间又各有厢房三间。正殿台阶前甬道上是一座高丈余，由一块巨石雕凿而成的焚香亭。亭有六角六面六个门。每门旁都镌刻有对联、图饰，周围是雕花栏杆。整个二进院落显得匀称齐整，古朴典雅。

## 二

关帝庙的主建筑是正殿，座落在中轴线的最后缘。殿基高出青砖地面四尺多。三间正殿属于飞檐起脊歇山式建筑，彩绘油饰，雕梁画栋。拾级而上，正而是三间三扇对开朱漆花格大门。门前是一丈多宽的抱厦，与东西山墙外的游廊相接。

正殿门楣上高挂“亘古一人”蓝地金字巨匾。

大殿三间一明，南北跨度三丈有余。关羽泥塑像巍然高坐。绿袍金脸，五络长髯。头带冕旒，足登厚底卷檐儿靴。为与君王区别，关帝的冕旒玉串少二，为十一串。关帝身后有两小童手执龙凤扇，座前左右围着木制雕花屏风。两侧各有一军校，执令牌、令箭。关帝头上悬挂的是乾隆御赐“正大光明”匾额。上书“乾隆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敕封”，并有乾隆印鉴。

关帝座前是并排两张紫檀木香案。前面的香案正中是贴金香炉，炉内香烟缭绕，终日不绝。炉两旁是两个贴金蜡台，点的蜡烛全是金字红蜡，二尺高，碗口粗细。后面的香案高出半尺，也是中间放香炉，两侧放蜡台。香炉高一米，一尺见方，四腿拱立，里面不点香火，只做摆设观赏。

两厢是关羽的八员战将立塑像。一侧是黑脸周仓，手执青龙偃月刀，关兴、王甫；一侧是关平手托宝剑，廖化、赵磊（另两位记不起名字）。每人面前有香炉一座。一个个气宇轩昂，威风凛凛。

殿内从东山墙南端起，三面墙壁画的是全部三国故事。“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诛颜良斩文丑”、“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华容道”、“战长沙”、“单刀赴会”、“水淹七军”……、一幅幅画工精细，形象逼真，场面壮阔。生动地记录了关羽的神勇。

正殿左侧是东配殿，三间一明。供奉天、地、人三皇。

右侧西配殿，也是三间一明。室内供奉几尊泥塑像，有财神赵公明，有木匠祖师爷鲁班，毡子匠祖师毡弹老祖，还有灶王等。殿内南北山墙和西檐墙均有壁画。其中最吸引观众注目，最足珍视的是灶王身后的一幅。画面上是一条两端系在铁钉上的红绒绳，绒绳上挂着年历、蒲扇、念珠、眼镜等什物。铁钉、绒绳和几样挂着的什物，影子投在白灰墙上，使人初看分辨不清是绘画，还是实物。画面上没有衬托主体事物的背景，也没有表示幅面的框边。这正是作者的技巧所在，也是使人分辨不清真假的奥妙所在。



### 三

关帝庙的西部建筑是前后两栋房。后栋是五间平房，两开门，与关帝庙正殿列齐。东首两间是伙房，西首三间是丈房，供住持和尚住宿。

前栋房是硬山式青砖筒瓦庙宇，东西两间。东间是“三霄娘娘庙”。相传三霄娘娘是赵公明的三个妹妹：云霄、碧霄、琼霄。在三霄娘娘座下两边分立着痘疹娘娘、送生娘娘、十不全（施世纶）等四尊像。

西间称“九圣祠”。供奉的是马王爷、城隍、土地、龙王、虫王、山神、苗神、閻君等九位。九圣祠一进门左右是两个青面獠牙面目狰狞的小鬼，一个手举狼牙棒，一个手执追魂索命牌，牌正面写“勾魂取命”，背面写“你可来了”。壁画是十殿閻王公事图和十八层地狱图。

娘娘庙和九圣祠都自成套院，各有门楼与西部院子相通。整个西院前有大门与关帝庙山门平行。

关帝庙西大墙外是一片杨树林，郁郁葱葱。清冽的库伦河水由北向南依杨树林边汨汨流过。到山门前折而东向，呈L字对关帝庙形成半包围。关帝庙山门前小河南北岸地势平缓，各有一大块开阔地。前面的缓缓流水和远处的沟崖，把依山傍水的关帝庙装点得更加阔展雅静，宏伟壮观。几百年来它与库伦镇东端的兴源寺、福缘寺、象教寺等古庙宇建筑群壁立呼应，相映生辉，谱写了一篇灿烂辉煌的库伦文明史。

### 四

库伦关帝庙闻名遐迩，不只是它建筑宏大雄健，还在它的庙会活动规模壮阔，热闹非凡。

关帝庙是诸神齐聚之地，各种各样的神事活动非常频繁。如旧历三月十五日閻王庙会（俗称鬼节），四月十八日娘娘庙会，四月二十八日的药王生日等。加上进香、许愿、施舍的各路善男信女纷至沓来，关帝庙很少有清静的时候，终日香火不绝，但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的要数旧历五月十二日的关帝庙会（俗称“老爷出巡”）。

自从关帝庙建成到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关帝庙会成了库伦镇人民的传统节日，规模越办越大，场面也越办越红火。据现在库伦镇的几位耄耋长者讲述，庙会在清末民初的三二十年里特别隆盛。

每逢旧历五月来临，库伦街里就充满了节日的喜气，人们谈论的中心也转到庙会活动上来；今年将有什么好节目，唱什么戏，谁的马最好，会上将有什么好商品供人选购等等。

最忙的要算商会了。每年的五月十二的庙会都由库伦街商会主持，筹措资金、安排活动、布置庙院。为了职责分明，商会排定每年由一家商号值年。当值的商号由老板或掌柜的出面操持一切，称为值年人。各大小商号店铺作坊除供奉例银外，还要各自组织安排节目，如“五花棍”、“秧歌”、“抬歌”、“背歌”、“耍中幡”、“高跷”、“旱船”、“舞狮子”等等。对此，大家都很尽心。一方面向关帝祈求庇佑，一方面是夸富耀荣，希图隆盛。因此，即使是平日里克扣百姓，惜财如命的吝啬鬼儿们，此时也要做出慷慨解囊的“大方”表示。

到五月初八、九，商会的值年人或受委托的执事，就开

始在关帝庙“办公”了。西配房是执事房，东配房搭起锅灶，供应办会人的膳食。

准备工作从清扫殿堂和搭棚架开始。每年庙会前都要把关帝庙二进院内完全棚住。在二进院四周，即南院墙边，正殿台阶下和东西配殿檐下竖起一行架木。架木插入嵌在青砖地面里、中间凿好圆孔的方石中，每隔丈把远一根。待四面脚手杆架好，上面就用成匹的白五幅布或蓝花旗布编织，使整个二进院变成了一个高丈余，与正殿、东西配殿四面相接的、浑然一体的荫凉世界。

正殿廊檐下设乐班，西侧称武场，即锣、鼓、钹等打击乐；东侧称文场，即笛、管、笙、箫等吹奏乐。正面石板甬道前方两厢排列兵器架，上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武器。后面是老爷的半朝銮驾：有“肃静”、“回避”牌匾和彩旗、方纛、金瓜、钺斧、龙凤扇、八抬大轿等。

五月十一就开始了“献马”活动。各个商号店铺的老板或掌柜的都把自己心爱的好马披挂整齐牵到关帝庙，在鼓乐声中拉上正殿台阶，从大殿东门进去来到关帝坐像前以示虔敬。然后从西门牵出，骑着在库伦街上夸耀一番。骑手人人是长衫小帽，手执二龙吐须马鞭，坐下马个个似出水蛟龙，銮铃丁冬，好不风光气派。

在庙会兴盛的年月里，关帝庙山门外，小河岸边坐南朝北搭起一座座大戏台。一些大商号、店铺和作坊还在两侧搭起看台。库伦中街和后街各临街店铺、商号都彩灯高挂，粉饰一新。各门前都是黄土垫道，清水泼街，专候老爷出巡。

## 五

关帝出巡的最后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中进行。

五月十一日，关帝的“半朝銮驾”已经齐备，各项执事都已落实到人头。

十一日深夜，庙会的值年人沐浴净身后率领一千人在鼓乐声中来到关羽的行宫，即正殿的西首两间耳房内。这里放着一尊关羽的藤编坐像（一说是紫檀木雕像），又称“行像”。坐像高二米有余，面如重枣，五络长髯。值年给关帝叩首请驾，为老爷披挂停当，从耳房中把行像背到外面天井里放着的八抬大轿上。据传关羽的这尊行像是在山西一位藤编艺人处制做的。四肢关节都能活动。本来是要安放行走机关的，只因主人吝啬，少付了几个钱，害得商会的老板们年年去背。这还不算，相传，因关帝在天有灵，对那些心术不轨的东家还要施展“千斤坠”的神威，压得他龇牙咧嘴，双腿酸软，汗流浹背，以示惩戒。因此上，轮到值年的人，都是诚惶诚恐，潜心祷告，唯恐稍有差池。那些平日受到东家虐待的伙计和百姓们，也都盼着这一天老爷为他们解气。

五月十二日早七八点钟，庙上的大钟敲过三通为号，人们齐聚到庙上。各路执事都按部就班。值年人查点完毕后喝令：“起一驾一！”只见一个人在山门外支起一尺多高、直径三寸多粗的小钢炮，“通、通、通”三声巨响，文武场顿时齐声奏乐。这时浩浩荡荡的出巡队伍，依次开出了山门。

大队之前是二十四匹标枪对子马。这些马多数已在头一天的“献马”活动中露面，只是骑手一般都换了人。他们各个

身穿“号服”，手擎标枪彩旗。

对子马之后，是庙上收养的几匹赤兔马，个个是雕鞍彩辔，膘肥体壮，红似炭火。其中还有一匹是关帝的专骑，背上驮着关帝牌位。

随后是鼓钹和开道的铜锣。铜锣并排两面，每面各由两人抬着，上插一面小旗，写着“金鼓”二字，锣面直径二尺有余，后面的人手握锣槌，咣、咣、咣，一路敲打。

武场之后是文场——笛管笙箫，吹打弹拉。演奏的人多是街外的蒙古族群众，多时超过三四十人。

“半朝銮驾”过来了。几十杆彩旗迎风飘扬，一杆镶边大旗，中间绣着一个“关”字，赫然醒目。八面“肃静”、“回避”牌子，十几面黄罗伞、红罗伞，还有低头龙、抬头凤、金瓜、钺斧、朝天蹬。身背印笏，手捧圣旨和手执令箭的执事，紧紧跟随。在八支提炉后面有几十人到上百人的上香人，个个手擎金锭香，列队而行。值年人手托关帝铜像，走在老爷的八抬大轿前。轿左右各一人，手执龙凤旗，轿后一人举着方形罩伞，簇拥而行。

走在关帝轿前的还有周仓。他身披锁子连环甲，头顶铁盔，面如锅底，肩扛青龙偃月刀。刀是按《三国演义》书中所写锻造，重量是十八两制、八十二斤。能扛得起这把刀的人是要有一把好力气的。一把偃月刀，引逗着无数争强好胜的年青小伙子争相比试。有的只能扛得起，有的可托平身，力气大点的能举过顶。最好的则不但不费力地举过顶，还可以上下左右、身前背后地耍弄一番。可惜有这等身手的仅是寥寥几人。

“老爷出巡”的路线是从关帝庙到库伦镇东端的“汗王

庙”，即现在的库伦一中所在地。在库伦街未冲成大沟之前是穿过中街，一直由西向东。自1923年大水之后，中街狭窄难行，而改由出关帝庙折向北，自后街东行。

此时，街里的居民，从乡下或外旗县赶来观看“老爷出巡”的人，早把沿街两厢挤得水泄不通。

出巡队伍来到“汗王庙”，“半朝銮驾”停在庙前。喇嘛摆好香案、供品，齐声诵经，吹起大号，列队迎接。身着法衣，头戴法帽的大喇嘛向关帝见礼后，把值年请进“汗王庙”正殿。值年人手托关帝行像向“汗王”三鞠躬，然后把行像放在一边，点燃香烛，俯首再向“汗王”行跪拜礼。拜谒完毕，“关帝出巡”即告结束，队伍起驾原路返回。

值得指出的是，关帝所去的“汗王庙”，並不叫“汗王庙”，而是“吉祥天女神庙”。里边供奉的也没有什么“汗王”，而是吉祥天女（或称吉祥天母）。这样一来库伦街上通常解释的关帝拜汗王是臣拜君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原来，吉祥天女神庙是锡勒图库伦第三世达喇嘛西布扎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监造的。供奉的吉祥天女神像是五世达赖喇嘛早年在西藏送给他的。西布扎喇嘛把吉祥天女尊为库伦的主神，不但在吉祥天女神庙供奉，在兴源寺里也设有神位。那么关帝年年去拜天女神究竟为了什么呢？笔者以为这要从库伦的历史发展中去找答案。历史上库伦是政教合一的建制。由于在蒙古族中传播喇嘛教，拥戴清朝统治而受到了清初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发展起来。随着库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渐趋发达而不断涌入的关内汉族人，自然要依赖于库伦旗政教权势。这就要采取一系列迎合、取悦于政教统治者和主体民族——蒙古族的措施和作法。让汉族人崇尚的

忠勇仁义的化身——关羽去朝拜被库伦政教统治者奉为主神的吉祥天女，实在不失为一种联络蒙汉民族感情的好方式。从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考虑，这大概算是一种民族和睦修好的表示吧。

## 六

伴随着五月十二关帝庙会的是大规模的游艺活动。

各项游艺活动都是驻库伦街各大小店铺、作坊自行筹办的。

节目中包括我们现在还能常见的舞狮子、跑旱船、扭秧歌、踩高跷，拉小车子等传统娱乐形式，其中也有不少是在库伦近几十年绝迹的节目。

耍中幡。一根三丈多高，碗口粗细的大竹杆，上半截固定两根成十字的横杆。横杆四端有四根彩绳与顶端相连。顶端、彩绳和横杆上挂满了彩旗和八仙人。耍幡的人身穿紧身裤，缠大腰带赤膊上阵。只见他把粗大的幡杆高高举过头，猛然旋转，四周彩旗、仙人飞舞，带动呼呼的风声。一会儿顶在头顶，陡然又落在脚尖；一会儿弹起，再用下巴颏儿托住；忽儿又飞起停在肚脐眼儿上。左右肩头，胸前背后，上下翻飞。一路走，一路耍，一路吆喝，十足的津门天桥把式。

五花棍。一般都是木匠铺、铁匠炉主办。百十号人，拉开阵势，一色的紧身三节衣，头系英雄巾，足蹬抓地虎靴子。每人手持二米多长、锄杠粗细的五花棍棒，甩、耍、轮、翻，各个身手不凡，令人眼花缭乱，互相敲击，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

舞叉。三股钢叉，两侧的股苗上穿着三两个铁环，稍一

抖动，哗哗作响。舞时是一二十人，排成两行，一色的武生打扮。

跑竹马。一般都是店铺里十几岁的小伙计们表演。三二十人，头裹白羊肚儿手巾，身着对襟白褂。每人跨下一匹“马”，马头由竹片制成，糊上纸，画上嘴脸，马尾是线麻染成，扎在腰间，用布裙罩住。骑手一手勒丝缰，一手执鞭。前后扭动，左右穿行。踩着鼓点，兴致盎然。

压杆。由两根碗口粗细的圆木做成四人抬的木架。木架下安四条腿，停下时，可平放在地上。木架中间的支点上固定一根二丈多长的杠杆。在杠杆的阻力端点上方固定一个铁围椅，能把坐上去的人牢牢地缚在上面。围椅下装饰成人腿金鸡独立的样子。围椅上的人装扮成各种典故或戏剧人物。耍动时四人抬起木架，两个人把握杠杆动力端，上下挥动杠杆，扮相人就在另一端随着起落表演各种动作。杠杆压下时，扮相人可以升起一丈多高，机灵的还能顺手抓住门洞檐下飞过的鸽子。

抬歌、背歌。抬歌是象压杆一样的木架，不过是八个人抬的。木架上倾斜着固定一根一二丈长的高杆，有时装饰成笛子或箫管的样子。在高杆的上头，固定三个座位，可同时三个人在上面表演。扮相人通常都是美貌伶俐的少女，扮成“红娘下书”、“仙女下凡”、“嫦娥奔月”等角色。有的脚“踩着”一片祥云，有的“站”在一柄拂尘顶端，有的又“停”在一片切开的西瓜瓢之上。远远看去凌空飞舞，飘飘欲仙，甚是新颖精彩。背歌，上面只有一个扮相，下面固定在一个铁背架上，由一个成年人背着表演。与抬歌相比，虽没有那么壮观多姿，但却非常灵活。背的人可以站起、蹲下，随意扭动。



.....

上述节目，好多都是由山西人开办的店铺排练的。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就开始彩排表演，到五月十二形成高潮。在关帝庙会兴盛的年月里，常常是头前的节目到了东仓（指天女神庙），后面的好几样还没有出关帝庙山门。东西二三华里长的库伦街飞虹流彩，歌舞不绝。

此外，一俟关帝出巡队伍驾归山门，庙外的大戏立即开台。那时候库伦街上就有戏班，届时还要从外地请戏班。戏有时要连续唱上一个月之久。

庙会上还有不少外地赶来的杂耍、说书、唱影儿、拉洋片儿的掺杂其中，卖艺凑趣。

关帝庙会热闹、人多，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因为库伦地区气候干燥，十年九春旱。善良迷信的农牧民们，把降雨的希望寄托在关帝出巡，察看民情上。越是春旱，越是有大批人涌到库伦街。人们虔诚地祷告，祈求关帝察知旱情后能上达天庭，普降甘霖。至今在库伦农村牧区还流传着“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的说法，就是来源于此。

# 库伦街回民与清真寺

刘瑞卿等 口述

刘 哲 整理

## 回民迁入库伦街

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遍及各地，清朝中叶以后，灾患益甚，尤其山东、河北等地，旱灾、水患、蝗祸接连发生，贫苦百姓，饥寒交迫，苦难备尝，纷纷出外逃荒。

迨至清嘉庆末年（约于1820年），库伦街已有山东、河北等地逃难的回民迁入。据调查，最早来库伦街的回民有王、陈、杨、曹几家。这些回民初来之时，大都以出小摊子，卖青菜维持生活。至此以后，库伦街陆续有外地回民移入。

清嘉、道年间，正值小库伦（库伦街）马市兴盛时期。每逢集市，库伦街上人流熙攘，拥挤不堪。据传，马市上仅撮合生意的经纪人就不下八九十个。由此，库伦街有了“日进斗金”的盛誉。经济繁荣、贸易畅达的库伦街，对擅长经商做生意的回民来说，确实是个容易养家糊口的地方。就这样，外地的回民投亲靠友慕名而来纷纷涌入库伦街。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库伦街回民达到400多户，2000余口。

## 建造清真寺

自嘉庆末年至光绪初年的50余年间，库伦街的回民已不下百余户。光绪元年（1875），库伦街回民募资修建了库伦街第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是三间土房，座落在当时的小南卡子旁（今回民小学附近）。由于建造年代久远，建寺的整个经过已无从查考。

到了民国元年（1912），库伦街回民已增加到二三百户，原有的清真寺过于简陋狭小不再适用。于是库伦街回民再次募集资金，改建清真寺。这次改建除到沈阳、新立屯等地“写粮钱”（募资）外，库伦街“春发玉”、“广太永”、“正发永”、“德发永”、“广盛永”等五大回民商号资助了大量钱财。回民乡老“春发玉”店东杨七爷等人主持了改建工程，他们依照新立屯清真寺的式样改建了清真寺。

改建后的清真寺（即现清真寺）座落在库伦街南山，整座建筑由寺门、大殿、沐浴室等建筑物组成，占地近700平方米。清真寺的主体建筑——大殿，座西朝东为五间青砖平顶瓦房。大殿前出一廊，中间设门，两边开窗，南北两座山墙上又开有窗户。大殿内有四根朱漆擎梁明柱，地上铺有地毯，十分整洁宽敞。

大殿的西墙上，一字挂着五块匾，居于两端的是两块布施匾，上面分别镌刻着初建和再建清真寺时捐资人名及所捐钱财数目。另外三块分别是他人馈赠的。据一些回民长者回忆，在这三块匾中，挂在中间的那块是清末古北口练军总兵左宝贵赠送，上书“诚通勿穆”四个大字（左宝

贵，字冠廷，回族，山东费县人。为清末名将僧格林沁部下，因战功授广东高州镇总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死于朝鲜）。那是在光绪十七年（1891）秋，朝阳金丹道（俗称“学好的”）起事，左宝贵率部取道库伦进剿，回师途中再经库伦街时，向清真寺赠送了这块匾。另两块匾刻写的年代稍后于此，是1912年改建清真寺竣工后，由锡勒图库伦第二十一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拉喜和绥东县县长孙汝锴赠送。两块匾分别写的是“主教明真”和“清真古教”。上述三块匾均为蓝底金字，字体遒劲，各具风格。可惜，这些匾额连同大殿内铺设的地毯等物全损失于“十年浩劫”之中。

## 清真寺历任阿訇

库伦清真寺的阿訇大多都是由沈阳请来的，但由于库伦街回民迁入与建造清真寺的历史较早，最初在库伦清真寺任职的阿訇已经无从考查。据了解，已故的库伦旗政协委员杨阜财的祖父杨承聚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任阿訇。按时间推算杨承聚阿訇任职时间，当在1880年前后。这时的清真寺还是在小南卡子附近。

值得提及的是，杨承聚阿訇在任时，曾从河北请来一位姓张的阿訇，抄写了库伦清真寺第一部《古兰经》。这部《古兰经》精心抄就，字体工整而娟秀。经书贴蓝色布面，共三十本，分装在两只紫檀色木匣里。“文革”中，多亏阿訇从中保护，这部经书才免遭焚毁。后来，经书交给了杨阜恩保存。据说，这部经书现落在抚顺马文成老师傅手中。

哈三阿訇也是库伦清真寺较早的阿訇。哈三，字从龙，

山海关人。据他墓碑的碑文推算，在光绪十年（1884）前后，他在库伦清真寺任阿訇。

另外，下述这些阿訇先后在库伦清真寺里任职。他们是：张兰阿訇、张长信阿訇、韩阿訇、马阿訇（河北沧州人，1918年在任）、马锡三阿訇（辽宁凌源人，1924年在任）、王阿訇、杨寿春阿訇（库伦人，曾连任三任，后来去开鲁）、黄振海阿訇（在历任阿訇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位，任阿訇时年仅28岁，他在库伦任期不满一年）、刘凤彰阿訇（河北孟村人，1935年在任）、王希真阿訇（辽宁义县人，1937年在任）、杨启瑞阿訇（河北迁安县人，1938年在任）、杨廷奎阿訇（沈阳人，1940年在任）、马子真阿訇（河北人，1943年在任）、白鹤玺阿訇（1949年在任）、时连凯阿訇（1950—1953年在任）、时阿訇离任后，回民乡老杨阜财便请来了现任阿訇王秉昆（山东人）。

按伊斯兰教教规，每任阿訇任期一般为三年，三年期满即另行请新阿訇。同时，还规定就任阿訇不能携带家眷。如果，在任阿訇不吝钱财，济贫善施，深受教徒拥戴的，也可连任。

## 库伦街回民的人口流动

自清嘉庆末年，库伦街有回民迁入起，直到解放前夕，库伦街的回民时有迁出。特别是在清末民初，库伦街由于交通不利，马市逐渐衰微。继而，大郑铁路通车，通辽、开鲁等城镇兴起，库伦街的经济更是每况愈下。主要以经商出摊子为业的回民，在这段时间里，大批迁出库伦街，去外地谋

生。解放后，库伦街的经济得以复苏，库伦街回民也相对地稳定下来，只有结亲、投友等为数不多的回民迁出。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新苏鲁克旗出荒，库伦街回民杨、李两家迁至今先进苏木苏木吐垦荒耕种，从事农业生产。

清末，开鲁放荒，库伦街一部分回民去开鲁。

民国初年，有回民去郑家屯。

民国17年（1928），有回民去通辽、开鲁。

民国34年（1945）冬，在日本侵略者的筹划下，库伦街有20多户回民被迁往黑龙江德都县。此前，有一部分回民为逃避迁民，逃往通辽、郑家屯等地。

解放初期，阜新煤矿招工，库伦街约有二三十户回民迁往阜新。

## 我所知道的迁民德都

刘 振 国

我从旗里国民优级学校毕业后，因病未能升学，一直闲在家里。为谋个职业，于1943年春到伪旗公署投考，被录用到伪库伦街努图克公所当了雇员。那时日本侵略者所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已经进行了几年，其在我国东北地区施行的所谓“开拓事业”不能如期实现，迫切需要增产粮食，劳动力却严重不足。为此，日本人策划一次迁民活动。当时的瑞尔吉、厚很、敖彦好若和库伦街等四个努图克都有迁民任务。我在库伦街努图克目睹了这次迁民，并随同日本人河合忠夫将库伦街的首批迁民送往伪北安省德都县。现将这次迁民经过回忆如下：

1943年秋，伪旗公署突然发出迁民德都的动员令。接着，以参事官日本人真田一年为首，包括一伙地方上的首脑人物在内组成了考察团，前往伪北安省德都县察看移民点。据我所知参加这一考察团的有瑞尔吉、厚很、敖彦好若和库伦街等四个努图克达及一部分爱里达。库伦街努图克有伪努图克达白星阿、伪爱里达郑廷栋、王仲等三人参加了考察。考察团回来后，即大肆进行欺骗宣传诸如德都县土地如何肥沃，那里的生活如何富裕等等，说得天花乱坠。随之其迁民活动也开始了。

这次迁民范围仅限于汉族和回族中的“自由职业者”。其所谓“自由职业者”，是指那些无耕种之土地，又未给地主做长工，单靠出卖零工维持生活的贫苦百姓。库伦街的“自由职业者”，大部分都聚居于南爱里(南山)和北爱里(北山)两处。恰好，当时我食宿在我父亲的好友海洪涛家中，他是回民，由于我父亲多年在库伦街行医，我也住库伦街念书，跟周围的回民混得很熟，所以他们说话并不背我。他们说：“鬼子(指日本人)以迁民为幌子，把穷人送到五叉沟当劳工”。又说：“买卖鬼(老百姓送给参事官真田一年的绰号，因为真田一年经常从事投机买卖，捞取外块)，把库伦街穷人卖给了德都县，从中发了大财”等。他们愤然咒骂真田一年和那达木德(伪旗长)、白星阿等日伪头目不得好死。

当大大小小日伪头目，秘密拟定迁民名单的时候，库伦街贫苦居民过的正是极度恐惧不安的日子。有的人求亲拜友，变卖家产，贿通头面人物，给自己除名；有的干脆携家带着外逃躲避。如此折腾了一个冬天，过了春节之后，不知怎地迁民的声息渐渐地消停下来了。

1944年，真田一年调离库伦，又来了一个叫川野鼎三的参事官。此人身材短小，鼠目猴腮，手段阴险毒辣。伪旗公署上下人等均惧怕他。他来了后迁民之事仍然无声无息。1945年的春节刚刚一过，突然发出了迁民命令。即按前次所指定的名单，限期做好搬迁的准备。并且规定除衣物、行李外，其他日用家具均不许携带。大祸临头，猝不及防，人们反而显得异常镇定，不似前一年那样惶恐无措。人们很快处理了身外之物，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农历正月下旬的一天，人们含着眼泪背井离乡登上旅



途。库伦街努图克的迁民是分做两批走的。说是两批，实际是只相隔一天时间，第一天是南山的迁民，汉、回均有。第二天是北山的迁民，全是汉族。揣尔吉、厚很和敖彦好若等三个努图克迁民是取道阜新走的。

在迁民起程的前两天，伪努图克达白星阿通知我随同皂户沁国民优级学校日本教师河合忠夫往德都送第一批迁民。我心里虽不愿意，又不敢说不去。不过觉得跟随河合去，比跟随其他日本人要好些。因为同河合有过暂短的师生关系，河合又通晓蒙语和汉语。想到这些心里比较踏实了。听说德都气候十分寒冷，临出发时，我穿上皮袍和趟上马（一种皮制的防寒靴子），跟河合一起坐上了大车。第一批迁民共约一百一二十人，分乘十台大车。当大车起劲时，妇女孩子号啕大哭，哭声凄惨，不忍听闻。

大车冒着北风，走了一天，很晚才到彰武县哈尔套街，按预先安排，迁民都进大车店，我同河合住进一家小旅店。第二天又赶了一天的路程，到彰武县城住宿。第三天，在火车站，我们见到了参事官川野鼎三和库伦的其他官员以及从德都赶来接收迁民的官员。上了火车，河合对我说：“把迁民送上火车，就算完事了。”我们乘坐的是一节破旧不堪的车厢，地板上满是污水，把人们的鞋都泡湿了。一车厢人遭了一天罪，夜间才到郑家屯，住进旅馆后，人们忙于烘烤鞋子，一夜都未睡好。第二天又坐上火车，直到北安站下车，未再倒车。下车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但是德都县派来的大车和爬犁正在车站等候，迁民一下火车便改乘马车或爬犁，又继续赶路。我跟河合还有一名陪同我们的德都县职员，留宿于北安。次日，陪同我们的那个德都县职员找来一台爬犁，拉

上我们奔往德都。德都距北安有90华里，一路冰天雪地，途中只有一个屯落，在此打尖，晚上才赶到德都。这时我不由想到，几天来，这些迁民仅以自备的干粮充饥，连一顿热饭菜都未吃上，一下火车，又顶着凛冽的寒风星夜赶路，实在可怜！他们在途中遇到或发生了什么不测之事也 不得而知。就连我们到德都之后也再未见到他们。

我们从德都回来时，在火车上见到翁牛特旗的人。一打听，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也是往德都送迁民的。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往德都迁民的不止是库伦一个地方。

# 伪警备军士兵 大闹养正学校的始末

王家驛

于1935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库伦后，曾有伪警备军一个连进入库伦镇驻防。这一连士兵均系伪满洲国建立初期的募兵，形同土匪，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军风纪。这一连伪军在库伦镇驻防，给各商户和居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他们食宿在镇内各较大的商户，这些商户的工人和店员都得小心翼翼地侍候，稍不遂心，拳头加皮带就会劈头盖脑地打下来。有的士兵大天白日即在室内解手，店员得随时把尿盆端上去。连那些伪警察和伪职员以及驻防库伦街的伪治安队士兵都怕他们，上街一望见他们的身影，好似老鼠见了猫一样，都远远地躲开。后来，这些伪警察和伪职员为了改变这种处境，主动同他们拉关系，交朋友，请他们喝酒，抽大烟，有的还当媒人给介绍女人，等等，搞得不亦乐乎。

1936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有个士兵身穿便服，腋下夹着一包糖果，来到养正学校，闯进教室找某女生谈话。在旁的学生见他言谈举止十分轻浮，不由产生反感，便到办公室向校长拉喜德力格报告。校长即指定我去把这位不速之客请到办公室来问其来意。在查问中，这位客人却表现得很不耐烦，说他曾经到该女生家去过几次，彼此混很熟

云云。我听了十分生气，严肃地指出在学校课堂上不准这样做。客人不以为然地为自己分辩，话语越发粗俗无礼。在旁的学生忍无可忍，把他逐出学校。他到门外，用极其污秽的语言辱骂师生。于是年纪较大的男生一起围上去你一拳，我一脚地把他痛打一顿。他招架一会，寡不敌众，急忙逃走，声言道：“你们等着吧！”他走后，校长拉喜德力格找那女生盘问他的情况。原来，他是驻防镇内的伪警备军士兵。快放学的时候，果然来了好些荷枪实弹的士兵，闯进办公室不容分说，就把校长拉喜德力格、教师玛哈巴尔迪和我捆绑起来，拳打脚踢地押往他们驻地广升合院内。之后由伪军连长张建勋审问我们三人。校长拉喜德力格陈述了事情的经过。伪军有一名朝鲜翻译伸手就打校长拉喜德力格。而那位伪军连长袒护肇事的士兵蛮横地说：“难道你们校门挂着杀人刀不成，不许人进去……”说罢命令士兵把我们三人带到一间空屋里关押，派士兵看守。此时，养正学校的全体学生见校长和教师被全副武装的伪军士兵抓去，不由得义愤填膺，便立即集合起来，跑到伪旗公署院内见了伪旗长罗布桑林沁和参事官岩满三七男，要求干预和处理这件事情，同时要求立即释放被抓走的校长和教师。伪旗长和参事官一边安慰学生回学校，一边派人到广升合去交涉，把我们三人领回学校。但是祸端既起不能很快平息，每天都有伪军士兵数人一再地到学校来寻衅闹事。我们只好躲到伪旗公署院内，学校不得不停了课。这样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最后由当时在伪警备军司令部任官职的那钦双和尔的父亲玛克斯尔出面调解，情况才稍有缓和。幸而未隔多久伪军调防他处，事情遂平息下来，我们这才回到学校开课。

## 伪治安队在库伦

桑布、其木德斯冷提供资料  
齐克奇整理

1936年2月，在日本人操纵下在库伦旗成立了伪治安队，其实际番号为第六团第八连，团部设于通辽。司令官为扎赉特旗王爷巴特玛拉布坦。这一连伪军除一名指导官（亦称教官）由日本人担任外，其余近百名官兵大多数是由库伦旗原有的地方团练中抽选出来的士兵组成。一小部分由新并入库伦旗的喀尔喀左翼、唐古特喀尔喀二旗补充。连长来喜敖斯尔（白音花苏木坤地屯人，曾经当过德木齐）、连附忠乃（皂户沁屯人），设三个排，一排排长戴全宝（格尔林苏木张达屯人）、二排排长却吉敖斯尔（哈尔稿苏木哈图屯人）、三排排长巴力吉（额勒顺镇人）。每排设三个班，每班有士兵十来名。营房设于南街尽东头广合店。第一排由排长戴全宝率领，在靠近所谓的“治安不良”地区水泉驻防。

在伪治安队成立之前，地方团练的枪械马匹均为自备。在伪治安队成立时，日本人将地方团练原有的各式各样的枪械全部“收购”（每支枪收购价伪币4.10元）。之后统一发给七九大盖。初建的治安队没有军衔，胸前佩带上书“治安”字样的黄色椭圆形标志。第二年才授军衔。连长授中尉

衔，连附和排长均授少尉衔，班长授少士衔。在授军衔时三排长巴力吉因年龄偏大而退伍。治安队拥有一门山炮和一挺轻机枪。但当时无人会使用这两种武器。伪治安队成立不久，发生扣河子西洼老卜家称皇帝事件，日本守备队前往镇压，伪治安队配合行动，在双庙子发生一次战斗，伪治安队一个名叫拉玛扎布的士兵被打死。除此，驻防水泉的第一排曾经配合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备军打过几次仗，这几仗都是在原喀尔喀左翼与奈曼、土默特右翼交界处发生的，在原库伦旗境内未曾发生过战斗。

1938年，二排排长却吉敖斯尔调往六团一连，后从六团一连转往林东。过去在库伦旗广泛流行的《却排长之歌》就是由此而产生的。接着忠乃连附被调往十一团。之后不久，对伪治安队进行了一次整顿。经过这次整顿，有半数的士兵退伍回家，连长来喜敖斯尔也下去了。在这同一时间内，日本人对驻防于科左前旗后新丘的第七连也进行同样规模的整顿。将其保留下来的半数人马转到库伦来，与第八连合并为一个连，番号改为第二连，由日本指导官长安改任连长。时隔不久，伪治安队奉命调离库伦，于4月17日开往通辽。时间不长又与第十团换防到了林东。在开往通辽时把七九大盖全部留给库伦，换取那些连珠、套筒之类的陈旧枪械带往通辽。在通辽又换取了崭新的四四式枪。

在离开库伦的前不久，也即与七连合编为第二连之后，曾经发生过一场风波。其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即：自科左前旗后新丘新来的士兵有两三个人到后街走进新建的伪警察署院内想要照个相。被伪警察阻止，互相发生了口角。为此这两三个士兵跑回营房拉来一伙士兵，又冲进伪警察署院内不

分青红皂白大打出手。伪警察署急忙向伪警务科报告，伪警务科又立即转报日本参事官岩满三七男，参事官除立即命令伪警察全员出动警戒外，往通辽挂长途电话，向伪警备军司令部告急，称驻防库伦街的二连发生兵变。此时该连连长正在司令部，听到这消息后慌忙跑到火车站，登上火车经甘旗卡回到库伦来，一看并未发生什么兵变。他听取了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气极败坏地摇起电话，要参事官岩满三七男立刻到连部来。岩满三七男接了电话，不敢不来。长安连长一见岩满三七男，即劈头盖脸地臭骂一通，说：“巴嘎亚鲁，我二连根本没有发生兵变，你为什么向司令部谎报军情，你真的要逼我连士兵发动兵变不成！”把参事官岩满三七男骂得狗血喷头，说不出话来。事后岩满三七男也很不服气，再次向司令部告状，想要给自己争回点面子，要求上司惩罚那几名肇事的士兵。但是由于长安连长的袒护，以及事隔不久，二连转往通辽，事情便不了了之。

# 回忆日本投降前后 库伦旗发生的一些事情

朋 斯 格

一、1945年的7月下旬，在库伦旗的日本人显得十分紧张、忙乱。他们为了抵抗苏联红军，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首先扩充伪警备大队，配备了足够的枪支弹药和马匹，集中在旗所在地库伦街布防。日本人本身也都配备了枪械马匹。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各防空哨所的监视。于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后，日本人又在库伦街组织自卫队，赶制和发放了长矛。并指使特务四出活动，搜集情报，加强了对交通要道的监视。

二、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川野参事官偕同副参事官和伪总务科长德仁格（即李春蔚，于1946年9月被我军镇压）、伪警备大队长胡力雅其等人去后府拜会罗布桑林沁王爷，说：日本人就要撤离，库伦旗是属于王爷的，将权力交还给王爷，并扬言三十年后再见。当天，日本人将伪旗公署的文书档案全部烧毁。

三、8月16日，川野参事官在伪旗公署院内召集伪职员开大会，他在会上痛哭流涕，说：时局恶化，日本人要撤离满洲，……苏联红军来后要烧杀，你们要进行抵抗。他当着众人又重复那句“三十年后再见”的鬼话。当日上午日本



人乘上汽车向彰武方向逃跑。伪警备大队派骑兵护送。在返回途中被彰武境内的土匪打死一人。

四、在日本人撤离的当天，伪旗长那达木德和德仁格、胡力雅其等人请来罗布桑林沁共商日本人撤离后的旗务，决定成立库伦旗治安维持会，改伪警备大队为保安大队。同时宣布给伪职员每人发放两个月薪金，然后遣散之。

五、8月17、18两日，伪兴农合作社职员李某（大连人）从收音机（当时库伦旗唯有的一台收音机）里听到，国民党政政府通告各级地方政府即将由国民党派员接管的广播后，这消息迅速流传于库伦工商界和伪职员中。对此，他们表示欢迎，有的还为恢复绥东县建制大造舆论。但蒙古上层人物和青年学生反对恢复绥东县建制，主张东蒙自治，保留旗的建制。因而他们密切注视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方面动态。

六、8月下旬的一天，苏联红军的一支小部队20多人，横跨塔敏查干沙漠抵达库伦镇，旗治安维持会的头面人物打着表示投降的白旗，走到伪旗公署北门外迎接。在招待会上，苏联红军一位少校讲话，他说：苏联是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各级地方政府应由中国当局接管等。当晚苏联红军的这支小部队即离开库伦开往阜新方向。

七、9月上旬，伪满洲国铁骑部队全副武装（约一个师的兵力）由唐山一带北撤，路经库伦旗前往王爷庙。该部给库伦旗治安维持会留下一部分枪支弹药。该部为了轻装前进，越过塔敏查干沙漠时将两挺重机枪又投入水泡子里。后这两挺重机枪也落入保安大队手里。

八、10月间，苏联红军一部乘汽车由沈阳来到库伦，首次用苏联红军司令部发行的流通券收购了一批菜牛。

九、在揣尔吉努图克海力斯台嘎查发生一起杀人案。即当地居民将一名过路的难民杀死，并扒去衣物。旗治安维持会将杀人凶手逮捕，在库伦街处决。就当时来说，这一凶杀案的及时处理，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消除蒙汉民族间的隔阂起到了积极作用。

# 国民党中央军 盘踞在库伦镇的日子里

包文涛

1946年冬，国民党七十一军新六师第十七、十八两个团先后进库伦镇驻防，是杨俊勾来的。在八路军初进库伦的时候，杨俊却跑到阜新投靠了国民党。他企图恢复绥东县治，在沈阳、锦州之间往返奔走活动的结果，弄到了一个绥东县县长的头衔。为了在库伦镇组建他的县政府，他延请七十一军新六师派出一个团进库伦镇驻防。这样，原来在彰武驻防的第十七团移防到库伦镇来了。杨俊所以勾来十七团在库伦镇驻防，是因为他势孤力单，想借助驻军的力量给自己撑腰壮胆，以便其进行组建绥东县政府的活动。这十七团团团长名叫刘启昌，该团辖三个营，九个连，共约600余人，是一个编额不足的团。该团从彰武移防到库伦镇来时，由彰武境内抓来50余辆大车。在进驻库伦镇的第二天，即带着这50余辆大车，分做两路，到附近的农村去抢粮食、干草、烧柴以及猪、羊、鸡等。其一路奔哈尔稿，一路去下希泊。这两处的群众遭此浩劫，怨声载道，影响波及邻近的各个屯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他们纷纷派出自己的代表到旗政府来要求予以制止。此时，被八路军带往开鲁的二爷宝音德力格尔还没有回来任职，暂时由其四叔泽旺充任代理旗长。

当时我正在旗政府做财务工作，代理旗长泽旺指使我到十七团驻地取得联系，即向该团明确表示其所需粮、草、柴等直接由旗政府负责供应。意思是用以制止他们直接赶到附近农村去骚扰老百姓。我奉命赶到该团团部驻地，见了刘启昌团长，转达了代理旗长泽旺的意思。刘启昌团长当即表示同意。并告诉我团部军需官梁某已带一部分士兵，赶着十多辆大车再次奔下希泊去了。我听了急忙向他告辞，走出街东头即纵身上马，飞奔下希泊屯，想把他们从半路上挡回来，但未能追上。当我到下希泊屯时，他们已经进入屯里。开始到各户抢粮食、抓猪鸡等，闹得全屯乱哄哄的。我连忙找到上尉军需官梁某，向他说明了跟刘启昌团长刚刚联系的情况。之后梁某才出面阻止那些士兵的行为。这次只不过是比上次抢的东西少一些罢了。由于旗里主动提出供应其所需粮、草、柴之后，该团才打发那几十辆大车返回彰武。该团自己没有车辆，彰武大车回去后，不能或很少再到农村抢东西了。由旗里负责供应他们的是烧柴和少量的干草、饲料及粮食。因为该团为步兵团，其团部仅有几匹乘用的马。1946年12月末，七十一军新六师第十八团来换防，十七团开往通辽驻防。后来听说十七团换防到通辽不久，在舍伯吐附近发生的一次战斗中被打垮，其团长刘启昌带着少数几个人逃了出来，取道库伦镇停留一宿即转往彰武。第十八团团长的名叫石振东，该团在库伦镇驻防期间，根据杨俊、宝音德力格尔二人的共同意愿和要求，曾经出动两个营的兵力，由旗保安大队60多人和热北支队骑兵第五团的四个连配合，开往六家子一带进行扫荡。当天拂晓即在僧格营子(今伊和屯)附近与八路军接上了火，结果被打垮，狼狈逃回。

据我了解，七十一军新六师原为日伪森林警察队，被国民党收编成了一个师，并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他们却能扰害百姓，在库伦除了抢粮食，抓猪鸡外，还抓民伕为他们挖工事，修碉堡。他们又仗着人多，武器装备比较好，吓唬热北支队五团和旗保安大队，他们不准许热北支队五团和保安大队的士兵带着武器在街上行走。但他们可以随时携带枪支到兴源寺和上仓院内打鸽子。他们临撤离库伦镇时，还拐走了几名年轻妇女。

## 杨俊拼凑所谓绥东县政府的经过

王家驹 口述  
齐克奇 整理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小库伦设县治，称绥东县，管辖库伦、奈曼二旗。1930年（民国19年）绥东县迁治，县署由小库伦搬到奈曼旗八仙筒。时任县长为衣学让。日本侵略者占领热河以后，于1935年初即撤销绥东县建制。

1945年底，八路军进驻库伦时，杨俊（当过伪库伦旗协和会职员，父亲杨德政在库伦街经营一家油坊）逃到阜新，投靠国民党热河边区军司令索华忱，为恢复绥东县治进行活动。他通过索华忱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取得联系。刘多荃对恢复绥东县建制一事表示同意，并任命杨俊为绥东县县长。是年10月初，杨俊纠合库伦与奈曼的一伙人自阜新来到库伦镇。就组建县政府一事，想召集一些人开会商讨。但由于旗方根本不赞成杨俊在库伦镇成立什么县政府，每当他召集些人来开会时，蒙古士兵即赶到会场给他搅散了。杨俊在库伦没有什么社会基础，势孤力单，对蒙古士兵奈何不得。正在这时候，八路军奔袭彰武县哈尔套镇，取道库伦，杨俊一伙又仓皇逃回阜新。这次他逃到阜新以后，跟国民党七十一军新六师师长陈天喜攀上了亲，拉上了关系，便延请该师第十七团团

长刘启昌率部来库伦镇驻防。实际上就是让该团做他的后盾，给他当保镖。杨俊第二次来到库伦，胆壮气粗，便有恃无恐地重新组建起他的县政府。旗方慑于国民党十七团的兵力而未再干扰。杨俊的县政府设民政、公安、司法、军事、教育和财政等六个科。对纠集于他身边的那些人都一一加了头衔。如：民政科长赵忠武（奈曼旗人）；公安科长王锡三（奈曼旗人）；司法科长商某；军事科长李某；教育科长隋芳（奈曼旗人）；财政科长王家禄（奈曼旗人）。另外设有县大队，大队长王鹤龄（奈曼旗人）、副大队长刘化坤（奈曼旗人）。县大队仅有四五十人。至于各科，大都是空架子，除了挂名的科长以外没有办事人员。例如：我名为财政科长，手下办事的人一个也没有。同时做为财政科，手头却不名一文。杨俊是我在养正学校任教时的插班生，因有此师生关系，他在组建县政府时拉上我到他的县政府任职，结果给我挂了个财政科长的职衔。其实杨俊的绥东县在库伦旗境内是吃不开的，除小小的库伦镇以外没有活动余地，虽有国民党七十一军新六师第十七团（后来第十八团来换防）为他做后盾，但在库伦镇以外的地方不敢去活动，至于奈曼旗在八路军控制之下，他更不敢去。杨俊一伙龟缩在库伦镇，直到1947年春，八路军解放了开鲁县城后，他随同国民党新六师第十八团连夜匆匆逃离了库伦。他拼凑绥东县政府的闹剧就此收了场。

## 我是怎样当“三爷”的

白云龙 口述  
齐克奇 整理

1938年，我在伪警务科当外勤期间，通过在一起玩牌，跟后府二爷宝音德力格尔结识。后他又认了我的女儿为干女儿。经常同我在一起玩牌的除了宝音德力格尔外，还有广增源油坊掌柜的卢向阳，广升合掌柜的韩瑞舟，警务科的李栋臣（蒙古名塔木扎布）。由于经常到一起玩牌，彼此混熟了，就一起拜把子，成了弟兄。卢向阳排行老大，宝音德力格尔排行二，韩瑞舟排行三，我排行四，李栋臣年岁最轻，排行五。从此，我与宝音德力格尔的交往又深了一步，可谓成了莫逆之交。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倒台后，我很少回自己的老家毛敦艾里。因为乡下，什么信息也听不到，孤陋寡闻，所以我大部分时间留在二爷府第。住在旗的中心，接触面广，好观察时局，便于找个机会谋个事做做。旧历十一月间，那钦双和尔从王爷庙回到三家子来，顺便又来库伦，说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将在王爷庙（乌兰浩特）举行。要求东蒙各旗都派代表出席。不久，库伦、土默特左翼、苏鲁克旗的代表团相继组成。三个旗共13名代表来库伦聚齐。库伦的代表有布和朝禄、齐木德道尔吉、哈尔敖海、通拉嘎、哈斯布和等五人；土默特左翼旗的代表有王



宝山，记得**还有**位姓海的，其余三名都记不清了；苏鲁克的代表有那钦双和尔、那木斯来扎布和我，共三人。当时我用的是蒙古名希力布扎木苏。临出发时，由库伦旗保安队派出五名士兵负责护送。我们沿途经过宾图、达尔罕、图什业图等几个旗，抵目的地时同行的人已经多到七八十人。由于王爷庙发生瘟疫，大会改在距王爷庙数十里远的葛根庙举行。会后代表团各回各地。因为那钦双和尔和那木斯来扎布二人留在王爷庙工作，12月上旬，我一人回到三家子来，首先见了那钦双和尔的弟弟额尔敦毕力格（包殿英）。同他商量后，即召集赵连成（马仗房人）、何相林（察哈仁稿勒人）、黄廷（白庙子人）、包国良（陈苏鲁克中窑人）、齐林（陈苏鲁克大板人）、满图嘎（陈苏鲁克人）、扎巴（固日班格尔人）等人到固日班格尔来开会。在会上我传达了东蒙自治政府成立的情况，并同他们一起商讨组建苏鲁克旗政府的有关事项。到了1946年二三月间，在地方上有赵平安等一带青年积极活动起来。这时，苏鲁克旗与库伦旗联合组建东蒙自治军第八团（后改为第十四团），我即转入这方面的活动，而不再参与地方的活动了。第八团共四个连，由苏鲁克旗组建其中的一个连，为第四连，海满囤任连长。由八路军方面指派一位名叫李庆友的青年任指导员。我任副连长，兼司务长。起初在扣河子一带驻防。即在这期间，有人就我的历史问题大作文章。这就是我所以当“三爷”的缘由。

有一天，团政治处主任张超群，连指导员李庆友唤我去谈话。他们说：“旗里有人检举你当过伪警察和特务。不过你的现时表现还不错，不打算把你送交旗里作处理。先给你开个介绍信，证明你已经离开部队。日后怎么办，你可自找

出路。”既然这样，我无话可说，便离开了部队。可是我将怎么办，出路何在？我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到后府见了二爷宝音德力格尔。他见了我，对我表示同情。他对我是不见外的，将国民党热河边区军中将军司令索华忱（吉林人，曾为原东北军阀张作霖部下）授予他的委任状拿给我看了，原来索华忱任命他为蒙旗骑兵师师长。这是通过杨俊、李栋臣等人送给二爷的。他拿给我看了委任状之后说：“杨俊、李栋臣等人从阜新捎来口信，要我尽快派个贴身亲信去阜新，便于跟国民党军政界上层联系。我为找不到合适的人而犯愁，你来得正好，就领这一差使，马上动身到阜新去，跟杨俊、李栋臣等人接洽，做为我的亲信活动活动。”事情已经到这地步，我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得听他的了。我到了阜新，跟杨俊、李栋臣等人接洽。在阜新住了十多天之后，即偕同杨俊、李栋臣前往锦州。我第一次以“三爷”身分拜见了索华忱。因为我才从库伦来，所以索华忱对我特别感兴趣，要我详细陈述东部蒙古和库伦的情况。于是我尽我所知，将东部蒙古和八路军进驻库伦以后的情况，一一作了报告。索华忱听了自然很高兴，授予我热河边区军司令部上校参议的头衔。我们在锦州逗留半个月时间又返回阜新来。不久即听到东蒙自治军第十四团发动哗变的消息。夏历七月的一天，白音巴图只身到阜新市来找我们。他告诉我们说，全副武装的300多人已经来到阜新县北部边界待命。又说：“二爷有话，见了你们就能发放服装和薪饷。”事情的进展快得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自然感到高兴。不过，我们手中一无所有，没有军装和薪饷可以发放。为此，我再次偕同杨俊、李栋臣等人去锦州第二次见索华忱，报告情况，要求发放军

饷。在锦州只停留四五天时间后，陪同索华忱返回阜新。这时又有奈曼旗五爷发动叛乱，带一部人马进入阜新县境内。索华忱来阜新后即点编白音巴图带领的300多人，编为一个骑兵团，任命白音巴图为团长。事后我又随同索华忱去锦州。目的是想方设法弄到一点军饷。可是索华忱也没有军饷可给，先是一味支吾，后来他也发急，亲自往热河省政府联系。为此又见了热河省主席孙渡。这次我在锦州耽搁了一个月之久，还是毫无结果。在这期间，白音巴图率领的骑兵团人数又增加了200来人，还跟八路军打了一次仗，结果他本人也负了伤。我从锦州回来后即代他当了团长。就在这时候，徐绍儒（蒙古名拉喜忠爱）来我们团里活动。原来他投靠了土默特右翼旗王爷齐木德多尔济，当时齐木德多尔济为卓索图盟副盟长，收罗一部分人马，成立了所谓热北支队，自任支队司令，正在继续招兵买马，为自己扩充势力。徐绍儒即为他奔走活动，想把我们这几百人马拉向齐木德多尔济一边。我不同意他的这个做法。不过，他钻了索华忱不发放军饷的空子，占了上风，竟把大半人马，即300多人拉了过去。遂由热北支队司令部来一名姓宝的参谋长进行点编。把这300多人编为热北支队骑兵第五团，徐绍儒当上了团长。我们剩下的部分只有近200人。

大约是在旧历九月八路军撤离库伦以后，我们即进入库伦。时隔不久，八路军的一支大部队攻打哈尔套镇，取道库伦一度占领库伦镇，我们不得不退回阜新。这次我陪同二爷到阜新。原来二爷被八路军带到开鲁县城，八路军从开鲁县城撤离时，把他留在开鲁了。有个名叫万喜的人，在十四团叛变后没有跟白音巴图去阜新，而潜伏在北部坨子里活动。

他听到八路军撤离开鲁，二爷留在县城的消息，便赶到开鲁把二爷接回库伦。我这次陪同二爷到阜新，见白音巴图的伤已经好了，便把人马交与白音巴图。之后又去锦州见索华忱。但这次去锦州跟上几次一样，仍无所得。这时候，国民党在沈阳成立了一个“蒙旗复员委员会”。奈曼旗的五爷，土默特左翼旗王爷云丹桑布，土默特右翼旗王爷齐木德多尔济都会聚沈阳。原喀尔喀左翼旗的那达木都、希力布二人企图恢复喀尔喀左翼旗建制也找上该委员会。库伦方面是我陪同二爷去的。我们二人住到罗布桑林沁在沈阳的商号公玉成。这些蒙旗王公们在沈阳的主要活动是，从“蒙旗复员委员会”那里领取印信图章，还弄到一点所谓对蒙旗的救济金。他们还联名上书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要求国民党大力援助蒙旗，恢复与发展蒙旗建设等。

在这一阶段，我与热河边区军司令部基本上脱了钩，我的实际职务就是旗长宝音德力格尔（在他从开鲁回来之前，由其四叔泽旺为代理旗长，他回来后即接任旗长）的秘书，又兼任旗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职务。这时我已经和杨俊、李栋臣等人分手了。因为杨俊、李栋臣等人已不同我们合作而另起炉灶，为了恢复绥东县治而奔走活动。我们反对和抵制他们的这一活动。在库伦由我力主恢复兴源酒店（原名公玉源），开始烧酒。杨俊以绥东县长名义要这个酒店向他缴纳税金。我当面驳斥了他，说：“我们没有那份钱给你，这是二爷的烧锅。起初，你本是按二爷的意图去阜新活动的，后来你想当官，另起炉灶，搞什么绥东县，又想让我们给你纳税……”。从这一次翻脸后跟他再没有任何联系了。我们在

库伦过了一冬天的时间，主要工作是组建旗政府。但遇到了许多麻烦问题，就一些重要职务的人选问题，内部发生分歧，争执不下。如：主任秘书为仅次于旗长的重要职务，由“蒙旗复员委员会”任命了林沁道尔吉，而热河省方面却任命了徐绍儒，这两人争这肥缺互不相让。还有的人被任命后不干，如：当过伪警察署长的胡力雅其，任命他为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他拒不就任。所谓旗政府连个固定地址也没有，只是那么一伙人在下仓（福缘寺）进进出出，无所事事，混日子而已。实际上是政府还未拼凑成我们即逃离了库伦。

1947年的旧历年关，我们是在库伦过的。过后不久即逃出库伦先去彰武，后到阜新。1948年春，又从阜新转往锦州。防守锦州的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指挥范汉杰，他收容流亡到锦州的各蒙旗残存人马，成立了所谓“蒙旗骑兵挺进支队”，任命土默特左翼旗王爷云丹桑布为支队司令，宝音德力格尔为副司令，我当了副官处副处长。在我们从阜新撤到锦州时，宝音德力格尔已去沈阳，后因铁路交通中断而我们两地隔绝，不通音信，隔了一段时间后他好不容易乘飞机到锦州，我们才重新到一起。但为时不久锦州战役打响了，我们和范汉杰在同一幢楼上办公，结果一起做了俘虏。

以上就是我当“三爷”的经过情形。

# 多 尔 博 札 萨 克

齐 克 奇

多尔博，库伦旗好来稿屯人。他出生于清同治年间，卒于1929年。他虽然家境贫寒，但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得以在库伦街一家私塾读了八九年书，为他后来踏上仕途创造了条件。他20岁过后被召到旗办公处充当笔帖式，光绪末年晋升为札萨克。他是一位很有才华和胆识的人，他智斗热河来的放垦官员一事，曾经在全旗传为佳话，有口皆碑。

多尔博弟兄四人，他为最小，幼年失双亲，靠他哥哥养活度日。九岁或十岁那年的冬天，跟他大哥进库伦街来卖干牛粪。兄弟俩把牛粪卖给一家木匠铺，顺便进到屋里烤火取暖。木匠铺里有位年过半百的木匠，见了多尔博颇感稀罕，从小失去父母的多尔博，对这位面目慈祥的老木匠也十分亲近。结果，多尔博认老木匠为干爹，并留在老木匠身边没有回家。后来，老木匠的妻子不愿留他，于是憨厚诚实的老木匠在木匠铺里特地为多尔博置一床铺，让他睡在木匠铺、吃在木匠铺，白天到一家私塾读书。多尔博无牵无挂，唯有埋头读书。他谈到十七八岁时，老木匠不幸去世，他失去了依靠只好回到老家好来稿屯来。他开始给人家打零杂，勉强能填饱肚皮。哥哥们为他日后生计着想，要他给屯里的富户做耕青。然而做农活，他不在行，笨手笨脚，只顶半拉子，誰愿

招他。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由哥哥们作主，把他当给上来斯沟屯一户人家听使唤。那时候，把身子当出去的人，除了吃穿，分文不得。他唯一的指望是有个好年景，哥哥们的日子宽裕一些，早日把他赎回去。

距上来斯沟屯15里处有个屯落叫阿克沁。屯里有一家大户，主人名叫查干萨拉，老两口年过半百膝下无子，有个独生女儿，想招个合适的人，做为养老女婿交付家业。后经中来斯沟屯的一家亲友中间撮合，多尔博来到阿克沁屯做了查干萨拉的养老女婿。

正是清光绪年间，由于清王朝对内蒙古采取了“新政”，垦荒、移民、设县治等等接踵而来，随之蒙汉之间的接触日渐增多，旗务也愈益繁杂了。在这种新的情势下，通晓汉语汉文的多尔博被召进旗办公处当了笔帖式。

1907年，热河放垦官员前来“劝导”库伦喇嘛旗“出荒”。当时的札萨克达喇嘛阿克旺巴勒丹是个懦弱无能之辈，一经“劝导”，即“出结报效”。为此，已经退休的前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拉喜十分恼火，以为库伦喇嘛旗区区片土，在出荒放垦之后，草牧场大大减少，主要靠放牧为生的旗民将怎么过日子。正在想不出挽回的办法而焦虑万分的时候，笔帖式多尔博挺身而出献了一计。罗布桑拉喜喇嘛采纳了他的计策，并立即进行部署。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多尔博来到热河官员下榻的广合店，说明其来意。其大意是，札萨克达喇嘛所出具结，因一时疏忽而有遗漏和差错，特地前来予以补充和更正。热河官员听了，信以为真，拿出具结书让他补充更正，多尔博将具结书拿到手即一撕，攥成团含在口中咀嚼。热河官员一看这情形才知道事情有变卦，

自己受骗上当。他不由火起，立即命令侍从将多尔博捆绑起来，尚未来得及审问，有数以千计的农民，手持铁镐镰锄，肩扛犁杖，喊着口号，潮水般地涌向店门口，不一会店门被众人推开。热河官员见此情景，只好硬着头皮走出屋去与众人对话。结果，在众人的一片呼声中，热河官员不得不宣布出荒一事就此暂停，并把多尔博交与众人。当多尔博告辞时，那位热河官员十分后悔地说：“你竟然骗了我！”多尔博抱歉地回答：“是不得已而为之，请看，若不如此，众旗民会答应我们吗？”热河官员扫视一下众人未再言语。

多尔博立此一功，声誉为之大振，不久即晋升为札萨克。

1929年初，国民党南京政府将热河特别区改为省，积极推行放垦、移民和设治的计划，加快了对蒙旗进行吞并和消化的步骤，对境内各蒙旗构成了极大威胁。朝阳方面又有拟以绥东县取代库伦喇嘛旗的表示。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私下召集他的心腹博和朝鲁、赵宝善等人商讨对策，但都想不出好的对策。最后，博、赵二人提议请多尔博札萨克来讨教。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多尔博札萨克来了后，仔细分析清亡变民国后的形势，首次提出了尽快实行政教分治的主张。罗布桑林沁当即接受这一主张，从其所经营的公玉成、公玉源等店铺抽出一笔钱，预备一份厚礼，派人前往南京，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结识。不久，又派出德木齐那达木德以卓索图盟代表身分出席在南京召开的“蒙古会议”，进行多方面活动，1931年3月终于实现了政教分治。

多尔博札萨克在办公处充当笔帖式期间，学会了蒙文。



他发挥其兼通蒙汉两种文字的优势，曾经翻译过《古文观止》等汉文古籍。他还研究过中医学，他所翻译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部分，以手抄本形式在旗内流传，有人一直珍藏到“文革”时期。

# 仁沁好日老

齐克奇

仁沁好日老，又名沙哈如，汉名赵连科，1904年8月出生于库伦旗哈尔稿屯一户富裕农民家庭。1911年，7岁时就读于屯里的私塾学蒙文。两年后到库伦街在一家私塾读汉文。1916年入旗立蒙汉学堂。于1919年旗立养正学校成立后，即转入养正学校，于1921年底毕业，为该校第一期毕业生。1923年同布和、拉喜曾格、拉喜德力格、玛哈希瑞等人一起去北京求学，考入了北京蒙藏学校。

1926年在蒙藏学校加入蒙文学会为会员。于1927年蒙藏学校毕业后即回到家乡。1928年3月被聘到养正学校任教，并被任命为校长。他为了把学校办好，特地从奈曼旗聘来一道去北京求学，毕业于民国大学的王家骥任教，加强了汉文授课。同时，他对学制、课目和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正当仁沁好日老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努力办学，使学校声誉大大提高，就读学生逐渐增多的时候，于1935年4月日本人侵占库伦，成立伪旗公署，调仁沁好日老去伪行政股当股长，使他一度离开了教育事业。

仁沁好日老为人谦和，少言寡语，凡事不愿抛头露面。因此他得了个“大闺女”的雅号。他唯一的癖好就是酷爱读

书，喜欢音乐。他在北京蒙藏学校就读期间，以及在养正学校任职期间，从汉译本转译了外国小说《猫探》，写了中篇小说《在苦难中挣扎者的故事》和一篇有关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先后发表于蒙文学会主办的《丙寅》杂志上。在库伦旗的以往历史上，仁沁好日老是第一个发表中篇小说的作者。他的这篇小说，通过一位喇嘛班第（学徒）的苦难遭遇，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僧俗统治者的虚伪、狡诈、狠毒和对下层人民残酷的双重压迫。揭露了在旧中国军阀横行，胡匪猖獗的社会面貌。这自然是和他在北京求学时期接受进步思想有关。据知情者说，他在伪旗公署供职期间曾经收集资料，着手编写一部关于库伦旗地方史的书。可惜迄今未发现其手稿。1946年10月国民党军盘踞库伦，组建政府，他被邀去参与。1947年3月1日，库伦旗宣告解放，国民党军南逃，他随之离开库伦，经彰武、阜新和锦州等地，于1948年的锦州战役发生前夕转往北京，在北京蒙藏学校任教。北京解放后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任教。于1963年10月病故，终年59岁。

# 罗布桑林沁小传

齐克奇

罗布桑林沁，本名锡金满都拉，祖籍青海省乐都县。父亲达尔结，系锡勒图库伦旗第二十一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拉喜之胞妹所生。因有此甥舅关系，在清光绪年间，达尔结弟兄四人先后从故乡青海乐都迁至锡勒图库伦居住。阿克旺巴勒丹行一，为兴源寺①喇嘛。达尔结行二，娶达尔罕旗（科尔沁左翼中旗）协理台吉那达纳巴斯尔之女，在旗办公处东北不远的沟坡上，辟一新的屯落居住，称巴彦艾里。这样，青海草原上的一个普通藏族牧民变成了锡勒图库伦的名门望族。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7月，罗布桑林沁即出生于这一家庭，取名锡金满都拉。

当时，清王朝危机深重，其对内蒙古的传统政策已经改变，喇嘛教不再象早前那样受宠，以致渐趋衰微。1904年（光绪三十年），罗布桑拉喜喇嘛擅自改变以往的传统做法②，废黜其既定的职位继承人，副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并赶回青海乐都。之后，让其外甥阿克旺巴勒丹接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职务。为了掩人耳目，上报理藩部备案的副札萨克达喇嘛之名依旧为罗布桑林沁③。1912年，阿克旺巴勒丹喇嘛在任内自杀身死。罗布桑拉喜喇嘛重返印务处掌理政教事务，教年仅14岁的锡金满都拉中途辍学，坐床

当喇嘛，冒罗布桑林沁之名为副札萨克达喇嘛。1914年6月，罗布桑拉喜喇嘛去世。于是冒名的罗布桑林沁名正言顺地袭位接班，即为锡勒图库伦旗第二十三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这位不足成年的札萨克达喇嘛一上任便遇到了些颇为棘手的问题。如：设于小库伦的绥东县署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札萨克达喇嘛放弃行政权力而专管寺庙和喇嘛事务。热河军阀又一再派员“劝导”出荒，以及清丈土地，对幅员狭小④的锡勒图库伦构成了极大威胁。然而他仰仗其母亲的悉心指教，依靠其辅佐者们的尽力谋划，利用绥东县设治不久，在锡勒图库伦的社会基础十分薄弱的缺陷，采取了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材，重用知书识字，具有办事能力的俗人取代喇嘛官员等具体措施。并先后结交闾朝玺、汤玉麟等两任热河督统。以此与绥东县治分庭抗礼，抵制出荒。与此同时，他已经意识到在扶持黄教统治蒙古的清王朝已被推翻了的历史条件下，再继续维持政教合一的保守做法显然不合时宜。他经过充分酝酿，大胆地采纳了政教分治的主张。于1930年派出其亲信赴南京奔走活动，终于迫使绥东县署迁出小库伦，于第二年3月即实现了政教分治。南京政府颁布的《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分治办法》第二条载称：“该旗现任札萨克达喇嘛之罗布桑林沁，荐任为锡勒图库伦旗札萨克，仍照任命其他蒙旗札萨克之例，以明令发表”。这样，罗布桑林沁还俗，当了旗札萨克。

罗布桑林沁在出任札萨克达喇嘛和旗札萨克期间，出资创办养正学校，开发民智，励治图强，给旗民以入学念书的机会。接着又从莫林庙曼巴扎仓（医学塾）和土默特左翼旗平安地先后聘用两位老蒙医，为缺医少药的库伦旗培养和造

就了一代蒙医。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全旗连续几年遭受严重的旱涝灾害，旗民以糠菜充饥而不得的艰难时刻，他明令禁止粮商进行投机买卖，并主动停办自己所经营的一家烧锅，给旗民每户发放二斗粮，以示救济。就在此同一时期，阜新县几家地主，乘大灾大难之机，以廉价购买厚很河以南七个屯落的大量耕地。当地居民因丧失土地而生活无着，被迫逃荒。为此罗布桑林沁及时采取果断而有力措施，边派出旗保安队前去帮助群众抢种抢收，边与阜新县当局交涉，终于把耕地全部赎回。罗布桑林沁以其上述政绩赢得了蒙汉旗民的信任和赞誉。

1932年初，日本侵略军西攻热河，锡勒图库伦旗与南京政府和热河省的联系为之中断。1935年4月，日本人侵入锡勒图库伦旗，将喀尔喀左翼和唐古特喀尔喀二旗并入锡勒图库伦旗，始称库伦旗，不再冠以锡勒图一词。罗布桑林沁出任伪旗长。但他对于充当傀儡并不心甘情愿。是年在奈曼旗八仙筒一带发生抗日事件后不久，他暗中指使已被收编为伪警察大队的前保安队哗变。结果参加这次哗变的仅寥寥七人，东躲西藏，力不能支。时隔不久，即被日本人招降。罗布桑林沁被日本人视为“战时要害分子”，归入所谓“要视察户”之列，加以监视。1941年，借所谓“蒙地奉上”政策的实施，勒令退休，每月发给280元伪币的生活津贴。

1945年日本投降后，深居简出，赋闲几年的罗布桑林沁东山再起，借助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联合一批蒙古族知识青年，发起了倒伪旗长、治安维持会会长那达木德的运动，把权力重新夺回自己手中，成立库伦旗地方自治政府，

自任旗长。

1945年12月底，新四军三师独立旅进驻库伦。

1946年1月初，成立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不久，库伦旗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宣告成立，罗布桑林沁当选为旗长。是年7月中旬，东蒙自治军十四团一部实行武装叛乱。罗布桑林沁因策动武装叛乱罪，是年8月23日被处死刑。

注：

①锡勒图库伦旗主庙。

②清代初期的近一百年间，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一缺，由理藩院从供职于盛京黄寺、北京黄寺和隆福寺的藏族喇嘛内选拟，报请清帝简放。1729年（雍正七年）清廷明令规定“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缺出，应将墨尔根绰尔济（锡勒图库伦第七任札萨克达喇嘛）之孙补放，或于徒众内择其才堪胜任者保送到院补放。”（参看《大清会典事例》）从这时起，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的职位，均由青海乐都县萨木鲁家族中的喇嘛承袭。

③见清理藩部档案《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及商卓特巴具报接印日期咨呈》。

④原锡勒图库伦疆域南北长约75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

## 我所了解的罗布桑林沁

巴图敖斯尔 口述

齐克奇 整理

1934年，我正24岁时到上仓在内厨房当伙夫。上仓设内外两个厨房，内厨房是专为罗布桑林沁而设。外厨房为住上仓的喇嘛和其他公务人员备办膳食。在罗布桑林沁搬到后府后，我又跟着到后府当伙夫一年多。一个在厨房烧火煮饭的人，所见所闻自然有限，只不过对于罗布桑林沁日常生活方面的琐碎小事了解一些而已。

我到上仓当伙夫时罗布桑林沁已经还俗，当了旗札萨克，即旗长。当时在他手下辅助办事的有博和朝鲁、赵宝善二人。博和朝鲁为他的私人秘书。赵宝善负责交际工作。还有满都拉，是总管家，罗布桑林沁私人生活方面的事情，全由他经手办理。这三人为罗布桑林沁的心腹亲信。他们可以左右罗布桑林沁的一切行动。所以他们的权势很大，别人不敢直呼其名，得称老爷。除这三人外，还有巴达拉胡、哈尔其盖少布、早丹巴拉、乌力吉敖斯尔和格早格等人供他使唤。在值班房供职的有舍布格扎布。另有车夫一人，马夫四人，伙夫三人。

那时，实现政教分治，罗布桑林沁还俗已有两三年，日本人还未进到库伦来。旗的统治机构和职官名称都有所改



变。但罗布桑林沁身边，往昔的那些习俗和规矩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人们见他，还得下跪磕头。每年正月初一这一天，他仍旧身着清代朝服，头戴红宝石顶圆帽，脚蹬厚底靴子，到兴源寺正殿念诵佛经。并接受众喇嘛献哈达拜年。这些，在1935年日本人侵入库伦以后才开始改变。例如：人们见他不再下跪磕头，而改为屈膝请安了。又过了二年，鞠躬就行了。

在内厨房用膳的除罗布桑林沁之外，还有博和朝鲁、赵宝善和满都拉等亲信人物。提及膳食，罗布桑林沁在这方面不十分讲究，每餐从不超过两个菜。他爱吃小米饭，几乎每天早餐都是小米饭，很少调换花样。他不爱吃油腻食物。他爱饮酒，但有节制，每顿只饮一银杯。每年他有几次吃请，即库伦街商务会和几家大店铺设宴请他。他也设宴回请。不过他摆宴席不讲排场，更不铺张，春季用春饼，夏季用凉面，秋冬两季烧火锅子。平时他吸旱烟，只有外出才吸香烟。他十分厌恶和反对吸鸦片烟。不管是誰在吸鸦片烟时让他撞见，他不讲情面，立即没收其烟土和烟具。我曾亲眼看见，他叫人在内厨房院内挖深坑，把没收来的烟具埋掉。有一次他没收其三叔的烟具，也在内厨房院内挖坑埋掉了。即使这样，他二弟宝音德力格尔吸鸦片烟，却未能制止住。他从不出外打猎，平时不玩牌。只是在每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日封印休假，到第二年正月十六日启印为止这段时间内，不分上下尊卑，大伙到一起随意娱乐和游玩。这时，罗布桑林沁也参加到其中来，同时，掏自己的腰包给我们赏钱，象我这样的伙夫也能得到两元银大洋。二十三过后他们那些有钱的头面人物聚首一起玩牌，我们从旁侍候。我们把烟、酒、

糖、茶和水果等全摆在那里，供他们随时享用，但他们得拿钱。实际上这些东西全都是罗布桑林沁的，我们供他们享用，钱却归我们，加上抽红，在这段时间，我们内厨房的每人能赚十几元银大洋。我一个月工资五块银洋（后为八块），而过年关期间就能额外挣十几块，所以我们是乐于侍候他们的。

罗布桑林沁偶尔也跟我们说俏皮话，开开玩笑。他办公的房子是二层楼阁，在夏季炎热的时候，他上到二层开后窗纳凉，顺窗口瞧见内厨房的人，便带玩笑地骂几句，我们只得说两句诙谐的话来应和他。有时候他跟我们围在一起聊天，这时，熟悉其脾气的人注意观察他的脸色，一旦看出他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就悄悄地走开。因为他往往从你的言谈中找茬发作，劈头盖脸地责骂一通。他使起性子来是够厉害的，不止是骂，还动手打人。记得有一次他到北山给他祖坟上供烧纸，约定几位喇嘛前去诵经，可是那几位喇嘛误了时间，罗布桑林沁为此暴跳如雷，结果那几位喇嘛每人挨了几鞭子。

罗布桑林沁还俗后又过了三年多的独身生活，到1934年旧历九月娶土默特左翼旗王爷云丹桑布的堂妹为妻，才结束其独身生活。替他作媒的是唐古特喀尔喀寿因寺的活佛迈达里胡图克图。中间往返跑腿的是那玛扎布（唐古特喀尔喀人），为此当时曾经有人打趣说：“迈达里（即弥勒）佛作媒，曼殊师礼佛（即文殊师礼佛，昔日曾有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为曼殊师礼佛化身之说）娶妻。”婚宴持续了六七天。新娘由娘家带来陪嫁的使女二人，一个不久即回去，一个留下来了，罗布桑林沁待她不错，后来嫁给了在上仓供

职的乌其尔拉图。罗布桑林沁婚后即与他二弟宝音德力格尔分家，一次大兴土木，盖了42间砖石结构房屋。开工到完工用一年时间，参加施工的小工和各类工匠，每天不下六七十人。小工推一天土，工钱为二角。据说统共花费8千元伪币。罗布桑林沁对一切都不大过问。他的财产，即大小牲畜、土地、粮食和金钱等等，到底有多少，在库伦街和外地经营的企业情况又怎样，他一概不知。外界给他馈赠礼品，均在总管家满都拉名下送来。

他在上仓的住处围有高大的砖墙，门口挂着“闲人免进”的木牌。除非大年初一拜年，平时我们是不进的。他办公的屋内陈设大都是一些工艺品和各式各样的钟表。其办公室西侧，紧贴着有前面出廊的五间房，廊柱是石雕的，这五间称玉柱堂。平时不用这五间房，只是每逢正月初一，在这里接受大凡带官职的人前来拜年。这屋内的墙壁上同样悬挂着许多各式各样的钟表。这许许多多的钟表全是他以及他的前任所收的礼物。

在上仓北门外，土城北大门内东侧是喂马的地方，这里喂着20多匹马，内里罗布桑林沁的坐骑就有七八匹。其余是其左右和下人乘用的。象我这样当伙夫的人也有一匹马骑，凡是在他手下听使唤的人全都有一匹马。其原因是，他把上仓和下仓的人，不分俗人还是喇嘛，全都武装起来，每人一杆枪，一百发子弹，一身灰色军服，一枚上书“侍从队”字样的黄布袖章。同时交给具体的布防任务。我们内厨房的人，即把守土城东面的一座炮台。上仓其余的人把守北大门，下仓的把守南大门。当然平时不用，一旦有情况，在旗保安队出发的情况下，上下仓的人临时替补保安队分别到南北大门防守。

# 那达木德事略

齐克奇

那达木德，汉名那松林，于1890年出生在库伦旗白音花苏木仁麻子屯。祖父时代家境败落，父亲喜来出家当喇嘛，后来跟一个名叫额尔很夫的女人同居，生那达木德弟兄五人。那达木德排行老大，十多岁才到沙巴尔台屯寄居在他姑姑家就读于私塾。后到庙上谋生，在兴源寺下属吉斯找到了一个端茶送水的差使。由于他为人机灵勤快，善于逢迎，加上有点文墨，为吉斯掌柜的巴达拉胡（后晋升为札萨克）所赏识和倚重，被起用为副笔帖式、笔帖式。不久当上了格斯贵，又不久升为德木齐（此时还兼任西雅尔乃庙大喇嘛职务），跻身于旗的12个诺颜之列，参与对重要旗务的决策与处理。

1929年，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迫于形势，特地派遣那达木德前往南京，为库伦旗政教分治一事进行活动。他到南京与吴鹤龄结识，通过吴鹤龄走门路，与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挂上了钩。1930年5月，他以卓索图盟代表资格出席了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的蒙古会议，为该会议第二组审查委员。在会议上他为维护蒙古封建上层利益和蒙古各盟、旗不受省、县统制而提出了诸如设立蒙古行政委员会；设立独立司法机关；设立自治委员会；振兴

蒙旗教育；蒙兵改为保安队；保护蒙古土地等12项议案。他在南京走门路，多方活动的结果，国民党政府终于答应了库伦旗所提请的政教分治要求。至1931年3月19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颁布了《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分治办法》五条。

那达木德从南京回来后得到罗布桑林沁之重赏，并被提升为札萨克，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久政教分治五条办法开始实施，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还俗，改任旗札萨克，并按其他札萨克旗之例，重新任命旗的大小官吏。那达木德自然被列在其他官吏之首，任札黑如各其（即管旗章京）。1932年，日本侵略军西攻热河，库伦旗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联系为之中断。在此情势下，罗布桑林沁改任旗长，任命那达木德为政务局局长。1933年，他又兼任保安总队队长。1935年3月，日本人将库伦旗与邻近的喀尔喀左翼、唐古特喀尔喀二旗合并为一旗，成立伪库伦旗公署，由库伦旗前任旗长罗布桑林沁出任伪旗长。那达木德任内务科长，后改任总务科长。后来日本人发现出任伪旗长的罗布桑林沁效命不力，于1941年借所谓“蒙地奉上”政策的实施，强迫罗布桑林沁退休，让那达木德接替罗布桑林沁充任伪旗长，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

20多年来，那达木德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的同时，在经济上也致力扑捉时机，大捞一把，很快成了个暴发的地主兼商人。20年代末期，库伦旗遭受历史所罕见的严重自然灾害，全旗大部分地方颗粒无收，生活无着的农户纷纷出外逃荒。乘此机会，阜新县几个大地主把那达木德老家仨麻子一带七个屯的大量耕地加以侵吞，并出地窝铺耕种。为此库伦

与阜新之间发生纠纷，历时两三年，库伦旗终于把被侵吞的耕地全部收回来。那达木德趁机浑水摸鱼，把成万亩耕地占为己有，成了大地主。此时，热河方面派遣放垦官员来库伦旗丈量养畜牧甸子地，并登记造册，以准备移民开垦。为此旗的当局颇费一番心血，才延缓了热河方面的这一做法。之后某些有钱有势的官员却乘机插足养畜牧草甸子，争先恐后去抢占耕地。那达木德自然不能放过这一机会，立即指使他二弟到养畜牧出地窝铺，占有了大量耕地。他从南京回来后不久，把原来属于罗布桑林沁经营的公玉源烧锅接过来经营，改其字号为兴源酒店。在日伪统治时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搞粮谷“出荷”，供应愈来愈紧张，以致副食行业和制酒行业纷纷倒闭的情况下，他经营这家酒店，几年中又发了一笔大财。这样在库伦旗各族人民日益贫困化，正如当时人民群众所形容的那样，“窗上无纸糊，炕上无席铺”的极端困苦时期，他在皂户沁屯里大兴土木，修起了一套日本式的住宅。并在其西厢房又修起曲窖，准备开办他的第二家烧锅。1945年8月，日本人逃离库伦后，他跟皂户沁屯恶霸地主和胡匪窝主保音初古拉相勾结，往辽宁地区倒卖“义仓”粮，牟取暴利。激起了全旗各族群众的极大愤慨。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以参事官川野鼎三为首的一批日系官吏，带着几名伪官吏，特地往罗布桑林沁府邸拜会罗布桑林沁，在进行“告别”的同时，声明“奉还旗之权力”。17日，日本人全部逃离库伦。就是这伙日本人惊恐万状，仓皇逃离库伦时，那达木德仍是奴性十足，竟设酒宴饯行，抹着老泪，把大量烟

土送给日本人。并把旗内仅有的两台汽车交与日本人乘坐，还派武装人员一直护送到彰武县城。日本人逃走后，他迫不及待地以伪旗公署原班人马为基础，宣布成立库伦旗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与此同时，他把伪警察悉数收罗进来，建立了一支拥有百余人的保安大队。不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派布和朝禄来库伦旗开辟工作，与他取得联系，给他带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证，任命他为库伦旗党部书记长。但他在维持会驻在地南大门上悬挂青天白日旗，表示迎接国民党前来接收。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却采取了不合作以及敌视态度。

那达木德的上述所为，遭到了向往革命，寻求民族解放的广大蒙古族知识青年的强烈反对，同时又为以罗布桑林沁为首的一批封建上层人物所不满。终于导致了倒那运动的爆发。11月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所联系的广大蒙古族知识青年，与以罗布桑林沁为首的封建上层联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把那达木德赶下了台，解散了治安维持会。他被赶下台后跑到科左中旗巴彦塔拉，但任了哲里木盟政府民政处副处长职务。时隔不久，消息传到库伦来，余怒未消的库伦人民立即向哲里木盟政府写信举发他的种种劣迹。因此于1946年1月，他不得不离开哲里木盟政府返回库伦来。此时，他在皂户沁屯新建的日本式寓所和库伦街上经营的兴源酒店已经被没收充公。于是，他悄悄地回到老家仁麻子屯居住。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一度占领库伦，直到第二年3月初逃离库伦，在这段时间，他从未出头露面。于1948年1月25日，他以效忠于日本侵略者，充当蒙奸的罪行，被库伦镇联村土改法庭判处死刑，是日在库伦镇伏法。

## 保音初古拉的发迹与下场

齐克奇

保音初古拉，1884年出生于库伦旗库伦镇皂户沁屯。其祖父楚义宁布为兴源寺果尼尔喇嘛。父亲哈斯布曾经当过屯达。保音初古拉小时出家当喇嘛，后因其哥哥早年去世，他才还俗继承家业。初，家道并不富裕。20岁后当了团练兵舍长，这便是他发迹的开端。

保音初古拉素以胆大，心狠，手毒著称。皂户沁有几家有权有势的地主，都不敢得罪他。与库伦旗毗邻的苏鲁克旗南元宝山屯大地主蔡花脸，白庙子屯黄廷等人斗不过他而甘拜下风。据传约于1904年，干沟子屯十多台牛车在往返库伦镇的途中遇上一伙强盗，几十头牛全被抢去。失主跑到库伦旗办公处报案。札萨克达喇嘛当即派旗卫队，带一部分团练兵勇赶到出事地点寻踪尾追。他们从出事地点一直追踪到苏鲁克旗的下苏木图屯北，发现抢掠这几十头牛的强盗并不是别人，正是居住于下苏木图屯的那木斯来一伙。那木斯来的围子占据下苏木图屯的一头，四周设有炮台，十分坚固。围子里还有如狼似虎的二三十名炮手，是远近知名的胡子窝。因此，邻近几个旗县的官兵都不敢触动他。下苏木图距库伦仅30多华里，卫队官兵对那木斯来的情况无不了然。此刻，他们望而却步，想调转马头回去交差。就在这时



候，年仅20岁的团练兵勇保音初古拉挺身而出：“既然追踪到这里来了，就得追到地方，弄个水落石出，你们在这等着，我去碰一下看看。”说罢，他单枪匹马径直走进屯里去。当他靠近围子的大门口时，门岗端起枪喝住了他。保音初古拉并不示弱，照样端起枪，枪口对准对方，说：“我这支枪也不是吃素的！”那木斯来从里面瞧见来人个头不高，年岁不大，却有如此胆量，感到诧异，便步出门外来，查问原委。他这才发现自己手下一伙竟在毗邻的库伦旗境内进行抢掠。他立即命令家人把那几十头牛从院内赶出来，当面交给了保音初古拉。此后，那木斯来严厉制止其手下炮手们再到毗邻的库伦旗境内行抢。保音初古拉由于这一次冒然行动侥幸获得成功而名声大噪，赫然成了个“英雄”，不久即被提升为团练兵舍长。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施展各种手段，广泛交结科尔沁、土默特和关东地区立有字号的大胡匪头，以及从事投机生意的地主商人，借以扩展自己的势力。他依仗日益扩展的势力，霸占大量土地，甚至强占他人妻室，变成了皂户沁有名的恶霸地主。自皂户沁南梁起转向东北，直至当时归彰武县管辖的南哈吐塔拉屯为止，他占有上万亩土地。在皂户沁和南哈吐塔拉两处雇三四十人给他种地、种菜和营林，还经营种植鸦片烟的小片地。

保音初古拉让大老婆和二儿子住皂户沁屯老家，把他小老婆和大儿子安置于南哈吐塔拉。他自己经常往来于这两处。他在这两处还出租一部分土地，特别是皂户沁的一大半农民均为他的佃户。

他在皂户沁和南哈吐塔拉两处各有三四十间房屋。平时，在这两处总有几名携带枪支的人进进出出，他们或是团

练，或是自卫团，或是保安大队的士兵。实际上都是他的护院炮手或随从护卫。他的私宅俨然象官府衙门，过往行人在他大门前不得骑牲口。更有甚者，屯里的贫苦人家外出做工，乃至几个人聚会一起磕头拜把子，都得事先向他报告，取得他点头同意，不然就被认为图谋不轨，要受到罚款或劳役等制裁。他喜好打猎，家中养着十多条猎狗，其兴致一来，不论忙闲都要出外打猎，通知一经发出，各户便得出人跟随，丝毫不敢延误。

一年三百六十天，他家的门口车马往来不绝。他一年所收获的五六十石高粮，仅做为来往客人的马料还嫌不足。每到旧历腊月，厨房里临时增加几个伙夫，预先准备好足够用于250张桌席的肉和菜。可见其宾客之多，交游之广。有人恳求他办件什么事，他一般不用亲自出马。只把一件信物借与，小则拐杖、烟荷包之类，大则他的坐骑以为凭证，这在方圆数百里之内就可以通行无阻，能够把事情办妥。在伪满洲国时候，他的这种交游活动，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日本特务收买他手下做事的一个名叫贺太的人，每月给伪币七元的津贴，让他从过往宾客口中搜集各方面情报。

1935年，日本人侵占库伦旗不久，出任伪旗长的罗布桑林沁不满于日本人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便暗中指使前卫队士兵哗变。结果，充来、巴代等仅仅七个人哗变出去，而更多的人未响应，致使这次哗变宣告失败。充来、巴代等七人东躲西藏，走投无路，最后躲藏到保音初古拉家里。他以伪村长的身份出面从中斡旋，日本参事官岩满三七男以“不咎既往”为条件招降。有人在外犯了事，只要投奔他来，均可得到他的庇护。土默特左翼旗一个名叫长命的人，犯了法后投到

他这里来，给他当车夫，一直干了十来年。皂户沁屯布林仓、希力莫二人被征调去当伪国兵，入伍后不久先后从兵营开小差跑回来，就在他家躲藏，竟给他无偿地当了几年长工。他在南哈吐塔拉的地窝铺，实际上就是他用以窝匪销赃的处所。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向南行进的苏联红军路经库伦时，赶走了保音初古拉的山、绵羊百十来只，马十来匹，牛十来头。他生平第一次遭受外界的侵犯，以致财产蒙受损失。这一下，他急红了眼，撕下多年当团练兵舍长和伪村长，总以绅士名义行事的假面具，露出其凶神恶煞般的狰狞面目，公然到外地大肆抢掠。同时，明火执仗地抢占了库伦镇蒋大勇的一群羊。并把他人所拾到的苏军遗失的牛、马等牲畜强行收归己有。皂户沁屯乌力吉胡图格拾到一头牛，只因为起初不愿交出来而惹得保音初古拉暴跳如雷，要开枪杀死乌力吉胡图格，后经屯里许多人出面求情才算了结。满喜拾到一匹马，同样由于不愿给他，竟被割去一只耳朵。“损失一百个，可以捞回二百个！”这是他次子布和朝鲁曾经说过的话。可谓上述事实的写照。

1945年8月，日本人逃离库伦之后，伪旗长那达木德成立治安维持会。那达木德自任会长，收罗大批伪军警，建立一支拥有百余人的保安大队，继续统治库伦旗各族人民。保音初古拉与之狼狈为奸，结成了一股代表敌伪残余的邪恶势力。是年11月，爆发了全旗规模的“倒那”运动，那达木德被轰下了台。这一运动给保音初古拉以最沉重地打击。使之失去了在官方的靠头。1946年初八路军进驻库伦后，由于公众的强烈呼吁，2月13日把他逮捕归案，于3月8日被处死刑，得到了其应有的下场。

# 乌力吉巴图的一生

扎木拉

乌力吉巴图祖孙四代人，在旧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或盗或匪，干了大量的坏事。在解放战争初期，继续与人民为敌，又犯下了新的罪行。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法西斯统治的覆亡，他们终于落入法网，一一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在祖孙四代人中，乌力吉巴图是作恶时间最长而又最骄横的一个。由于时间的流逝，对于他的一生了解得比较全面比较多的人，如今已经找不到了。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篇文章，是从一些仅仅了解些片断的人那里搜集来的。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乌力吉巴图，1881年生于库伦旗额勒顺镇敖伦嘎查北良少若屯。其祖父铁木格，原系土默特左翼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布冷屯一个贵族的家奴。12岁时因不堪忍受其主子的虐待而逃了出来，几经周折，最后来到库伦旗良少若屯落脚安家。后来在一个寡妇家入赘，生了乌力吉巴图的父亲陶克套勒。这陶克套勒是屯中臭名昭著的窃贼，偶尔也跑到外边去抢掠。曾经有一次伙同数人，装扮成喇嘛，假借前往大库伦向哲布尊丹巴活佛磕头，赶着牛车，行至乌珠穆沁境内，一次即抢劫400匹马。在往回赶时虽被失主追击，仍将一半赶了回来分赃。乌力吉巴图兄弟五人乘

性凶残，人们称之为“陶克套勒的五只狼”。乌力吉巴图作为长子，对于其父亲的盗窃行径，从小耳濡目染，不学以能。

1911年，乌力吉巴图同他二弟特木勒，同屯的另外几个人一起入旗卫队当兵，守卫旗办公处驻在的土城北门。不久他混上了个卫队什长的职务。自他1911年当卫队士兵起至1930年他退伍为止的20年，正是军阀混战，盗匪蜂起，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时期。这长达20年的岁月，正是他肆无忌惮地为匪作恶的时机。他时常利用当兵每月休息三天的机会，把他二弟和手下几名士兵带出去进行抢掠。远则跑到扎鲁特、阿鲁科尔沁、巴林、乌珠穆沁境内，近则奈曼、达尔罕旗。在通常情况下，他抢掠的是牛马等大牲畜。一劫一群，即百八十头乃至三二百头，至少也是十头八头。分赃后即回营房当兵。

他在卫队是个什长，跑到外边去当胡匪，自然又是个头头。他在外边抢掠几次都很得手，因此有些不守本分的人羡慕他，靠拢他，于是入伙的人日渐多起来，他得以“拉大帮”，成了“当家的”，人们称之为“老总”。南、北、中良少若三个屯有一部分人在他的周围纠合起来当胡匪，三个屯几十户人家，当胡匪的竟占去一大半。这样乌力吉巴图成了在库伦旗塔敏查干沙漠深处，人所共知的胡匪头子，而良少若屯就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胡匪窝。

乌力吉巴图到外边抢掠一群一群的牲畜往回赶，从不进屯分赃，而是直接赶往既定的地方。其既定的分赃地有三处，即窑淖尔、道伦照淖尔和敖伦淖尔。这三处分赃地既隐蔽，又有水草可以放牧。

乌力吉巴图靠抢劫这种生财之道，很快成了库伦旗北部坨子里拥有大批牲畜和大量土地的财主。在毗邻的奈曼旗和达尔罕旗设有几处地窝铺，每年打几百石粮食。设在奈曼旗境内的一处地窝铺，由他的次子白冷阿经营。白冷阿本身不仅是个出名的窃贼，而且又兼作他父亲的“线头”，不时为他父亲提供抢掠财物的信息。

乌力吉巴图不仅纠合左近村屯的人入伙当胡匪，还收容从外旗逃来的罪犯，使之长期藏匿在其身边。这些人心甘情愿地供他驱使，作为爪牙，继续为非作歹。他们借用其枪马跑到外边抢掠财物，回来后计股分赃。乌力吉巴图不单捞到所谓“枪马股份”，另处还索取给予出谋划策的所谓“劳心股份”。

有一次，宾图旗的代理王吴宝出外行猎时，乌力吉巴图的长子巴雅尔乘隙偷去了一匹猎马。为此吴宝将巴雅尔抓去，并向乌力吉巴图提出限期交上800元银洋方可赎人，否则将巴雅尔处死的苛刻条件。乌力吉巴图无奈通过保人，满口应承对方的条件，把他儿子赎了回来。之后他立即反诬吴宝害死了他的儿子，向朝阳府告了状，竟逼得吴宝离开宾图旗，跑到北京隐居。从此，乌力吉巴图恶名大噪，再也无人敢和他作对，俨然变成了盘踞一方的土豪和恶霸。奈曼旗有个叫勒布苏勒的牧主，有40头牛被他赶来。勒布苏勒派人跟踪，直跟到他家来。他却大大方方地把来人接到东院，在西院宰杀赶来的牛，用以招待来人，使得跟踪而来的人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地离去。又有一次，失主来他家打听自己的牛。他听后以嘲弄的口气表白自己说：“我乌力吉巴图吞下几条牛，卡不住喉咙眼儿！”

乌力吉巴图，唯有他跑到外边横冲直闯，大肆抢掠；外地的胡匪却不敢进入他的“圈内”进行抢掠。其所以如此有恃无恐，主要是因为他明为官兵，暗为胡匪的原故。

1935年4月，日本人占领库伦旗，建立了伪政权。第三年上收缴了乌力吉巴图的长短枪六支。他这才有所收敛，再不敢明火执仗地去抢掠财物。但是他在暗中倒卖鸦片烟土的勾当却从未中断。这时乌力吉巴图年过半百，在族中辈份最高，兄弟子孙20多人，全由他发号施令和支配。外族人都慑于他凶暴成性，受他欺凌。人们见他，都得口称“阿爸”或“老爷”，向他屈膝请安，甚至下跪。他的畜群随意进到别人地里，践踏青苗，但别人从不敢找他说理。他的子孙大年初一骑着高头大马在屯子里横冲直闯，路上撞倒了左邻右舍拜年的人，被撞倒的人也不敢吭一声。

1945年日本投降后，乌力吉巴图东山再起，加入治安维持会属下的保安队，重操旧业，继续跑到外边去抢掠。1946年初八路军进驻库伦，并陆续开进奈曼、开鲁、通辽和宾图等周围旗县。他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是年5月，为了保存其势力，唆使其子孙四人携带枪支马匹同时加入了东蒙自治军十四团一连当兵。7月中旬，旗里派去的工作团深入农村牧区开展“减租减息”和清算斗争。在接近良少若屯，即将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清算斗争的时候，其在东蒙自治军十四团一连当兵的孙子青少布前往奈曼旗阿布海屯返回途中得知工作团的活动情况，连夜跑回连队进行策反活动，次日凌晨即发生了武装叛乱。之后这股叛兵投靠了国民党，被收编为热北支队骑兵五团。年近70的乌力吉巴图挂了个少校兽医官的衔。1948年秋，在辽沈战役中做了俘虏。

被释放后，这个毕生单凭枪马横行在塔敏查干以北沙漠和草原上作恶多端的惯匪，已无处可以躲藏，不得不拖着老朽身躯回到库伦旗来，乖乖地接受人民对他的严正审判。1949年5月11日在库伦镇伏法，终了其罪恶的一生。



## 徐绍儒其人其事

齐克奇

徐绍儒，蒙古名拉喜忠乃，别名徐文明，1915年出生于库伦旗白音花苏木玛拉沁屯一户地主家庭。他本姓白，因其父亲丹巴则仍的异父同母兄弟徐德（蒙古名乌力古木结）无子，从小过到其名下为养子，遂改姓为徐。其养父徐德在库伦街经营面铺。他小时即住在其养父的面铺里，就读于养正学校。毕业后即跟阜新县哈拉嘎图屯一户地主的女儿结婚。婚后他嫌其妻子容貌丑陋，决意离开老家出走。这样，于1934年考入沈阳兴安师范学校，1935年转入齐齐哈尔师范学校。1936年加入伪蒙疆军第八师二十二团任中尉军械军需官。1937年又考入伪蒙疆留日预备学校次年即赴日本，就读于北海道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1940年从日本回国，在伪蒙疆高等学校任教。1945年初，他再回到伪蒙疆军任职，当了少校秘书。日本投降后，他从张家口到北京，投靠国民党热河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主任特派员薛兴儒，加入了国民党，被任命为国民党库伦旗党部书记长，同时加入了中统。1946年初，受薛兴儒的派遣潜回库伦旗，其任务是刺探八路军进驻库伦和东部蒙古搞自治活动的情报，并与罗布桑林沁取得联系。为此，于1月29日他从北京来到阜新，31日偕唐凤舞、苗占先二人

赶着一条驴，装扮成油匠，来到其老家玛拉沁屯。让唐、苗二人留在玛拉沁等候，于2月2日他装扮成喇嘛只身潜入库伦街。当时我新四军三师独立旅一部驻防库伦街，他养父的面铺里也住有我独立旅战士。于是他到才兴宝喇嘛家投宿（才兴宝喇嘛的侄子那木德，汉名包晋章为徐绍儒念兴安师范学校时的同学）。他见了才兴宝自称：日本投降后，眼下还没有找到职业，想暂时帮助养父经营面铺云云。第二天，才兴宝喇嘛见了乌恩奇告知徐绍儒来库伦的消息。乌恩奇听了不由产生了怀疑，正要想法找到他盘问盘问，却在兴源寺门前观看秧歌的人群里发现了徐绍儒。于是立即把他带到赵宝善的寓所，德勒黑和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负责人之一赵任远正在这里。徐绍儒不得不寒暄几句，并称自己这次来库伦，是想去王爷庙（乌兰浩特）与东蒙自治政府取得联系，中途顺便来老家看望。乌恩奇、德勒黑二人私下合计，徐绍儒突然出现，其中必有原故，暂且把他加以扣留，再作处置。但是赵任远未同意。这一天晚上，徐绍儒偷偷地溜到后府沟，先和宝音德力格尔会面，让宝音德力格尔作陪到罗布桑林沁处。罗时任联合政府旗长，在他的政府中任职的有八路军干部，又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所以徐绍儒不敢贸然暴露自己的身分，仍把见德勒黑、赵任远时所说的那一套复述了一遍。然后用试探的口吻询问八路军进驻库伦后的情况，以及罗本人对八路军所持的态度。谈了一会，从罗的言谈举止看不出其对八路军怀有什么不满情绪及敌意。徐绍儒竟未敢亮出给罗带来的“委任状”，最后他大失所望，离开了后府沟连夜回到玛拉沁屯，带着唐、苗二人匆忙奔往阜新。

3月中旬，他跟随国民党热蒙党部到朝阳，向薛兴儒汇

报了库伦的情况。之后又与国民党土默特左翼旗党部书记长海福泉一起回到阜新活动。徐绍儒虽为库伦人，但离开库伦已有十多年，在库伦几乎没有什么熟人。阜新虽有白云龙、杨俊、李栋五等人在活动，与之却没有什么交往。在这样情况下，除了唐凤舞、苗占先二人外，他又纠合了孟明宪、张天序、纪守英、刘相五等一伙非库伦籍的人，做为党羽准备一旦进入库伦便立即拼凑以他为中心的一个旗政府。

1946年7月中旬，东蒙自治军十四团叛变去阜新，跟白云龙、杨俊等人接洽，被国民党热河边区军司令索华忱收编为一个骑兵团，由叛军头目白音巴图充任团长。此时，徐绍儒又投靠国民党卓索图盟副盟长、兼热北支队司令齐木德多尔济（土默右翼旗王爷），为其招兵买马，奔走效力。趁热河边区军司令索华忱无力解决叛军薪饷，以至叛军士兵表示不满的时机，在叛军中进行游说，终于把叛军的大半人马拉了过去。编为热北支队骑兵第五团。他当上了团长，受上校衔。但是，他本人书生气十足，无带兵的经验，在叛军中又无几个熟人，以及他那些党羽都是非库伦籍的汉族，实难驱使这股叛军为他效命。为此，把从库伦只身叛逃投奔他的庆巴图和叛军中一名叫满特嘎的人任命为副团长，授中校衔，作为其助手。庆巴图、满特嘎二人均在伪蒙疆军服务过，特别是庆巴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当过伪蒙疆军上校团长，富有带兵经验。徐绍儒即借助于这二个副手的支撑，10月间率部与白音巴图的保安大队相配合，进犯库伦，并着手拼凑旗政府的活动。先是由国民党卓索图盟副盟长齐木德多尔济任命他为库伦旗政府主任秘书。然而设在沈阳的国民党蒙旗复员委员会另任命林沁道尔吉为主任秘书。徐、林两人相争

执不下，结果旗政府未能拼凑成。直拖到1947年2月，把主任秘书一缺抛开不论，让徐绍儒兼任总务科长，林沁道尔吉任政务科长，才勉强把旗政府拼凑成。时隔不久，我军解放开鲁县城，挥戈南下。徐绍儒一伙于3月1日凌晨仓皇逃离库伦，在阜新一带活动一段时间，又到北票驻防。到北票不久，庆巴图转往锦州。六月中旬，我军在冀热辽战场上夏季攻势进入了高潮，逼近煤城北票。在这种形势下，徐绍儒一再催促庆巴图返回团里，但庆巴图拒不回团。徐绍儒无可奈何率部撤离北票到金岭寺一带驻扎。七月初，其近一半人马发动了起义，并返回库伦投诚。为此，其所剩一半人马被国民党强行收编。而其原来的职衔一概不被承认。徐绍儒想掌握枪杆子称霸一方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跑到热蒙党部驻锦县办事处鬼混一段时间，于1948年初携其眷属到北京另谋出路。在北京他找到了过去在伪蒙疆工作的一些人，通过这一关系，于4月作为“内蒙古进京代表团”成员赴南京，列席伪国大旁听，并见到了蒋介石、白崇禧、孙科、朱家骅、白云梯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参加了“蒙古同乡会”发起的所谓“蒙古自治”问题研讨会。这次他还参加了国民党中组部第四处召集的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库伦旗协赞专员。从南京返回北京后，是年8月经根柱介绍，参加了由美国暗中操纵的“蒙古青年同盟”。不过几个月时间，北京宣告和平解放，他即隐居北京，以摆烟摊，拉三轮为生。1953年3月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并解回库伦关押，1955年12月被判处死刑。

## 官兵与胡匪

玛克斯尔扎布 口述

齐克奇 整理

“自古以来，兵匪一家”，这话一点不假。旧民国时期，兵匪相勾结，狼狈为奸的事情，比比皆是。锡勒图库伦旗也不例外。旗卫队的百余名士兵，多数是由胡匪转化而来的。换句话说，当时，谁当了胡匪，就把谁收容在旗卫队当兵。官兵与胡匪两者的关系如何，可想而知了。

有这样一件事，可见兵匪关系之一斑。

舍英尔力布老总（旧时对胡匪头称老总）是坨子里新艾里屯人。约于1920年左右，有人向绥东县署告发了他。县署便责成并敦促喇嘛王府把案犯舍英尔力布拘捕，尽快移交县署处理。为此，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指使卫队队官拉喜朋苏克带兵前去拘捕。但是拉喜朋苏克吃舍英尔力布老总的就很多，不便前去，另推荐斯迪尼日巴（尼日巴，即管家喇嘛）带兵前去。这样，斯迪尼日巴带领旗卫队人马赶到吉力图局子（那时锡勒图库伦旗设有三处局子，旗卫队的一半人马分别驻防这三处）住下。之后斯迪尼日巴和卫队士兵商议拘捕的方法，如果这么多人马直接赶到新艾里屯去，怕是惊动了舍英尔力布，走了人或动起武来，反而坏事。倒不如想个不动武的法子，把舍英尔力布带到局子里，出其不意地加以

拘捕。那末，誰能去把他带来呢？卫队有个叫做达瓦好吉格尔（好吉格尔为其外号，意为秃头）的人，原来也当过土匪，曾经在舍英尔力布手下当过炮头，后来两人不和，结下了宿怨。达瓦好吉格尔想借此机会出出气，即自告奋勇，願去新艾里屯把舍英尔力布带来。斯迪尼日巴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能把舍英尔力布带来？达瓦好吉格尔自信地回答说：“今天恰好下了一场雪，我见他就说拉喜朋苏克诺颜邀你喝几盅，他听了自然会高兴地来，不能有任何疑心。”新艾里和吉力图相距六华里，达瓦好吉格尔不一会即来到舍英尔力布家。舍英尔力布见他来，冷冷地问其来意。达瓦好吉格尔说：“雪天正好喝酒，拉喜朋苏克诺颜打发我来，邀你到局子里喝酒。”舍英尔力布一听立刻高兴起来，跨上马背直驰，不一会来到吉力图。当他进到外屋地时，从门后蹿出两个人扭住其两只手臂，达瓦好吉格尔从其背后拦腰一抱便捆了个结实。按理应立即押往绥东县署交差。但是，事情并非那样简单，舍英尔力布的事情不单和卫队队官拉喜朋苏克有牵连，还牵连到好些人。他们不能不权衡这利弊关系，假如把舍英尔力布移交给县署，必然对他加酷刑逼口供，他熬不过就得给口供，岂不糟糕？！不如先把他结果了。于是，他们把舍英尔力布押到吉力图屯西坨子里，在雪地上弄出互相扭打的脚印，然后一枪就把舍英尔力布打死了。他们从吉力图回到旗里，立即向县署报告，说：因舍英尔力布拒捕，不得已当场击毙。但是绥东县署表示不相信，立即向罗布桑林沁提出质询，声言要深究。罗布桑林沁怕事情败露，不好收场，无奈托裕升店掌柜的高老清代为说情，给县长高鸿飞送去二十块银元宝，方告了结。

## “吉古日台”※马招来的一场匪祸

杜古尔、林沁扎木苏提供资料

齐 克 奇 整理

这是1911年发生的事情。

先是古日古力台屯的来喜为小库伦马市出生意，到乌珠穆沁买来一匹马，转卖与敖尼都屯阿利雅喇嘛。有一天阿利雅喇嘛骑着这匹马到胡吉尔图屯来，被章来扎布撞见。章来扎布有眼力，一眼看出这匹马将成为顶好的走马。便向阿利雅喇嘛说说，付了价钱买下来了。这匹马到了章来扎布手里，经过一番精心饲养和调训，一发显得矫健，竟以“吉古日台”马闻名遐迩。这匹马毛色铁青，鼻梁弯曲得象鸟喙，尾巴呈锥形。一走起来，四蹄甩得好似不着地，鞍鞯犹如翅膀一般向两边张开，骑手使劲夹都夹不住。快得连猎狗都追不上，即使是跑得再快的马，跟着跑一气就远远落到后头。人所周知，马通常是用两条肚带，可是这匹马还得另外加两条胸带，不然鞍子就会向后滑下去。一般的骑手不敢骑这匹马，唯有章来扎布和他的侄子奥巴图才能骑，奥巴图的骑术最过硬。这匹马既已出名，四面八方，远远近近的人不断地来看，并争先恐后地出高价想把这匹马买到手。例如：宾图旗的协理台吉朋斯格，与章来扎布有亲戚瓜葛，竟出了三十块银锭的高价也未弄到手。原因一则是章来扎布特别稀罕这匹

马，再则章来扎布是库伦旗北部坨子里最富有的牧主，在全旗也是数得着的大户，他拥有几百匹马，上千头牛。所以心爱之物，别人再出高价，他也不会撒手。有一次，不慎把马跑丢了。他十分焦急，曾经说，跑遍天涯海角，也把马找回来，即使是死了，也得把骨头捡回来。他四出寻找，直找到乌珠穆沁终于找回来了。

外面，关于这四匹马的传闻更多，人们说得神乎其神。如说：主人在库伦街点上香烟，然后跨上马背离开库伦街，一支烟尚未吸完，马已经趟过养畜牧河水，横跨塔敏查干沙漠来到胡吉尔图（相距60多华里）。诸如此类的传闻，不仅传遍了临近的几个旗和县，而且远远传到了柳条边墙那边。1911年秋，边里的一个叫做高老疙瘩的土匪头子，为把这匹“吉古日台”马抢到手，带领50来名匪徒，不远几百里来到库伦旗，并潜入坨子里隐蔽起来。待到夜阑人静，悄悄地接近胡吉尔图屯，把章来扎布家包围了。屯里各家的狗都一起叫了起来，章来扎布西院的苏利雅什利感到奇怪，拿起护院的火枪走出屋，朝着星空放了一枪，不料，隐蔽在墙角的匪徒向他开枪，一枪把他击毙，苏利雅什利的父亲哈斯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跑出屋来，见儿子倒在院心，想把他扶起来，刚弯下腰去，“砰”地一声枪响，哈斯宝又被打伤。这样，匪徒们打死打伤各一人，把“吉古日台”马抢走了。同时，匪徒还绑架了章来扎布、那德那什利兄弟二人。不久，章来扎布获释，那德那什利被带走了。章来扎布为了“说票”，破费了很多钱财，才把弟弟赎了回来。至于那伙匪徒把“吉古日台”马抢到手之后，其内部又互相争夺这一肥项。匪首高老疙瘩竟死于另一个匪首的枪口下。于是众匪徒以为“吉古日台”马，给他们带



来了不安和灾祸。结果，把这匹“吉古日台”马一枪打死了。

注：※“吉古日台”，蒙古语，意为带翅膀的。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库伦旗文史资料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5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